



正見 合辑 · 二〇一三年夏秋

轮值主编：宿 亮

本期设计：钱争予

观察员：

陈 磊	陈仲伟	方可成	傅若兰	归 宿	励 轩
刘含章	刘 冉	刘岩川	马 军	缪 莹	邵 立
宿 亮	陶 郁	汪吕杰	王 馨	王绍达	王 韬
吴 瑶	武卓韵	杨鸣宇	于灵歌	袁 林	袁幼林
张跃然	周 航				

制图师：

卜书剑	龚方舟	黄俊如	黄雷蕾	焦佳文	吕 妍
钱争予	苏颢云	魏天瑶	姚 辰	张韧刚	周优游

新媒体运营：

操傲文	江舟忆	李大岩	赵蒙昉
-----	-----	-----	-----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

关于政见

面对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从官员到农民，从时评人到的哥，似乎人人都可以评头论足一番；但是，似乎又没有人能真正将它弄明白、说清楚。

如此复杂的中国政治，并没有令人们丧失求知欲和讨论欲。每天，在报纸电视上，在聊天室、微博客上，充斥着令人目不暇接的信息和似乎永无止境的争吵。

这些信息和争吵耗去了人们许多时间。然而，如果仅仅依赖大众传媒和社交网络，你无法获得太多关于中国政治的洞见——它们都太局限了。

你需要接触更聪明的头脑，吸取更靠谱的思想资源

政见希望带给你的就是这样的资源。我们的团队由海内外政治学研究和国内一线时政记者组成，秉持专业、独立、理性的原

则，跟踪阅读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的最新研究，从中挑选出最具价值的部分，以“专业性、趣味性、信息量”的写作风格呈现给你。

我们并不认为来自学界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成为你理解中国政治的全部资源。但至少，比起大众传媒提供的快餐，比起社交网络上那些泛着情绪化泡沫的争吵，学界的研究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基于丰富的研究材料，经过了理性的逻辑推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提供更具解释力的观点——总之，是更值得你参考的对象。

政治，也可以很有趣

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建立了政见。我们不是资料中转网站，没有海量的原文照登；我们也不是译者社区网站，一般不提供全文翻译。但我们会选择最具价值、最富启发性的观点进行介绍和评述，这更能节省你的宝贵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引介的思想资源，大部分都是在大众传媒上无法见到的。它们呆在仅有专业人士才经常问津的学术期刊、报告、会议中，普通公众鲜有机会接触。然而，这些思想资源并不枯燥，它们往往是鲜活的、智慧的、令人茅塞顿开的。

政见合辑

二〇一三年夏秋

编者的话

夏秋“碎碎念” 1

政见访谈

彭轲：“社会主义”是一种治理方式 6

政见中国

策论书斋

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醉翁之意不在酒？ 29

“命令”与“锦标”：中国式政策创新机制 32

议价的威权主义：政权维稳的微观机制 36

维稳新手段：从抗议者的社会关系入手	42
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面临重重挑战	46
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非预期性后果	52
探微知著	
村镇自治徒有其表？	59
中国社会组织的两面性	64
中国大学：一家汉族、城市、富人、男性俱乐部？	71
体育独立于政治？乌托邦式想法而已	76
农村妇女参政为何困难重重？	80
女性、年轻人、知识分子更不能容忍贪腐	84
互联网	
译言、字幕组、公开课……互联网翻译文化如何构建公共空间	89
如履薄冰：中国网络的公民社会	94
新媒体如何促进中国民主政治？	98
他山之玉	
民主必然促进人权？东南亚的实证分析	103
台湾特色民主与合法性	108

政见外交

战略与方向

习近平首访与中国外交新方向	116
中国军费之争：合理担忧还是过分解读？	119
中国北极战略：参与者？改革者？	124
中国不愿遵循国际法？	129

中美关系

黑非洲：中美经济逐鹿的竞技场？	136
中美竞争，韩国如何“两面下注”	141
兰德公司：中美可建立“东亚海洋安全伙伴关系”	145
中美关系迎来关键节点	149
中美军事合作：别错过“政策窗口”	154

睦邻关系

日本职业外交官：中日关系三大障碍	160
中朝关系六十年：从难以捉摸的盟友到尴尬的邻居	166
中缅关系的前世今生	173
中印边贸：挑战重重，前景光明	178

中俄关系：正走向恶化？	182
抱怨中国，解决不了印巴核问题	187

议题聚焦

“水资源政治”中的中国	193
灾后跨国互助，为何屡遭拒绝？	202
南中国海：时间或许是一剂良药	206
印度想在南中国海干点啥？	210
改善东北亚局势需开拓新领域	216
贸易如何影响外交	221
中国公民在海外曾遇到哪些风险	226
中国因素影响国际油价	230

政见经济

农村土地再分配：谁提议？谁决策？	235
中国劳工问题困境：保障利益不如赋予权力	239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责任：政府还是市场？	245
学者建言：将土地开发权适当下放给农民	251
由发展经济转向社会保障？	256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已有两个失去动力	260
---------------------	-----

政见学术

中国研究为何被边缘化?	266
-------------	-----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现状	271
-------------	-----

政见图书

历史与现状：三本中日关系著作推介	285
------------------	-----

中国年轻人：多面而复杂	293
-------------	-----

中国女性的记忆中珍藏的历史	297
---------------	-----

政见读图

图解中国基础设施投资 30 年	302
-----------------	-----

加入我们

政见 CNPolitics 观察员队伍	306
---------------------	-----

政见 CNPolitics 新媒体运营队伍	308
-----------------------	-----

编者的话

夏秋“碎碎念”

夏天悠长，秋日短促。时光匆匆，论辩不绝。

农民伯伯常说，春种秋收，夏秋两季的关键词是成长与收获；从政治学研究意义上看，夏秋两季却不能看作一个研究阶段，短暂的时间无法在政治演变中独立成章，但微小的变化都可能成为那只蝴蝶的翅膀，在某个时点决定未来的模样。

作为一个观察者，“政见”团队一如既往，凭借集体力量，在细微处理解时代，在独立的研究中寻索思维的火花、精辟的洞见，或许政见就是一个捕蝴蝶的孩子，与读者一起成长。

在团队的前行中，“观察员”们有很多讨论，我们应当如何用新的形式和方法拓展政见的“触手”，如何更生动、有趣地描绘那些精妙的研究和深刻的思索。观察员赵蒙眙在自己的博客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社科研究很有意思的发展方向之一，就是从研究‘有’，到

研究‘无’。”*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当我们把目光停留在那些能够看得到的政治动态、国际大势或经济演变时，也许恰恰忽略了某些关于“为什么没有”的逻辑。

中国研究为什么没有像美国研究成为中国社科研究主流一样出现在美国学术主流世界？为什么南海局势没有随经济发展趋向平静？为什么中日博弈没有引出良性互动？

许许多多的“没有”构成了我们身边的世界。如果说，研究“有”是为了解释我们眼下的世界，那么研究“没有”就能够为我们的前路提供“线索”。因为那些没有的可能成为今后的“有”，它们会长成什么样？政见团队的观察虽是“管窥”，却也有可能拼出清晰的图案。

同样夏秋之际，政见团队的创始人方可成在职业和人生转折点写道：“……心术纯正的人，将理想和责任的旗帜举久了，也容易陷入两种结局：或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麻木，变得钝感；或自我感动，自我中心，变得偏狭，甚至偏执。”**

* 赵蒙昉（2013），〈认同和决策〉。gravitysworm.com/post/66196742478

** 方可成（2013），〈再见，南方周末；你好，博士生活〉。www.fangkc.cn/2013/08/goodbye-southern-weekly-hello-phd-life

这段话有的放矢，写得实在、真诚。

这段话也对政见团队适用。经历两年起起伏伏，团队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套路，换句话说，我们有了自己的体制、模式。正如我们的社会在不断打破窠臼中前进，政见也要在探索中不断创造新的文体，保持热忱和开放。唯有如斯，我辈才能保持“专业、趣味和信息量”的承诺，跟得上那些研究中国最聪明的头脑。

而我，远没有团队成员那样的理性与勤劳，在每日写字的生活中总想着“逃离”。夏初，在冲绳那霸机场，我惊讶于北京—那霸航线受中日关系波及停飞又复航后，冲绳旅游局和从业人士的激动，体会微观经济在宏观外交中的“自处”；秋末，我站在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那幅尼基塔接受宗教审判的著名油画前，看画家用细节描画为信仰和立场声嘶力竭的形象，体会观点冲突的历史感叹。

夏秋两季就这样过去了。环境在变，我们每个人也在变。变化就像是一出“碎碎念”，把政见和读者联系在一起。新的一期《政见合辑》集中的2013年夏秋两季52篇文章、1篇访谈、1张信息图，依旧着力“生活中的政治学”。依旧还是要重复每次编辑合辑时的“碎碎念”，我没有奢望，不指望合辑给大家带来太大的价值或

改变；我所希望的是，团队与读者一同在变化的社会聚焦那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东西，触发思索。

作为一个志愿者团队，发展中的“政见”渴望获得大家的批评、鼓励和支持，不久后的改版和栏目调整也期待大家的意见。能够在读者电脑浏览器的收藏中看到 CNPolitics.org、在读者邮箱中看到 Webmaster@CNPolitics.org，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宿亮

2013年11月于北京

政见访谈

彭轲：“社会主义”是一种治理方式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彭轲 (Frank Pieke) 通过呈现中国共产党庞大而阶层化的党校系统, 审视中共的国家治理策略, 指出“社会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是一种“治理方式”, 它并没有消亡。日前, 彭轲教授接受了政见团队的专访。

◎ 王馨

精彩观点集锦

※ 大多数人会说, 哦, 共产党还活着真是个奇迹……嗯? 共产党看起来竟然发展得还不错, 怎么回事呢这是? ……哈, 让我们重新来认真地研究共产党吧! 于是迅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共产党的书, 来将共产党概念化……共产党并不能完全被作为

一个整体来看待，它包含了很多的内部复杂性。

- ※ 党校是一个“让党只成为党的地方”。在党校里，他们的多重身份变得单一化了，他们此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的功能，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特性被更加凸显出来。
- ※ 如果你真的跟干部们面对面聊天，他们会告诉你，最重要的收获并不是课上学到的东西——包括关于反腐败的训诫、礼仪的培训、理论知识的习得——而是他们在这里认识的人，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交网络。
- ※ 尽管他们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但他们对自己当前做的工作很感兴趣。他们相信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是有效的，可以带来巨大的变革。共产党会将中国带到一个更美好的阶段，而他们当前的工作正是在为这个目标做贡献的，当然也可以给他们自身带来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们是现实中的信仰者，但并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向往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治理方式”。
- ※ 相比于中国共产党，西方政党也许更加地自持：因为在西方

的系统中，政党并不是一个用来统治社会的组织，而更多是一个用于争权的工具，帮助特定的群体去赢得竞选。它本身不去统治，而是培养那些可以统治国家的政治家。

- ※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不是完全对峙的；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它们是共生的关系：彼此交融、彼此支持，生产出新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的治理话语和策略。
- ※ 共产党始终是一个由精英组成的组织，或者说，有精英化倾向的组织。
- ※ （如果有一天）体制不再把人们锁在固定的职业轨道内，而是变成一种可以自由出入的职业选择。体制内的职位与其他行业间的界限可以变得越来越宽松，形成一个共同的职位市场……如果这种体制内外的转换职业变得更频繁更容易，那将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状况，这比空谈民主要有用得多。
- ※ 我不认为中国存在真正的左右之分。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其实很难把它们放入到西方民主体制中划分的“左右”系统里。所谓“政左经右、政右经左”。如果我在中国，我也许会

成为一个党员，我可能不会试图从外部去推翻它，而是会利用我的党员身份，去尽我所能地做点事情。

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消亡了吗？

这一质疑之声，自市场经济体制引入中国社会后便在海内外不绝于耳。2009年，荷兰莱顿大学人类学家彭轲（Frank Pieke）在《好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一书中回应了这个问题。这被认为是目前海外唯一一本对中国党校系统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他通过呈现中国共产党庞大而阶层化的党校系统，审视中共的国家治理策略，指出“社会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是一种“治理方式”（socialism as a form of governance），它并没有消亡，而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他将这一过程理论化为“新社会主义”（Neo-socialism）。

彭轲，早年就读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曾长期任职于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现任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席。主要学术方向包括：现代中国乡村政治与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研究等。

日前,彭轲在荷兰莱顿接受了“政见”团队的专访。

一、党校:看得见的“共产党”

政见 CNPolitics:《好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主要基于2004—2008年间在云南地区党校的调研,为什么会选择党校作为研究对象?

彭轲:实话说,党校本身并不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但它是开展共产党研究的起步点。我对共产党的兴趣由来已久——要研究当代中国,你不可能绕过共产党。但是,这个研究课题非常困难:“谁是共产党?”“共产党在哪里?”尽管共产党是无所不在的,但“共产党”本身并不是一个可视的、可触摸的客体存在。

在我急切地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党校”:在这里,一群跟共产党有关的精英,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培训、甚至喝酒,这是我唯一能看见的“共产党”。这些精英干部包括公务员、教授、国企高管,他们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是因为一个共同的身份:党校学员,而不是其他。党校是一个“让党只成为党的地方”(That's where the party is just being the party, instead of some-

thing else)。在党校里，他们的多重身份变得单一化了，他们此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的功能，他们作为共产党员的特性被更加凸显出来。然后我决定，好，我要来研究党校。但是当我真正开始了研究之后发现，党校并不是开展干部培训的唯一地方，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司的入职培训，甚至是出国游学等都是干部培训的方式。

政见 CNPolitics: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党校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它现在的职能跟那个时候有变化吗？

彭轲: 在历史上，党校其实没有我预期的那么系统化和规范化。它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时才逐渐变成一个正规完善的培训系统，而那之前它的定位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清楚。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共产党规定每个县、每个省都得有相应规格的党校，但是它们做了什么呢？我在共产党的年鉴中看到，它们那个时候是非常随机的。比如说，中央决定发起一个政治运动，为了执行这个决定，它们就培训很多人来学习这个运动相关的知识、然后参与运动。这种培训基本都是依附于特定的运动，比较随机。

那时候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比如干部每隔五年需要培训一次，或者干部在升职之前必须接受培训——这些都是 90 年代以后才开

始出现的，这时党校才开始变成一个行政机构。这让我有点惊讶，此前我一直以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党校应该处在政党和权力的中心。

政见 CNPolitics: 这本书格外关注 1992 年以后的中国变革，这个时期的特殊性在哪里？

彭轲: 90 年代以后的中国很特殊：整个社会开始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上实现了迅速增长。但又不只是这样，因为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国家建设和党政建设迅速变革的时期。1992 年到现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当代”。这些关于党校的研究，那个时候还是比较不为人知的：人们隐隐感觉到，政府从人们手中征收的税，被部分地用于党政建设，但是没有人知道它的每一块钱是怎么样被花出去的。

那个时候，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结论。这两者也是非常符号化的概念：它们看起来是对峙着的，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联系比对峙要多得多。现在人们会说，哦，当然。但是当我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大多数人会说，哦，共产党还活着真是奇迹……嗯？共产党看起来竟然发展得还不错，怎么回事呢这是？……哈，让我们重新来认真地研

究共产党吧！于是迅速出现了一系列研究共产党的书，来将共产党概念化。

但是，它们并没有研究真正地揭示，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比如说，共产党是怎么花钱的；它在组织内部建设着些什么，又是怎样进行建设的？将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来研究，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多。共产党并不能完全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它包含了很多的内部复杂性。共产党内部有着怎样的发展动态？共产党不喜欢什么？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共产党意味着什么？加入了共产党后，他们被塑造成了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拥有自由？

很多中国年轻人其实并没有真正了解共产党。他们会说，共产党很强大，很富有，但是也很没意思。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公民社会、互联网、现代艺术、文学——所有这些都与“自由”“现代”相关的东西。而“党”似乎只存在于过去，谈论“党”的人仿佛来自“石器时代”，他们可能将被历史的潮流淘汰。很多人也许想要利用共产党，但很少有人想要去真正了解共产党。

政见 CNPolitics: 你曾经提到，相比于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国

现在的年轻人责任感较弱、集体感淡薄。而中共的干部队伍近年来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年轻化倾向，你怎么看？这是否有所矛盾？

彭轲：共产党并不是只培训已经存在的干部，它也采用了新的方法招纳年轻人。在招纳新成员的时候，招收初级党员和招收干部职位，是完全两回事。招收干部职位的体制在九十年代就已经很成熟了，可以通过招聘考试系统来选拔：首先发布招聘广告，人们可以报考，优秀的申请人会被纳入共产党的人才库，日后当党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从这里直接选拔人才。这也是从体制内部更新共产党血液的一种方式。

我曾经跟人才库中的一些人进行交谈，非常的有意思。比如有一个人，他的阶级成分非常“不好”：他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官员，文革期间整个家族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折磨。但是现在，他作为当地博物馆的馆长，通过了考试后，被招进了人才库。这表示，他不仅可以担任文职，也可以担任更为重要的政治职务。这提醒了我，共产党的人才库之中其实包含了背景完全不同背景的人。那些过去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人，现在通过常规的方式也可以进入体制。这实际上体现了共产党在有意识地进行自由的管理。我不知道这

些人是不是会在今后的仕途中一帆风顺,也许到达政治巅峰对他们来说会有些困难。但不可争辩的是,他们现在拥有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

以及,如果现在你走到县里乡里去跟人们聊天,会发现这些基层干部受教育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对新事物有很强的接受能力。我不觉得这种改变是自然而然就发生的——它们是被共产党有意识地训练出来的。

政见 CNPolitics: 你提到干部培训最重要的作用是“使原来互不认识的干部,形成一个新的网络”,这对行政体制起到非常重要的“润滑作用”,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但是,这同时也滋生了裙带关系增大了腐败的风险。从你的研究来看,共产党是否有采取相应措施来平衡这两者?

彭轲:“不要腐败”——党校学员几乎每天、每节课都会听到这句话。这几乎是所有干部培训的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腐败会让自己受伤,让党受伤,让国家和社会都受伤。但是如果你真的跟干部们面对面聊天,他们会告诉你,最重要的收获并不是课上学到的东西——包括关于反腐败的训诫、礼仪的培训、理论知识的习得——

而是他们在这里认识的人，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交网络。这本身就有个矛盾存在：共产党开办党校的结果，其实是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让干部们彼此变得更熟悉，也意味着更高的腐败风险；但同时，它也在强调，你们得遵纪守法不要腐败。

政见 CNPolitics: 2011 年开始，培训官员道德被写进党校，中组部也提出要把“道德”的考核结果，体现到干部的选拔任用上。你认为官员道德是可以进行培训习得的吗？这是否真的有助于防治腐败？

彭轲: 这种培训没有意义。一个常识性的误解是，尽管党试图在课堂上教授道德，但人们并不会因为接受了培训而变得更有道德。人们可以精心准备通过党的考试，或者写很多关于道德的文章，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变得更有道德。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党在不断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时，实际上也意味着在党的内部，不道德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党不只教授人们技能，也培训人们的道德，这个事实让我有点惊讶。在我看来，这完全是毛左的遗留物。如果在毛时代，人们也许会相信，通过培训教化可以把人变成一个全新的人，但这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很少了。

在党校中，这一理念仍然存在，但是呢，除了“存在”这个事实以外，也没有什么了。要怎样让学员们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实没有好的办法，于是共产党不得不相信，它们就是存在着的。因为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信念，整个系统都会失去合法性。

跟这些干部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尽管他们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但他们对自己当前做的工作很感兴趣。他们相信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是有效的，可以带来巨大的变革。共产党会将中国带到一个更美好的阶段，而他们当前的工作正是在为这个目标做贡献的，当然也可以给他们自身带来一个体面的生活。他们是现实中的信仰者，但并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向往者。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治理方式”。

但我也在问一个问题：这有关系吗？如果他们所做的事情，可以证明他们是在将理念付诸实践、并且真正有效地，这也许就已经足够了。

政见 CNPolitics: 你的调查过程中，是否曾经遇到过现实中和理念上都相信社会主义的人？

彭轲: 有一些。但很快我就发现，相比于那些只在现实中相信社

会主义的人,这些人往往更具有批判性。一旦他们相信了社会主义乌托邦,但又同时看到了现实里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会很快失望,批判,变得愤世嫉俗。这里面的逻辑是:他们批判,是因为他们还相信着。而那些仅仅在现实中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很少批判,他们只是在各自的位置上践行着他们被告知去做的事情,并且在实践上尽可能地完善。

如果我处在统治阶级的位置上,我也愿意拥有更多的“现实中的信仰者”,而不是那些由于对社会主义抱有过度幻想而心碎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有点麻烦。这类人不只是指左派,可以变成任何派。只要人们真正地相信着什么,要掌控管理他们总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不会总是遵照着领导的吩咐去做事,而是有着自己的判断。处在掌控位置上的人不是领导,而是他们自己。

二、“新社会主义”: 威权体制主动与市场经济合作

政见 CNPolitics: 你提到,中共关于干部领袖气质的培训不只针对知识储备和意识形态,也包括说话的礼仪、写作、吃饭、喝酒,等等。近年来,在国外也出现了为中国服务的干部培训项目,中共的

干部培训与西方民主制国家的政党培训，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彭轲：就我的了解来看，西方的政治体制跟中国是不可比较的，这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事情。在西方的体制中，也有类似的干部培训，除了专业的技能之外，它也灌输意识形态，只不过会以更加含蓄的方式，把它们融入到课程之中。但是政党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即以各自的意识形态，让人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群体，并提供这个群体特定的归属感。群体里的人们因为某些共同利益而感到彼此联结。相比于中国共产党，西方政党也许更加地自持：因为在西方的系统中，政党并不是一个用来统治社会的组织，而更多是一个用于争权的工具，帮助特定的群体去赢得竞选。它本身不去统治，而是培养那些可以统治国家的政治家。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参与到了统治中，但这并不是它的核心职能，它的核心职能是组织竞选，然后赢得竞选。

政见 CNPolitics：你怎样看待所谓的“西方民主制”？你觉得它适合中国现实吗？

彭轲：首先，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中国需要在近期考虑的问题。我

不认为中国会很快变成西方民主制，并且个人来说，我自己并不相信西方民主制。从源头上来说，西方民主制的一个弱点是，它并不能证明那些手握权力的人是最理想的权力执行者。那些操纵着国家运行的人，并非最优秀的政治家。他们最大的优势在于赢得竞选，让他们可以到达他们想去的位置；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适合管理国家。因此，很多的西方国家是被那些不够称职的人掌握着，在我看来，他们是不值得被信任的。他们擅长竞选，却并不一定擅长管理。

西方民主当然也有好处，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如果你非常不喜欢当下的执政党，你有方式可以逃离它；第二，它建立了政府问责制，因此你有方式可以监督这个由人们建立起来的政府。西方民主制本身，很难说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但它建立起来这两个规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能找到新的方式来取代西方民主制，同时它可以把这两个规则囊括进去，那也未尝不可。

政见 CNPolitics: 这本书中，你透过改革时期党校干部培训来审视中国共产党更高层面上的国家治理策略，并将这种治国方略理论化为“新社会主义”（Neo-socialism）。这个理论的创新之处在

哪些方面？

彭轲：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并不是完全对峙的；在中国这片土壤上，它们是共生的关系：彼此交融、彼此支持，生产出新的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情的治理话语和策略（governmental discourse and strategy）。列宁主义语境下的政党体制作为一个统治机构，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加强它自身的力量，变得更大、更强、更好。因此我使用了“新”（neo）：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威权体制主动与市场经济合作，体制也提供合意的政策保护和促进市场经济，因而它们二者都得到迅速发展。“新社会主义”在这里还强调，这个执政党可以是共产主义政党。

在这种“合作”中，共产党利用市场经济来加强它自身，这不仅是指它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来挣钱，还包括利用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进行内部管理。在关于干部培训的调查中我有一个发现，越来越多的党校通过外包的形式，让党外的市场化机构来提供这些课程。党自身也正在变得“市场化”，这是很可爱的。这说明了，在组织管理的层面上，市场经济与党组织是完全可以兼容的。

政见 CNPolitics: 你提到, 党校是权力崇拜和精英崇拜的一个根源。近些年, 中国的政治精英组成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这会对中国的社会转型产生怎样的影响?

彭轲: 首先你得承认这个事实, 就是共产党始终是一个由精英组成的组织, 或者说, 有精英化倾向的组织。毛泽东虽然一直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的利益, 但他也就是说说而已。这还不只是毛的观点, 它最早来自于列宁。列宁说, 革命需要由高级的人 (advanced people) 来发起, 比如说精英或者革命家, 而不是底层人民。这有时候会让我怀疑, 列宁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因为这个观点从根本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 这个观点使列宁主义在党政建设中变得非常实用。党员们会认为, 我们是精英, 是最优秀的人; 因此我们所相信的, 就是即将会发生的; 那些反对我们的人, 都是愚蠢的, 是敌人。现在, 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仍然广泛流传着这种“精英主义”: 我们之所以能够掌握着统治权是因为我们足够优秀, 因此我们知道对一个国家来说, 什么是最好的; 我们管理着社会, 领导着社会, 我们几乎就是这个社会。

政见 CNPolitics: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学而优则仕”, 直到今天还

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最聪明的中国人多会选择从政，而不是从商、从学。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彭轲：在我的调研中，很多干部这样描述他们从政的原因：薪水不差，工作规律，而且会稳步地越变越好。当然他们不会说，从政意味着潜在的腐败机会。实际上，即使你不打算全职从政，你只是想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你最好也要有政府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从政和从商之间是否可以自由地转换呢？我其实很想看到一些基于实证的社会学研究，去探讨中国人的职业选择，不只是从商，也包括其他专业度更高的职业。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什么影响了他们的职业选择？在政府、国有企业、教育机构、律师事务所、商人等职业中，是否有可能在不同的机构部门之间自由移动？不同职业间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门槛？我曾经采访过一个人，他先成为了党员干部，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开始职业生涯的好方式，一些年之后他下海经商。我非常想知道这种情况会不会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发生：体制不再把人们锁在固定的职业轨道内，而是变成一种可以自由出入的职业选择。体制内的职位与其他行业间的界限可以变得越来越宽松，形成一个共同的职位市场。

这在欧洲是比较普遍存在的,但是在中国目前好像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就常识而言,人们只是感觉,一旦进入了体制,就很难再全身而退;或者是如果你先从事了其他的工作,很晚才进入体制,你的政治生涯一般不会走得很远。这意味着,这些职业是分化得非常严重的。如果被数据证明,这种自由出入是很少发生的,那其实意味着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善政府的职能了。党和国家的雇员会认为,他们并不是单纯地从事着一种行业,而会给这个行业赋予更多的意义。如果这种体制内外的转换职业变得更频繁更容易,那将在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状况,这比空谈民主要有用得多。

三、中国社会并不真正存在左右之分

政见 CNPolitics: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优势和劣势分别在哪里?

彭轲: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你的主要职责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特殊性然后赋予意义。这些跟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大多数都看起来非常没劲,它们只作为社会的大布景存在,没有人会愿意进行二次思考,但实际上它们很重要。

人类学家就是很习惯于关注这些事情，比如党校，看起来是非常无聊的一个存在，但是当你真正地走入这个系统内部，你学到了关于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方法论，只是一种习惯、一种思考社会的方式而已。

而政治学就不一样了，政治学家们总是关注那些令人兴奋的、吸引眼球的事物。人类学家会说，去吧伙计，这些无聊的事物就让我来研究。

政见 CNPolitics: 在中国的语境下，你愿意被归为左派还是右派？

彭轲: 首先，我不认为中国存在真正的左右之分。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其实很难把它们放入到西方民主体制中划分的“左右”系统里。所谓“政左经右、政右经左”。如果我在中国，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党员，我可能不会试图从外部去推翻共产党，而是会利用我的党员身份，去尽我所能地做点事情。我不是在说我拥护共产党。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党已经在这里了，你能做的就是利用现有的机会尽可能地做点事情，为你自己、也为这个社会。这不是对青年的建议，只是我个人而言这样考虑而已。

共产党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并不是共产党的朋友，但当然也不

是敌人。这些年我变得对中国共产党比以前更加批判了,我更喜欢早些年的中国,大概从 2000 年到 2007 年,那是中国最自由的时候。但是现在,党管得太多。

本文刊发前经彭轲教授本人审订。

个人转载请注明出处及文章链接 (CNPolitics.org/2013/07/frank-pieke), 媒体及商业网站转载、摘编请联系授权: Webmaster@CNPolitics.org。

政见中国

政见中国

策论书斋

参与式政府绩效评估,醉翁之意不在酒?

中国政府引入参与式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虽然原理上和民主国家可能并无明显的差异,但在逻辑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相比民主体制希望籍此提高市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并具体体现民主原则,中国政府更在意的是籍此整治基层官员的失职,维持管治地位。

◎ 杨鸣宇

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公共管理,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之中兴起的管理理念改革。公众参与被认为能够改善政府的问责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的代理民主投举出来的官员,通常都是政府的高层管理者,而在最前线、和市民接触最频繁的基层公务人员反而没有与市民存在正式的委托代理关系(因为原则上他们只需听从上级的命令)。因此,公众参与的本质是希

望能够形成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力量来监察基层的官员,从而建立一种不同于选举投票的“横向”问责。

然而,中国是一个威权政体,理论上政府官员和市民之间并没正式的委托代理关系,为何中国政府也会有动力引进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之中?参与的效果又如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苏伟业教授最近撰文分析了这个问题。

苏伟业认为,中国政府愿意引进公众参与到政府绩效评估之中的根本原因是:希望籍此提高基层政府部门的管理效率,从而缓解经济增长引起的社会不满和矛盾,同时降低民主发展带来的潜在挑战。

通过对武汉市参与式绩效评估的实地调查和对相关参与者的访谈,苏主要有三点发现:

首先,这样的参与式绩效评估并不能对市民认为不合格或者不满意的官员构成实质性的惩罚。事实上,自2003年武汉开始引入类似的机制后,直至目前还没有政府部门在评估中不合格过。

然而,苏并不认为参与式绩效评估真的毫无作用。相反,它确实可以对基层官员构成一定的工作压力,并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但是压力的来源亦并非来自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市民,而是基层公

务人员的上级官员。因为管理绩效的提高可以增加官员升迁的机会,上级官员反而比基层官员更有激励引入这样的评估机制。

最后,苏指出:类似机制的根本不足是没有改变市民仍然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情况,而这比官员在具体管理行为上的失职或不足更关乎市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他认为,这样的评估机制事实上只是毛时代“人民路线”的现代改良版,不过在控制市民参与方面更加谨慎,以防形势超出政府的控制范围。

因此,总括而言,中国政府引入参与式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虽然原理上和民主国家可能并无明显的差异,但在逻辑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相比民主体制希望籍此提高市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并具体体现民主原则,中国政府更在意的是籍此整治基层官员的失职,维持管治地位。

参考文献

- So, B. W. Y. (2013). Civic Engagement i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Public Sector in China.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doi: 10.1080/14719037.2013.770055

“命令”与“锦标”：中国式政策创新机制

中国独特的央地关系引申出中国两种政策创新机制：命令式政策创新和锦标赛式政策创新，通过“命令式政策创新”来迫使下级政府接受和学习新的政策经验或工具是最有效率的做法。但另一方面，如果上级政府没有使用类似手段，那么下级政府的官员在仕途晋升的竞争之中也会产生强大的激励进行政策创新。上述两种政策创新机制无疑为理解中国本土的政策现象和经验提供了有用的视角。但只基于两个政策案例对比下得到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公共服务以外的政策领域，未来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 杨鸣宇

政府为什么会进行政策创新？原因可能多种多样。比如，随着市民社会经济资本的增加，他们可能会要求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政客也会因为选举的压力而提出不同的政策方案吸引选民。不同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投资而相互竞争，也可能促使政策的创新。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下，政策的创新机制是否有所不同？为什么不同地方政府之间会有不同的政策创新机制？中央政府或

上级政府在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清华大学教授朱旭峯通过对成都和天津两个城市案例的分析、考察和比较，尝试回答了上述问题。

朱旭峯认为，在考虑中国的政策创新机制时首先要注意中国独特的央地关系——这可以简单地归纳化两点：其一，垂直的行政集权和财政的央地分权同时并存；其二，中国的官员的晋升取决于上级官员而非选民。这两个特点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和激励动力，从而引申出中国两种政策创新机制：命令式政策创新（mandatory policy diffusion）和锦标赛式政策创新（championship policy diffusion）。

在命令式政策创新方面，案例是成都市的“一窗式并联审批”项目。这个项目的重点是希望通过把拥有审批权限的不同政府部门串联到一个“窗口”之中，从而改革和提升行政审批的效率，效果非常显著。以企业注册为例，通过“一窗式并联审批”，注册时间由原来的平均九天缩短为两天。基于成都的成功实践经验，四川党委和政府于2008年要求省内所有地级市和县级市都要参考成都建立相似的行政审批窗口。而成都的创新经验也进一步被诸如乌镇、汕头和莆田等城市所仿效。

天津的政策创新机制则颇为不同。和成都类似,天津的政策创新背景同样是为了响应 2004 年开始生效的《行政许可法》。同时,由于天津滨海新区在 2005 年被写入“十一五”规划之中,因此享受到很多中央政策优惠,这些因素都刺激天津市内各区希望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吸引投资。其中,南开区最先在这点上取得突破:一家企业原本需要大约 45 天才能在天津成功注册,而现在在南开区注册仅需不到 3 天。

有意思的是,天津市内的其他区政府并没有仿效南开区的做法,而是纷纷各自开创自己的“行政改革”机制。比如,河西区就开创了自己的“行政许可服务中心”来提升审批效率,2009 年该中心取得了 ISO 9001:2008 质量认证。

由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中国背景下政策创新机制的一些特点。首先,由于中国自上而下的官僚人事管理体制和政治权力的集中性,通过“命令式政策创新”来迫使下级政府接受和学习新的政策经验或工具是最有效率的做法,这在成都的案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但另一方面,如果上级政府没有使用类似手段,那么下级政府的官员在仕途晋升的竞争之中也会产生强大的激励进行政策创新。

然而,由于一般只有最先取得成功的政策经验或模式会受到上级的赞许。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同下级政府之间拥有一个相同的上级政府,而其中一个下级政府又成功进行了政策创新,那么其他在地理位置上靠近的下级政府不会沿用相同的政策,反而会积极探索新的政策创新模式,以免被贴上“跟风”的标签。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天津的案例中其他区政府并没有学习南开区的经验,而是自由创新。这一点和既有理论中认为“地理位置相邻的政府往往会采用相同的成功经验”并不相同。

上述两种政策创新机制无疑为理解中国本土的政策现象和经验提供了有用的视角。但作者也承认,这只是基于两个政策案例对比下得到的结论,因此是否适用于公共服务以外的政策领域,未来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7 月 3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Zhu, X. (2013). Mandate Versus Championship: Vertic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in public services in authoritarian China.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doi: 10.1080/14719037.2013.798028

议价的威权主义：政权维稳的微观机制

“花钱买平安”是当今基层政府维护执政基础的主要模式。政府用经济利益将敏感的政治问题“去政治化”，并将绝大多数政治诉求、文化诉求、社会公义诉求转变为经济诉求。在政府与民众的讨价还价之中，政府实际上是用金钱换取了民众对政府权威的服从和对自身权利的让渡。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一种市场关系，政府的权威和公民的权利成为了一种可被交易的商品。

◎ 张跃然

中国政府是如何获得稳固的执政基础和合法性的？这一直是西方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当今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成分愈发明显，但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却并未走上西方民主制的道路，这一看似悖论的事实进一步加强了相关研究的意义。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解释:政府是如何完成对社会的渗透、如何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实现其权力的。尤为重要的是,基层政府如何化解那些可能为政权稳定性带来巨大威胁的公众不满和群体性事件。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李静君和中国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永宏近期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研究,具体阐释了这一过程的微观机制。在北京和深圳两地,研究者的民族志田野工作历时四年,用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式接触了大量基层政府官员和群体性事件发起民众,最终总结出基层政府维稳的三大机制:抗争行为后的讨价还价,制度化程序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吸纳,以及恩庇侍从主义。

“抗争行为后的讨价还价”是基层政府维稳的核心机制。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好处平息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了基层政府最常见同时也是最有效的维稳行为。这一行为不仅适用于那些以物质性、经济性诉求为直接目的的群体性事件,也被大量用于回应政治诉求、文化诉求或社会公义诉求。换句话说,任何问题到了最后,都被基层政府变成了“钱”的问题。

在基层政府官员与抗议民众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府通过物质好处换取了民众的服从，从而避免了更大的政治危机。民众通过发起群体性事件或制造“社会不稳定”，为自身赢得了争取物质好处的筹码。在这样一种近似于买卖的交换关系中，政府与民众各取所需，从而形成了一种非零和博弈。

对基层政府官员来说，讨价还价过程是一项具有高度技术含量的工作，其具体环节包括：1) 用情感交流化解抗争民众的激动情绪；2) 将抗争民众纳入谈判轨道，将其分化并各个击破；3) 让抗争民众意识到何种诉求是“现实的”（无关乎何种诉求是“法定的”）；4) 辅以一定的武力威胁；5) 达成双赢交易。不过，这一机制具有长期的负面效应，民众虽因暂时得到物质好处而偃旗息鼓，但并无心悦诚服地信任或认可政府，使得政府权威长期受损。

“制度化程序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吸纳”是基层政府维稳的一种辅助机制。基层政府官员鼓励民众通过现有政治制度已经明确许可并规范的渠道，如信访、劳动仲裁、行政复议、诉讼、调解、选举，来实现自己的诉求。这些制度化程序往往环节繁琐、耗时甚长，能够消耗当事民众的时间和精力，打击其斗志，最终起到“去动员

化”的效果。同时，制度化程序化有形的社会不满表现（如群体性事件）为无形，避免社会不满情绪被进一步引爆。

从根本上看，制度化程序解决政府和民众之间纠纷的核心机制依然是讨价还价，不过这种讨价还价以更加隐性、间接的方式进行。对民众来说，制度化程序相对于非制度化手段的优势在于其合法性和安全性。不过，当事民众只有在明确感知到“他们的诉求很可能在制度化程序中被满足”时，才会在制度化程序的框架内活动。一旦这种感知减弱，当事民众便很可能破局而出，转向更加直接的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渠道。

“恩庇侍从主义”是基层政府维稳的另一种辅助机制。这个概念原指在集权体制下，政府享有对民众生活的高度控制权以及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因此民众会自觉自愿地效忠政府，以换取政府提供的各种物质性或非物质性好处。但在今天的中国，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依赖于政府提供基本生计，在这种情况下，“恩庇侍从主义”的有效性只局限于几类对政府仍有较高依赖度的人群：公务员、党员、已退休的老人，以及（令人惊讶的是）过往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这几类人群往往在抗争事件爆发时担任“救火队员”，

而在平时担任反映社情民意的“线人”。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群体对政府的效忠已经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基本全部依赖于政府提供物质性好处,本质还是一种交换甚至买卖关系。

总而言之,“花钱买平安”是当今基层政府维护执政基础的主要模式。政府用经济利益将敏感的政治问题“去政治化”,并将绝大多数政治诉求、文化诉求、社会公义诉求转变为经济诉求。在政府与民众的讨价还价之中,政府实际上是用金钱换取了民众对政府权威的服从和对自身权利的让渡。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变成了一种市场关系,政府的权威和公民的权利成为了一种可被交易的商品。这一发现也再次证明,市场经济逻辑和威权主义治理逻辑并非不相容。在中国,两者互相渗透,形成了“议价的威权主义”。

但这一模式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危机。首先,“花钱买平安”必然以政府雄厚的财政实力为基础,一旦因为某些原因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停滞,此模式便不可持续。其次,基层政府虽然用金钱换来了暂时的平安,但作为社会不稳定根源的政治、社会问题并未解决,且很可能在未来酿成更大的危机。在宏观层面上看,“议价的威权

主义”面临的危机,实际就是赵鼎新老师所言“绩效合法性”所面临的危机。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执政智慧。

备注: 此篇研究速览的成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观察员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教授的讨论,在此深表感谢。本篇研究速览的文本内容由观察员一人负责。

参考文献

- Lee, C., & Zhang, Y. (2013). The Power of Instability: Unraveling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6), 1475-1508.

维稳新手段：从抗议者的社会关系入手

依赖抗议者亲戚朋友的劝说和施压来瓦解大规模抗议，这种关系型镇压在中国开始变得常见。由于地方政府在部分亲戚朋友的工作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政府对于这些亲戚朋友的胁迫往往会对抗议者造成感情上的压力。

◎ 袁幼林

近年来，抗争政治学（contentious politics）中对政府控制人民抗议手段的理解开始更加广泛。之前学界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强硬的压制手段，或多或少忽略了相对“软”的手段。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中心的欧博文（Kevin O'Brien）教授和中国西南财经大学邓燕华副教授通过研究 2005 年浙江省东阳市画溪镇村民大规模抗议附近化工园区事件以及政府

的维稳措施,引入了“关系型镇压”(relational repression)这一“软”手段的概念,并且分析了其有效性。

随着舆论压力日渐增大,通过暴力手段镇压抗议通常会导致巨大的反弹,愈发不可行。因此,关系型镇压在中国开始变得更加常见。它指的是通过从抗议者的社会关系入手来控制抗议。在中国的语境下,关系型镇压主要是依赖抗议者亲戚朋友的劝说和施压来瓦解大规模抗议。由于地方政府在部分亲戚朋友的工作生活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政府对于这些亲戚朋友的胁迫往往会对抗议者本身造成感情上的压力。

2001年到2005年间,画溪镇村民一直饱受附近竹溪化工园区污染带来的庄稼破坏和健康受损的危害。在两次上访北京无功而返后,2005年3月24日,受污染最严重的第五村村民在化工园的入口处搭建了帐篷,并且开始了全天候的示威活动。4月10日,随着示威人群越来越多,镇政府采取了强制措施,从凌晨3点起,派遣了超过1500名公安干警开始了清理现场的活动。大规模的暴力随后爆发,造成了超过300名村民和干警受伤,以及68辆政府车辆被烧毁。在外界舆论强大的攻势下,政府开始转向关系型镇压。

作者在2007年4月间对当地122位抗议领袖、村干部、镇干部

和普通百姓进行了采访,并且详细阅读了档案材料,诸如上访信、海报、干部工作日记、会议记录以及内部《每日一报》等。通过进一步对其他案例的研究,作者将关系型镇压分成了四个阶段——

首先,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会采集主要的抗议人员信息以及他们主要的社会关系。吉林省抚松县公安局强调,面对抗议人群要做到“四知”:知道他们的个人信息、家庭状况、社会关系和联系方式。同样,画水镇的工作小组很快整理出了抗议者的社会关系:“抗议者 LHE 叔叔的女婿: GYX,画溪五村南江水库副总负责人;抗议者 YG 的外甥: LDF,皇田帆(音)供电站职工;抗议者 WXG 的儿子: WWB,画溪二村小学德育处主任……”

然后,当地政府便开始衡量哪些社会关系可用,并且开始联系这些社会关系加入工作小组。两条主要的标准便是:与抗议者的关系和对于政府工作的配合度。在这样的筛选标准下,当地的政府干部和其他工作与政府紧密相连的抗议者亲属便成为了首选。很快,一个仅仅由几十名政府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发展到了数百人,主要包括学校老师、国企工人和当地的企业家。

紧接着,政府便督促组员开始人盯人的感化行动。感化行动中最重要的一环便是让抗议者意识到,不管他们自己多麼愿意牺

牲自己,继续抗议会让他们亲近的人尝到苦果。一位当地地毯厂的工人向自己的祖母下跪说道:快结束抗议吧!不然他们不会让我回去工作的,现在找到份工作不容易。祖母在强大的感情攻势下,最后放弃了抗议。通过传递压力、动用感情和制造罪孽感这样的手段,政府期待关系型镇压会起到效果。

最后一环便是惩戒措施。画溪镇的文件中明确写道:任何镇政府工作人员,如果有亲戚参与了抗议,将会受到党纪和政府纪律的处罚,可能会被撤职、开除党籍甚至面临刑事处罚。在湖南省嘉禾县,2004年便有超过160名政府和国企工作人员因此被停职。

作者分析认为关系型镇压的有效性主要依靠的两大元素是政府对于社会关系的影响力和社会关系对于抗议者的影响力。因为政府控制着他们的薪水和职业前景,政府官员和国企员工通常成为最有效的社会关系。由于政府在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私企老板也经常加入这样的关系型镇压工作小组。

参考文献

- Deng, Y., & O'Brien, K. J. (2013). Relational Repression in China: Using Social Ties to Demobilize Protesters.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533–552.

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面临重重挑战

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遇到的挑战,有很多都是根植在中国政治体制机制之中的。尽管在现行条件下,中国领导层可以做出调整,通过一些方法应对这些挑战,但从长远看,还是需要对中国政治运行机制做出大的改革。否则,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里,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弊端可能体现的更明显,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也更大。

◎ 归宿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是个谜。更有人指出,中国国家安全机制的不透明,引发了外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怀疑。近几年来,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疑问: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

事实上,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研究,也一直是西方智库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

孙云的研究报告《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过程和挑战》(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Challenges) 就是此类研究的代表之作。

两种国家安全观

孙云指出，中国语境中的“国家安全”与美国语境中的“国家安全”有本质上的不同。

美国的国家安全，指的是来自美国外部的利益和威胁。在美国行政体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专门负责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而在中国，“国家安全”这个定义就宽泛了很多——不仅涉及外部安全，更涉及内部安全；自然，涉及的部门也多了很多。在学者眼中，一般认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包括政权安全、外交安全、国防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以及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

从“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领导

孙云认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国家

安全决策权牢牢地掌握在毛本人手中。当时中国的一些重大决策，如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甚至是毛泽东“力排众议”做出的决定。在这种决策模式下，虽然提高了决策效率，避免了内部争论，但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有些甚至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领导层吸取了毛时代的教训，确立了“集体领导”制度。中国的领导层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并制定政策。但在这个阶段，邓小平个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诸如“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由邓小平提出的。

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政治慢慢进入“常人政治”时代，中国领导层的“集体领导”贯彻的更为彻底，决策的“民主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但同时，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决策的因素也越来越多，中国的决策机制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导致出台的一些政策往往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挑战重重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主要面临以下挑战：

其一，新形势下，“集体领导”的弊端有所凸显。在当今世界，国家安全问题瞬息万变，很多时候决策过程完全基于经验甚至直觉，各相关方在此时相互博弈的也是决策机制。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能“说了算”，优势会非常明显。但中国的“集体领导”制度无疑天生具有一定弊端，在应对快速变化的形势时往往比较吃力。

其二，缺少核心的协调团队。前面也已提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全权负责。但在中国，由于国家安全问题的含义很宽泛，反而没有一个专职的机构有能力协调这些问题。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领导小组”似乎担负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但该小组自身在体制机制运作上也存在一定问题，阻碍了其更好的发挥作用。

其三，军队和政府部门博弈效应越来越明显。中国军队在中国国家安全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发生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尽管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中国军队无意在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军队在涉及自己专业领域政策制定的自主性明显提高。未来军队和政府部门可能在这些方面产生更多的博弈。

其四，部门利益对决策的干扰越来越大。随着参与国家安全

决策制定的部门越来越多,各部门也愈发关注自身的利益。一些部门有选择性的报告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试图将最高决策者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引导。在此种情况下,最高决策者往往很难知道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其五,形势分析的客观性往往与现行“指导方针”存在“错位”。对于形势的充分掌握和正确分析是领导层制定政策的基础。但是中国的政策分析人员往往纠结于这样的问题:领导层已经确立了“指导方针”,所有的分析都要在这个大的“指导方针”下进行。有时政策分析人员不得不面对“戴着镣铐跳舞”的境遇。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在中国国家安全问题中的作用:中国领导层认为中美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所以一旦有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出现,在各类分析报告中美国因素就首当其冲;而这些分析报告又强化了中美“结构性矛盾”这一指导方针,在某种程度上陷入恶性循环。

作者认为,中国遇到的上述挑战,有很多都是根植在中国政治体制机制之中的。尽管在现行条件下,中国领导层可以做出调整,通过一些方法应对这些挑战,但从长远看,还是需要对中国政治运

行机制做出大的改革。否则,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里,中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的弊端可能体现的更明显,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也更大。

参考文献

- Sun, Y. (2013).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And Challenges. Brookings Institute.

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非预期性后果

以新婚姻法为例

尽管新婚姻法的立法初衷是支持性别平等和女性独立，但和社会现实发生互动作用后，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催生了“实用话语”的司法逻辑，酿成了“强化性别不平等、损害女性权益”的非预期性后果。

◎ 张跃然

从法社会学的视角看，纸面字句中的法律绝不等同于司法实践中的法律——这并不是指（或并不仅仅是指）现实中的司法腐败行为对法律文本的践踏，而是指：任何纸面的法条，其社会含义是在司法实践中被不断建构、重构的，而法律的社会后果恰恰取决于其社会含义，而非其纸面意思。只有将司法实践理解为纸面法律和社会现实的互动过程，才能真正理解法律在实行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非预期性后果。

遵循这一基本逻辑,香港城市大学教授贺欣和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副教授 Kwai Hang Ng 在《法律与社会评论》上发表研究,分析 2001 年出台的新婚姻法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弱化了对女性的司法保护。

他们的主要实证材料来自 2011 年在华南某基层法院 20 余个离婚案件审理的旁听记录,并辅以对若干法官的访谈,具体指出:在离婚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律被建构出的社会含义和法官的司法逻辑是如何与纸面法律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的。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剧变,一种新的性别平等观和家庭观逐渐形成。女性在经济地位、情感与自我认知等方面应追求独立,成为一种颇有号召力的社会思潮。一种新的“婚姻自由”观与这种社会思潮相辅相成:结婚自由,离婚也要自由。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2001 年的新婚姻法将“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正当、充分理由接受下来,最大限度地承认了离婚自由。同时,为了保护婚姻中的弱势一方,法律同时规定,犯有重婚、非法同居、家庭暴力、抛弃配偶行为的“过错方”要对另一方给予补偿。

在新法出台之外,另有三个司法趋势深刻影响了新时代的离

婚案件审理。第一，“重调解、轻审判”成为基层民事司法的基本工作思路。在政策工具和行政命令引导下，法官更愿意以调解而不是审判的方式了结离婚案件。第二，离婚案件的取证责任由法官转移到诉讼人身上，除去诉讼人所提交的证据之外，法官没有义务了解更多的情况。第三，离婚诉讼中的法官的自我定位由“私生活干预者”转向“程序执行者”，逐渐接受“法律无法真正约束私人生活”的思想，越来越不愿意用法律约束诉讼人的婚姻生活。

可以看出，这些司法新趋势与早先的离婚司法实践有显著不同。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国家与社会均将离婚看作是有强大社会破坏作用的事物，不仅纸面法律为离婚设置重重障碍，而且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法官会用尽浑身解数使夫妻双方和好。在这一过程中，法官会尽可能详尽地搜集夫妻生活情况，并做出道德判断，以道德谴责的方式惩罚、帮教夫妻中的过错一方。这种带有强烈“家长式国家”色彩的“道德话语”，体现了国家干预个人生活的强大能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时代审理离婚案件的法官，将“不干预”作为基本宗旨。司法机构既不再将离婚视作一种“道德败坏”的负面行为，也不再对夫妻双方的家庭生活进行道德判断。对于

与过错（重婚、非法同居、家庭暴力、抛弃配偶行为）认定无关的事实细节，法官已经没有过问的兴趣。法官的工作重点不再是探究离婚意愿形成的原因，而是促成离婚协议的和平达成；其关注点不再是是非对错，而是财产分割、抚养权归属等现实问题。“劝和不劝离”的“道德话语”，已经被不干预、去道德、重实际的“实用话语”所替代。

“实用话语”是理解当今离婚司法实践的命门。当夫妻双方均表现出离婚意愿时，法官甚少关心其意愿表达是否完全出于自觉自愿或婚姻是否还有挽回的可能性，而将精力集中在利益分割的协商中。夫妻双方一方想离、一方不想离的情况（现实中以男方想离、女方不想居多），对法官而言则要复杂一些。因为“夫妻感情破裂”已经是法定的离婚充分条件（而反复提出离婚诉讼被视作“夫妻感情破裂”的表现），并且“法律无法真正约束私人生活”的思想被广泛接受，因此对多数法官而言，站在想离婚一方的立场上、劝另一方接受离婚，成为成本较小的一种选择。在调解过程中，法官惯用的话语包括：将离婚正常化（“离婚我见得多了，不算什么事”）、降低对婚姻的效用判断（“你觉得你俩还能过得好吗”）、用物质利益引诱（“分割财产的事儿好商量”）。其中，物质利益引诱是核心

话语。

可以看出，离婚案件中司法判断的“实用话语”，既与道德无关，也不基于公民的法定权利，而是基于物质利益的算计。婚姻的情感和精神含义基本剥夺了，成了一种可以用金钱交换的物质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实践“实用话语”时，往往是出于保护婚姻中弱势一方的好意，而对其中隐含的深层问题并不知觉。从根本上说，“实用话语”是将婚姻关系商品化的逻辑。婚姻关系的商品化现象并不新奇，但在旧有的社会习俗中主要体现在结婚上（如买媳妇），而用物质利益逻辑解决离婚纠纷，则是新婚姻法颁布后广泛出现的新现象。

“实用话语”的司法实践在三个方面损害了妇女的权益。第一，它忽视了婚姻作为一种生活状态对诉讼人（尤其是不愿离婚的一方）的情感和精神意义，不考虑诉讼人是否为离婚后生活做好了准备，消弭了司法机关对离婚决定的审慎态度；第二，它关闭了诉讼人（尤其是婚姻中的弱势一方）通过道德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通道；第三，一般而言男方比女方在物质利益的讨价还价上更占优势，调解最后达成的结果往往有利于男方。

尽管新婚姻法的立法初衷是支持性别平等和女性独立，但和

社会现实发生互动作用后,在司法实践层面上催生了“实用话语”的司法逻辑,酿成了“强化性别不平等、损害女性权益”的非预期性后果。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8 月 21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He, X., & Ng, K. H. (2013). Pragmatic Discourse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Law and Society Review*, 47(2), 279–310.

政见中国

探微知著

村镇自治徒有其表？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调整央地税收权分配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再度集权，通过一系列政策限制基层权力，并加强对村镇级干部的控制。这一系列措施，削弱了基层政府在改革初期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也很有可能动摇基层选举的基础。

◎ 王韬

2011年9月，广东省乌坎村，由于村委会大量非法卖地，爆发了大规模群体冲突。随后，广州省委省政府派特别工作组进入乌坎村，事件方才得以平息，乌坎进行了村委会民主选举，这一案例也被视为走向村级自治的里程碑。

但事实上，乌坎的民主自治之路并不顺利。民主选举一年多后，被村民选为村委会主任的林祖恋向媒体坦言：“如果没有上级

政府的支持,任何一个乡村要自治,都是不可能的事。”

乌坎的困境是中国村级治理状况的一个缩影。缺乏独立的财政自主权,无固定经济来源,在此种制度下,基层民主选举和乡村自治是否行得通呢?

要解答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目前村镇所掌握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对此,斯坦福大学的戴慕珍(Jean C. Oi)与其他四位学者在2012年发表于《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的论文提供了实证分析。这一研究通过随机抽样对五省25县的100个村进行了实地调查。采访对象包括村委会主任、村干部以及每个村子8个随机抽取的家庭。

研究者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调整央地税权分配的分税制改革,中央再度集权,通过一系列政策限制基层权力,并加强对村镇级干部的控制。这一系列措施,削弱了基层政府在改革初期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也很有可能动摇基层选举的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中央向乡镇和村级政府放权。“分灶吃饭”体制带来了巨大的激励效应,基层的官员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协助乡镇企业争取资源,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充分满足自身利

益诉求。

但是自 1994 年起，中央决定采取分税制改革，将财权大面积收归中央，2000 年之后又相继进行费改税改革，取消农业税，基层政府财权大幅度缩小，由上而下的转移支付成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基层政府随意罚款收费，减少基层官员腐败，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对基层政府限权、收权。

在行政监管方面，则主要有三项政策。第一项是“驻村干部”，乡镇干部被安排到每个村，乡镇干部在两天至五天时间留驻在村中，一方面负责指导解释上级政策，同时也对村上的工作进行观察了解。第二项是“上级发放工资”：村干部的工资不再由本级财政支付，而是来自县级财政。第三项制度是劳役使用限制，中央政府进一步限制地方政府调配村中劳力参与基建项目的权力，以保障村民利益。

在财政监管方面，不同地方也采取了多种政策对村镇干部进行限权。首先是“村账代管”，即村级账本由乡镇一级的经济管理站进行管理，村级不再拥有独立账户。村级会计账目也需要定时公布。此外，中央政府要求地方财政局对村委会的会计进行培训，要求其实施一系列财务监管政策。

上述政策在 90 年代中期到 2000 年之后变得十分普遍。比如，1995 年时，被研究的村子中只有 28% 实行了驻村干部制度；到 2005 年，这一数据达到了 71%。1995 年，上级支付工资的村子只有 15%，2005 年则达到 91%。此外，研究也发现，限权、收权不仅发生在村一级，还发生在乡镇一级。

研究同时证实了村镇所获得的转移支付数量不断增加。1997 年，上级政府对村级的人均公共物品投资支出为 350 元，而 2005 年时，增长到了 700 元。这一变化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尤其明显。

中央加强对村镇的控制，也从基层收回财权，二者同步进行。文章认为这一过程是国家主导的，而非如有些学者所言是因为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只有中央政府掌握了更多的财政资源，才有能力实施一系列行政条例控制地方官员行为；同时，为了确保转移支付的资金可以使用到位，也需要对基层政府加强管理和监督。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未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抑制基层的权力滥用和腐败。

有趣的是，在未向基层政府提供更多财政支持的情况下，中央自 1988 年起开展了村级选举试点，由村民自己选举干部，将基层治理的风险和责任都交给村镇的执政者，避免了中央的政治风险。

但是,中央的财政与行政控制与基层选举之间是否兼容呢?这一点值得怀疑。

来自中央的财政支持和投资的确使得村民享受了更好的公共服务。但对村镇级的干部而言,他们不再面对改革早期的激励,不再像过去一样具有企业家精神,这对于基层治理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中央介入基层,到底有助于社会稳定,还是会引发村民与基层政府间更激烈的冲突矛盾,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村镇是一国庞大的政治体制下最基层的单元,基层治理的有效与否直接对于一国社会治理至关重要。在本文所研究的村镇治理背后,是中国政府所不得不面临的题:如何既确保中央对基层的有效管理,又不伤害地方的创造力和自治基础?很显然,截止目前为止,我们对此尚无明确答案。

参考文献

- Oi, J. C., Babiarz, K. S., Zhang, L., Luo, R., & Rozelle, S. (2012). Shifting Fiscal Control to Limit Cadre Power in China's Townships and Villages.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649-675. doi:10.1017/S0305741012000823

中国社会组织的两面性

目前在中国,社会组织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一方面,它们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中介,为公民提供需要的公共服务,并且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政府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政府用来防范社会纠纷爆发的“安全网”,政府通过提供资源和在组织里建立党的分支机构等方式,借助这些组织的力量形成更全面的社会控制网。但两者之间孰重孰轻需要未来的研究会进行更多的探讨。

◎ 杨鸣宇

随着中国经济超过 30 年的快速增长,社会群体利益日渐分化,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纠纷显著增多——尤其是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公共纠纷近年来迅速增多,这已成为大家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政府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应对社会纠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政府而言,这往往是一个在压制(repression)和妥协(concession)之间进行选择的过程。

中国政府选择了怎样的应对策略？习近平在 2013 年全国人大闭幕式上有关“中国梦”的讲话可以视为一个大纲：要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同时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响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可以说，未来的大方向和愿景已经很清晰，但是政府采取的具体措施值得更为仔细的研究。Patricia Thornton、Jessica Teets 和胡洁人三位学者分别从“NGO 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大调解”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有意思的探讨。

利益代言人？——NGO 和政府之间的鱼水关系

按照既有理论中对政府 / 社会的二分法，NGO 的产生和增多往往是公民社会诞生的表现。同时，由于已有研究认为威权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存在潜在的互斥关系，因此 NGO 在数量上的增多也被视为民主化程度的一个指标。

然而，Patricia Thornton 和 Jessica Teets 均认为：已有的理论或类型划分并不适合描述 NGO 和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在最新一期的学术期刊《中国季刊》里，这两位学者各自提出了理

解 NGO 和政府关系的新概念。

Thornton 提出的概念是 PONGOS, 而 Teets 的提出则是“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前者指的是通过在 NGO 这样的第三部门组织里建立党的分支机构, 使这些组织和党的施政路线、方针保持一致。而后者则指的是这些第三部门组织通过和政府之间建立联系, 获取参与政府决策过程的机会。

在中国的现实中, NGO 和政府之间这样的“鱼水”而非泾渭分明的关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Thornton 指出, 政府通过对 NGO 进行“全面包围” (comprehensive coverage) 和购买服务等方式来资助 NGO 提供公共服务, 这使政府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管理中的问题。Teets 也认为, 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希望和 NGO 合作, 是因为后者提供的服务有助政府达成某些既定的管理目标, 这有助于他们的未来仕途。而且 NGO 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市民和政府之间的“中介”, 通过 NGO 建立的协商和讨论平台, 市民可能更容易接受政府的政策, 较少引起矛盾。

对于 NGO 而言, 和政府合作并得到支持, 可以使它们更好地开展工作, 还能得到资金和其他方面的资助, 这能有效解决中国

NGO 普遍因为缺乏资源而无法专业化和合法化的困境。

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调解工作室和大调解

“大调解”是政府回应社会需求的另外一种新型手段。根据中央综治办 2010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大调解指的是“由综治部门统筹协调，县（市、区）整合政治、综治、信访和有关行政职能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的调解资源和力量，建立矛盾纠纷联排联调的大调解工作平台”。由此可见，所谓的大调解其实是对已有的各种应对社会纠纷资源的重新整合，以期更好地解决社会纠纷。

大调解概念的提出有着非常现实的社会背景，胡洁人认为：这首先是因为目前的城市结构是以社区为主，随着市场化转型和单位制度的崩溃等原因，社会冲突的类型比单位制时期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这逼迫政府寻找新的策略来应对日益增多的新型社会纠纷。其次，大调解可以视为是对传统的人民调解工作的一种专业化和强化，它合乎儒家文化强调“非诉”的传统，同时也较为切合中国文化里重视人伦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哲学追求。

大调解具体如何操作？通过对上海市林乐人民调解工作室（化

名)的调研,胡洁人发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林乐工作室在组织性质上是民办非企业,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向其提供运作经费。工作室虽然接受街道司法所的指导,但彼此之间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

其次,工作室的核心人物林乐本身是资深的人民调解工作者,而且在社区里具有很高的威望。这使其介入社区纠纷的时候,纠纷的双方一定程度上都要给其“面子”。另外,由于工作室并不是纯粹的政府机构,因此市民会更容易觉得工作室代表的是他们的利益。

最后,有意思的是,工作室虽然是民间组织,但其能够有效发挥调解功能的前提是建立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基础上。正因为工作室得到政府的支持,并嵌入了政府的横向(法院、派出所)和纵向(区司法局、街道司法所和居委会)网络里,它才得以在处理纠纷时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动性。

因此,工作室事实上对政府有着相当的依赖性,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间组织。而政府则通过工作室把本来分散的横向和纵向组织的资源整合到一起,一方面避免了成为纠纷的直接指向对象,另一方面又能够借助工作室的力量更好地解决和预防纠纷,使

纠纷无法走出城市的基层，避免其进一步威胁社会稳定。

社会组织的双重性和威权政府的管治

通过上面的论述不难发现：目前在中国，社会组织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一方面，它们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中介，为公民提供需要的公共服务，并且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政府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政府用来防范社会纠纷爆发的“安全网”，政府通过提供资源和在组织里建立党的分支机构等方式，借助这些组织的力量形成更全面的社会控制网。

Teets 在研究结论里写道：社会组织在和政府的这种复杂关系下，不可能成为民主化的力量，相反只是威权政府更有技巧的社会控制手段。Thornton 则表示，目前难以预测第三部门在中国的未来到底是会拥有更自由自主的发展，还是沦为政府的控制工具。胡洁人也认为：林乐工作室这样的组织未来需要减少政府的干预，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公民的利益表达者和保障者。

较为遗憾的是，上述三者的研究虽然均发现社会组织在中国的这种两面性，但都没有探讨两者之间孰重孰轻，或者说，在什么样的程度内社会组织代表市民的利益，越过了什么样的界线它就

成为政府的社会控制网。我们期待未来的研究会在这个研究方向上进行更多的探讨。

参考文献

- Thornton, P. M. (2013). The Advance of the Party: Transformation or Takeover of Urban Grassroots Society? *The China Quarterly*, 213, 1–18.
- Teets, J. C. (2013). Let Many Civil Societies Bloom: The Rise of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3, 19–38.
- Hu, J. (2011). Grand Mediation in China: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 *Asian Survey*, 51(6), 1065–1089.
- 胡洁人 (2009)。〈群体性纠纷的“救生艇”——新型城市小区人民调解工作室研究〉。《法治论坛》，78—100。

中国大学：一家汉族、城市、富人、男性俱乐部？

中国高校扩招政策开展十年后，对性别、贫富、城乡、民族的结构失衡、入学机会不均现象在高等院校招生中仍然存在。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少数民族女性，成为高等院校中代表性最为不足的群体。中国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与阶层固化问题，需要全社会的警惕与关注。

◎ 傅若兰

又到了9月的开学季，“95后”一代开始走进大学校园。在他们为大学校园带来新气象的同时，“寒门再难出贵子”的话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担心，教育机会不公平所导致的阶层固化趋势加剧将对社会公平与稳定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甚至导致中国社会的分裂与动荡。

由王晓兵、刘承芳、张林秀、史耀江、罗思高（Scott Rozelle）五

位学者合作发表在最新一期《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文章《中国大学是一家汉族、城市、富人、男性俱乐部：对中国四所一本高校的普查研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高校扩招政策开展十年后，招生中对性别、贫富、城乡、民族的歧视现象是否仍在继续？是否有一些群体（如少数民族、女性、穷人、农村人口）在高校中人数严重不足，没有得到充分代表？

这五位来自中国社科院、西北大学，及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中国的四所一本高校——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西北大学 2008 年的新生情况普查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统计覆盖率在这四所高校都超过 99%，普查总人数达 20253 人。研究人员将这四所高校的新生结构与同时期的中国人口结构（选取了 14—22 岁这一年龄组）相对比，以评估代表性问题。文章认为，针对性别、民族、贫富、城乡的入学机会差异与歧视现象仍然存在，而代表性最为不足的群体则是来自农村的少数民族女性。

从城乡差异来看，这四所高校的新生中来自城市与农村的人数大致相同，各占 50%；但 14—22 岁的中国人口中，农村人口占 55.1%。也就是说，四所高校新生中的农村人口比例比全国 14—22 岁阶段的农村人口比例低 5 个百分点。如果与四川、陕西、安徽三

省的人口结构比较,则差距更大,达18个百分点。

不同性别的人学率差异同样存在。女性占这四所高校新生总数约41%,较全国14—22岁的女性比例低7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纳入城乡差异综合考虑,城市女性与城市男性的代表性差异并不明显,四所高校新生中城市男性、女性的比例均高于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农村女性在高校中代表性严重不足是造成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四所高校新生中只有17%是来自农村的女性,而在全中国14—22岁人口中,农村女性占27%,相差10个百分点。

在民族与贫富差距问题上,研究人员特地考察了农村学生中贫困与非贫困群体、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代表性差异(贫穷与否的划分标准为是否来自国家级贫困县)。数据显示,非贫困农村学生不存在代表性不足的情况,而来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学生仅占全体学生的19.4%,与国家级贫困县占全国14—22岁人口的比例23.9%差距较大。

研究人员还将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六个民族——壮族、满族、回族、苗族、维吾尔族、土家族,与其他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情况分别分析,数据显示,少数民族在四校新生中均存在代表性不足问题,但六大少数民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问题格外突出,这一群

体占全国 14—22 岁人口比例为 4.5%，但他们仅在四校新生中的比例仅为 1.6%。

这四所一本高校中，西安交通大学与四川大学属于中央部属高校，由中央财政支持，而安徽大学与西北大学则属于省属高校，研究人员发现这两类学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省属高校中完全不存在农村学生代表性不足问题，农村学生占入学新生的比例比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还要高。换句话说，城乡学生比例失调完全是由西安交通大学与四川大学这两所中央部属高校的城乡学生比例差异造成的。类似的情况也在性别问题上发生，虽然女生在中央部属、省属高校均呈现代表性不足，但中央部属高校的代表性不足现象更为严重。众所周知，中央部属高校由国务院组成部门及其直属机构直属管理，这类学校往往教学科研水平较高，在高考中的录取分数也更高。因此，这一现象是否意味着城市学生、男性学生比农村学生及女性学生在高考中表现更佳？这一问题值得观察与探究。

虽然中国高校扩招政策已推行十年，高等教育机会的供应总量大大提升，录取率从 1990 年的 3.4% 提高到 2006 年的 22%，但是大学生的结构失衡、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现象仍然存在。文章并没

有在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上多做探究,仅给出了一些猜测。例如,研究样本——西北大学、安徽大学开设了更多吸引农村学生的课程,如土地资源管理、旅游管理、资源开采等,这可能是造成中央部属与省属高校之间差异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这篇论文的论证方式也存在一定缺陷,这四所高校的普查结果样本太小,未必能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情况。如在民族问题上,由于中国高校分民族院校和非民族院校,中央民族大学等民族院校的非汉族学生比例远远超过他们的人口比例,而这篇论文选的四所高校无一是非民族院校。

不过,《中国大学是一家汉族、城市、富人、男性俱乐部》一文指出的中国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与阶层固化问题,值得全社会关注,李克强总理也曾承诺:“要使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农家子弟”。

参考文献

- Wang, X., Liu C., Zhang, L., Shi Y., & Rozelle, S. (2013). College is a Rich, Han, Urban, Male Club: Research Notes from a Census Survey of Four Tier One College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4, 456-470.

体育独立于政治？乌托邦式想法而已

体育具有政治属性，服务于政治。运动员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政治内涵。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在体育比赛中同场竞技，打破外交僵局。体育独立于政治只是一种“乌托邦式”想法。体育与政治之间的难解之缘值得更深一步的探讨。

◎ 宿亮

体育与政治之间有什么关系？社会学理论学者 C.L.R·詹姆斯曾有经典研究。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他，1963年在回忆录《出界（跨越界限）》一书中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关注板球在政治中的作用。他用板球分析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不同阶层种族之间的联系以及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的联系，探讨板球如何在英国殖民统治中发挥作用，又如何影响西印度群岛的去殖民化进程。

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船艇学院学者 Chenxi Pan 在《亚洲社会科学》(Asia Social Science) 撰文,援引了詹姆斯的理论,在中国社会背景下探讨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体育是否应该、又能否独立于政治?很多学者认定,体育精神不能成为政治利用的工具。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就要求体育脱离政治。这种说法有其自身逻辑——如果赢得比赛算运动员归属国的巨大荣耀,那么输掉比赛算什么?

不过, Pan 认为,尽管较为纯粹的环境有利体育自身发展,但当代政治不会停止影响体育。体育独立于政治只是一种“乌托邦式”想法。

体育本质就有政治性。原始社会人类为了捕猎、互相攻击和防御等活动而进行的训练就是体育的前身。随着战争的产生,体育开始服务于人们战斗技巧的发展。不同民族都有独特的体育项目,反映了这些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科技水平。

尽管国际奥委会宣称体育应脱离政治,还是无法阻止一些国家抵制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以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这也证明了体育的政治属性。

不少国家每年都增加对体育的投资,并通过官方媒体渠道吸

引民众注意体育比赛,此推动政治稳定。对于中国而言,推动体育事业发展是一贯的政策,以此增强人民体质、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特别是推动文化和意识形态凝聚力。1998年,作为整个政府机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国体委改制为国家体育总局,也体现了体育的管理受到政治影响。

在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政治和体育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通过带有“非政治形象”的体育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乒乓外交”。另外,体育活动也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联系。

著名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口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体育的外交属性。

作者认为,体育与政治关系紧密,体育也服务于政治。

竞技体育最吸引人的是结果。多数国际比赛都以国家为单位,因此运动员的表现也被赋予了政治内涵。胜利和失败不仅代表运动员个人,更代表了国家。民族精神成了体育了政治之间的“连接符”。就中国国内而言,56个不同民族之间的体育活动也能够增加民族之间的理解、增进友谊。

另外,体育比赛中的竞技水平体现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发

展的水平。中国曾在国际赛场上被称为“东亚病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水平。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体育产业增长迅速。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对中国国际地位、民族意识、社会团结、政府行政能力产生影响。

在多数国家，体育都关联政治。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在体育比赛中同场竞技，打破外交僵局。在作者看来，政治决定体育的特性，体育为政治服务，体育和政治的关系在全世界都存在。体育与政治之间的难解之缘值得更深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 Pan, C. (2011). Paradox of Sport and Politics in China — Applied to C.L.R. James' Theory. *Asian Social Science*, 7(12).

农村妇女参政为何困难重重？

在所有影响农村妇女参政的因素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方面的因素。研究者认为，造成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面对的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政府的基层治理中，提高女性的政治参与和地位从来不是首要的工作。如东的案例显示出：农村妇女目前的政治参与状况有了数量上的改变，以及法律法规上的规定，但是在质量上，以至整个制度和文化因素方面，仍然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 杨鸣宇

中国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有了数量上的改变，但质量仍然难以令人满意。这是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王正绪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戴潍娜最近得出的研究成果。

这项研究是基于他们 2009 年 6 月至 8 月在江苏如东县的调研完成的。2008 年，如东县的人均 GDP 是人民币 25000 元（排在江苏省 52 个县级单位中的第 24 名），农民人均净收入 7210 元（同样

排在江苏省第 24 名),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153 元)。因此, 如东这个样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代表了中国东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县级农村情况。

调查分为问卷和访谈两部份, 前者在如东县的 15 个镇里中选取了 5 个情况各异的村庄发放问卷, 并成功收回了 200 份问卷; 后者则选取了这些村庄里的 20 名女性干部和村民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从而分别从定量和定性的方式了解妇女政治参与的情况。

根据调查的结果, 两位研究者有如下发现:

首先, 农村妇女已经具备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 81% 问卷受访的女性村民认为农村需要女性干部。在这些女性中, 97% 曾经在村委会的选举中投过票。

然而, 农村妇女在其他基层治理的政治参与方面——例如参与农村大会, 向村委会提出建议, 关注农村的财政是否公开透明, 以及对村委会领导的熟悉程度等——均明显弱于男性村民。

此外, 基层政治组织中女性代表偏低。在如东总数 218 个村委会中, 有 19% 没有任何女性干部。而村党支部的情况更加严重, 高达 50% 的村党支部没有任何女性干部。

女性村民的公民能力 (civic competence) 也偏低——公民能

力通常指进行政治参与时所必须的认知和行动能力。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她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对农村基层治理进行规定的法律具体内容知之甚少，有 42% 的人表示完全不知道。

两位研究者认为，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上的上述困境可以从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的三个方面进行解释。比如，女性接受基础教育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而农村的传统文化也并不鼓励女性参与政治事务，女性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定位和理解也会限制她们主动进行政治参与的意愿。

在所有影响农村妇女参政的因素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方面的因素。研究者认为，造成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面对的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政府的基层治理中，提高女性的政治参与和地位从来不是首要的工作。就如东的情况而言，政府的工作文件显示，即使要提高，重点也更多放在县和镇两级的政府机构里，而不是最基层的村委会。

另外，本应该在保障和提高女性权益中有所作为的妇联，在相关工作里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妇联的工作重点同样放在了城市地区，而且主要和妇女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议题相关，政治方面议

题被刻意淡化。这样的情况导致的结果就如上述提及的发现一样，虽然农村妇女在村委会选委中的投票率非常高，而且多数村委会里也至少有一名女性干部，但这些指标主要是为了满足相关法律文件里的规定，女性的政治参与质量事实上并未得到根本的提高。

总括而言，如东的案例显示出：农村妇女目前的政治参与状况有了数量上的改变，以及法律法规上的规定，但是在质量上，以至整个制度和文化因素方面，仍然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 Wang, Z., & Dai, W. (2013).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s Self-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a Jiangsu County. *Governance*, 26(1), 91–118.

女性、年轻人、知识分子更不能容忍贪腐

政府应该运用女性的高道德感、年轻族群的正义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及部分具有实务经验、却又对贪腐显得痛恶的白领主管，授予其监测及打击贪腐的知识与能力，使之成为社会上反贪腐的主要力量与廉政工作的尖兵。

◎ 马军

中国近来反腐动作不断，虽然反腐主导者是党纪政纪部门和司法机关，但民众对贪腐的憎恶和对反腐的呼声也是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台湾地区的反腐经验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在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各级政府均面对着黑道与财团的共生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俘获以及控制。在台湾历次“扫除黑金”的过程中，公权力部

门常扮演着议程发动者、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多重角色，过程困难重重，效果也往往不甚理想。台湾特有的政治文化又使得反腐运动中往往伴随着选举主义、民粹主义以及菁英政治的分赃等现象，使廉能政策的推动往往是昙花一现。

为此，台湾学者余致力大声疾呼“人民不能完全依赖其代理人来解决贪腐问题，必须在民主治理过程中扮演更主动积极的角色”。

因此，了解不同的民众在对贪腐的认知与容忍度上是否有差异便非常重要，且有助于反贪腐运动的社会动员与政策制定。世新大学博士候选人苏毓昌与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副教授胡龙腾对前人学者的文献综述后发现：现有研究认为女性较男性更具利他和道德的行为，较不能容忍贪腐；20—39岁民众较20岁以下及60岁以上民众更容易被要求行贿；社会的教育程度与贪腐发生率成反比；不同职业类别的公民，在贪腐容忍度上也会有差别。

在此基础上，苏、胡利用台湾《廉政体系革新与指标研究》在2007年所做的调查，将受访民众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进行区分并进行相关的统计，最后得出结论：

性别方面，对贪腐高容忍的人以男性居多（55.9%），而中、低容忍度的人群中女性占多数（54.2%与51.3%）。由此可见，女性对

于贪腐的容忍度要低于男性。对此，苏、胡提出三点解释：首先，性别限制了女性参与贪腐的机会，许多贪腐的运作中，均是以男性网络进行；华人社会传统是“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所能面对的贪腐状况与男性所面对的完全不同；女性需要常为孩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标准，所以对贪腐的容忍度较低。

年龄方面，对贪腐高容忍的人以30—49岁的民众最多；中容忍度人群中，60岁以上民众最多；而低容忍人群中，20—29岁年轻人占多数。对此，苏、胡并不能确定这是否意味着随着年纪增长，人逐渐被社会驯化，显示出较高的贪腐容忍度。但是从数据中，这种趋势可以一见端倪。

受教育程度与贪腐容忍度之间的联系则非常显著。对贪腐高容忍的人群中，高中、高职教育者居多；中容忍人群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居多；低容忍人群中，高中、高职教育者最多，大学及以上教育者次之。高中、高职教育者对贪腐的容忍呈现出较为两极的结果，各有可以接受贪腐与不能接受贪腐者。较为值得关注的是，在低容忍人群中，大学以上学历者也占相当大比例。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受过高等教育者对贪腐的厌恶程度可能较高。

职业方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白领阶层对贪腐容忍程度的

认知较为分裂,一部分白领认为贪腐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部分白领则认为贪腐是无法容忍的现象。

对于研究结果,苏、胡二人建议,政府应该运用女性的高道德感、年轻族群的正义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及部分具有实务经验、却又对贪腐显得痛恶的白领主管,授予其监测及打击贪腐的知识与能力,使之成为社会上反贪腐的主要力量与廉政工作的尖兵。

参考文献

- 苏毓昌,胡龙腾(2013)。〈谁能容忍贪腐?〉。《台湾民主季刊》,第十卷(第二期),1—38。

政见中国
互联网

译言、字幕组、公开课……

互联网翻译文化如何构建公共空间

发展公共空间一定要从政治讨论开始吗？流行文化的兴起是否可以成为构筑公共领域的路径？作为一种特殊的迷群，中国的网络翻译迷群有着典型的非物质主义倾向，他们的行动尚不能说是政治取向的，但至少是具备公民性的。

◎ 赵蒙眇

发展公共空间一定要从政治讨论开始吗？流行文化的兴起是否可以成为构筑公共领域的路径？近年来，随着在线社区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成功的线上动员个案越来越多，特别是去年 Kony 2012 视频引爆互联网后，由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迷群行动主义（fan activism）的概念受到了很多媒体研究者的关注。迷群即通常所说的粉丝，年轻人们围绕一个或一类文化产品形成在

线社区,时空上的区隔并不能妨碍他们在虚拟空间上表达看法,甚至共同发起线上线下的行动。这些社区构成了迷群行动主义得以形成的基础。

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的张玮玉和毛成婷在今年初的期刊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上,以中国大陆过去五年间兴起的网络翻译文化为例,讨论了这种特殊的迷群行动主义在互联网政治中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普及以前,关于迷群的新闻框架常常是负面的:媒体总是强调迷群成员怪异、疯狂和不理智的一面,将一些突发事故归因于迷群的骚乱。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关的研究趋向正面,开始有学者注意到迷群分享性和志愿性的特征,将其称之为全球化下的非物质主义劳动者。总之,迷群既是具有变革潜质的社会能动者,也受制于其所追随的流行文化。

在中国的语境下,各种迷群兴起的前提除了社会整体的多元化外,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政权的放任态度。在很长时间内,迷群的活动被认为是转移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政权合法性的维持。为了进一步防止迷群的议题扩展到公民参与的领域,国家通过设置官方的流行节目和文化奖项,积极地将现有的迷群活动

纳入自己的框架。

研究者把如今的网络翻译迷群平台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社区网络，包括东西、译言等文本翻译社区，和专职翻译外文影像资源的字幕组社区；第二类是传播类网站，比如公开课和视频网站；三则是发布译文的博客，比如译者。作者访谈了各个分类中的项目发起人与翻译志愿者，他们大都是业余爱好者，只有极少数是专职翻译。

大陆翻译平台的兴起源于受众对跨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发展脉络上，呈现出从游戏漫画到字幕组，从娱乐导向到信息导向，从完成单一任务到搭建跨国界与合作性的翻译平台。作者认为中国互联网公开课文化的出现是协作翻译模式转换的重要标志，因为正是其巨大的受众群，使得以往各行其道的翻译平台间有了共同的传播目标，从而推衍出一个公共空间的雏形。

作者通过访谈发现，翻译平台的协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强调自己非功利的动机，并看重自身对于原文本的选择权。也就是说，志愿者们更倾向于翻译自己本身感兴趣的、认为有价值的话题，这也成为特定的翻译项目被认领的前提。访谈对象所指的兴趣，不完全是单纯的个人喜好，而是多多少少掺杂了公共意识。尽管大多

数被访者在被问及从事志愿翻译的首要动机时，都选择了个人爱好而非公众利益，但是他们同时承认这两者间是一种相互激励的关系。事实上，很多被访者心中存在着一种责任意识，即“我，而不是别人，才是应该翻译它的那个人”；一旦接手了相应的任务，就有责任做好，而不是拱手“让别人把原文给毁了”。

相比之下，网络翻译迷群对于自己翻译行为的外部效果预期则非常实际，他们从不寄望于几篇译文能改变大家的认知，甚至影响社会。很多志愿者相信网络开放，来去自由的理念，他们不会采用倡导性的手段要求他人去阅读自己的译文，而只是等待真正感兴趣的人一起来分享。然而，虽然内容制造者本身并没有赋予自己的工作太多的公共价值，但公开课等却在客观上传播了开放资源与分享互赢的理念，有的内容甚至对于普及公民意识也有促进作用。这种开放网络的理念与封闭国家的控制间即使没有正面对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冲突。当国家试图用商业的逻辑去吸纳，用监管的逻辑去过滤可能引发迷群集体行动的流行文化区块，互联网翻译文化的非物质主义取向使得国家收编和阻隔的努力失效。迷群的行动被迫在实现价值和自我审查间寻求平衡，但它们永远不会成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零件，他们的行动尚不能说是政

治取向的,但至少是具备公民性的。

近两年,对互联网翻译文化的讨论存在着多个面向,有研究者发现迷群内部存在多样化的角色扮演和身份建构,也有学者认为翻译社区的价值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与利他主义的结合。不管怎样,翻译迷群与其他迷群在价值基础和行为模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代表着一种新的迷群行动生态。中国互联网迷群的内涵,也将在技术和政经因素的互动中得到丰富。

参考文献

- Zhang, W., & Mao C. (2013). Fan activism sustained and challenge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Chinese online translation communiti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 45-61. <http://dx.doi.org/10.1080/17544750.2013.753499>

如履薄冰：中国网络的公民社会

西方对公民社会的认知有一个很重要的推定，那就是社会比政府在根本上要更加有道德合法性 (moral legitimacy)，而这个推定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韦伯指出，中国早期特有的政治系统意味着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直系的，互相依靠的，而不是独立的。中国的道德传统也往往鼓励个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和谐，因此，中国公民社会的存在更多是基于义务及与政府之间的互相依赖，而非西方所说的权利和责任。

◎ 缪莹

对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的定义众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给出的是：“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这些团体的存在，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个人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中西方学者所共同关注的。这种并不围绕阶级所展开的集体行动，其力量和意义不可小觑。

西方对公民社会的认知有一个很重要的推定，那就是社会比政

府在根本上要更加有道德合法性 (moral legitimacy), 而这个推定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韦伯指出, 中国早期特有的政治系统意味着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直系的, 互相依靠的, 而不是独立的。中国的道德传统也往往鼓励个人、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和谐, 因此, 中国公民社会的存在更多是基于义务及与政府之间的互相依赖, 而非西方所说的权利和责任。

然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学者们意识到这种关系已经发生了悄然的转变。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一方面允许公众利用之前没有的空间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愿望, 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这种表述渠道来更多地影响之后的改革路线。在信息技术发达的当今, 网络是最好的公民社会表达渠道。对于新时代下中国公民社会的特质, 澳大利亚学者伊恩·韦伯 (Ian Weber) 做了一番研究。

韦伯用了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在 2007 年厦门 PX 事件中, 网络博客和手机短信成为了大批量传播信息的方式, 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公众的视线集中在 PX 和它可能带来的健康危机上。六个月后的上海平阳区, 担忧磁悬浮会带来健康问题的居民们通过网络邮件和短信等力量聚集在一起, 对当地政府提出了异见。

如此来看, 似乎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 网络成为了自

发性组织的最好温床。但是韦伯同时指出，这两个案例中的参与者们公民意识十分破碎，并不能和大范围的合作性的公众行动混为一谈。事实上，韦伯认为，在这两起“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中，由于厦门和上海是经济发达地区，那里的居民们并不愿意直接和政府冲突，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经济特权受到影响。在这两起事件中，居民们的反抗是消极的，却又能够凝聚在一起，一方面造成了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一方面并没有直接挑战政府的权威，也没有影响到社会稳定。

厦门和上海的成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两个地区发达的经济。这两个地方的经济实力直接转换成了一种和当地政府权力共享的关系，以至当地居民可以和政府有互相信任的对话，以达到某种共识，而不影响整个社会大局。

当然，这样的公民社会的影响是相当局限的，因为公民们缺乏集体意识，更容易在不同的事件上聚集在一起，而非主动提出改变。何况，中国政府依旧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资本控制者，它掌控着社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按钮，可以轻易决定社会和政府之间是权力共享还是独享。

由此看来，中国目前的公民社会依旧如履薄冰，它所走的每一

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地判断政府和国家的反应,以防伤害到公民所依赖的国家给他们带来的利益。

参考文献

- Weber, I. (2011). Mobile, online and angry: the rise of China's middle-class civil society? *Critical Arts: South-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25(1), 25–45.

新媒体如何促进中国民主政治？

薄熙来一案的审理，由济南中院通过微博进行直播，可谓是新媒体参与中国政治进程的最新诠释。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上，新媒体对中国的政治环境产生了什么影响？美国明德学院的 Orion E. Lewis 认为更温和理性的网络讨论，会在混乱而多样化的网络话语体系之中继续存在，并逐渐发展壮大。

◎ 邵立

薄熙来一案的审理，由济南中院通过微博进行直播，可谓是新媒体参与中国政治进程的最新诠释。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上，新媒体对中国的政治环境产生了什么影响？美国明德学院的 Orion E. Lewis 利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分析框架在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Lewis 认为,新媒体相对独立的媒体地位,为公民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让信息在“水平”方向流动,为人们进行民主商议打下了基础。为了证实这个观点,他对国内几份都市报以及腾讯网进行了对比的内容分析。结果发现,腾讯网刊登非常核心而“敏感”的政治新闻的频率,仅次于《南方都市报》以及有地理优势的《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而高于其他都市报。

此外,文章也对都市报和网站上的新闻评论进行了讨论。Lewis 设定了“挡箭牌”评论 (shielded editorial) 的概念——这类文章使用官方宣传语言和自己对政策观点相结合进行修辞,以躲避风险。他认为,“挡箭牌”含量越高,越说明该媒体所受的限制越多。结果发现,腾讯网上刊载的新闻评论,“挡箭牌”的数量少于所有都市报。换言之,腾讯网上的评论而更倾向直接讨论相关政策议题,更直接提出观点。作者据此认为,新媒体提高了信息到达公众的可能性。在传统媒体受到限制之时,信息依然可以在新媒体上广泛传播。

在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框架还要求公众能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对公共议题进行理性的、互动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必须保持对议题的高度批判态度。作者认为,新媒体的发

展,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更具批判性的公共讨论。他认为,随着表达的多样化,批判意识的确已经在网民中流行起来。来自不同背景的舆论领袖也致力于在网上推动自己的政治观点,将事实上早已存在的国内多元的政治立场渗透到互联网的讨论之中。作者甚至认为薄熙来事件最终在网上的曝光,应得益于这种讨论。

最后,作者认为互联网促进了政治信息的“垂直”流动。例如网民对贪腐官员的监督和“人肉搜索”,或者利用信息技术工具进行线下的抗议活动,让政治表达从纷繁复杂的舆论场流向政府的决策核心,迫使政府进行回应,履行自己的责任,改善对国家的治理。

但作者并不想表达完全乐观的态度。他指出:新媒体技术在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时,也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更多的信息自由,并不能免除人们受到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和对议题敏感度的影响,产生对信息扭曲的理解。更充分的议题讨论,却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声浪掩盖了理性的声音。碎片化的受众架构,也使很多网民固守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只接受片面的观点和讨论。而政府也不必然会改善自己的责任制(accountability),而是对公众网络动员进行更多的审查和干涉,或者以更多样的方式进行威

权政治宣传。即便如此,文章坚信:更温和理性的网络讨论,会在混乱而多样化的网络话语体系之中继续存在,并逐渐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 Lewis, O. A. (2013, March 21). Net Inclusion: New Media's Impact on Delibe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31. doi:10.1080/00472336.2013.769387.

政见中国

他山之玉

民主必然促进人权？东南亚的实证分析

民主发展至一定程度之际，人身自由权可以达到充分的保障，但是如何达到这种理想状态，人们的理解仍然不足，尤其是在世界中的政体大部分出于“半民主”的状态之下，“民主-人权”关系需要更复杂的研究。此外，现代化逻辑在东南亚地区无法成立，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并非本地区人身自由权保障的预测指标。

◎ 马军

“民主、发展、以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之间有着彼此强化的关系。”这是1993年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指出的。然而，这一简单的“民主-人权”命题到底是一个拥有实际基础支持的理论，还是一个规范性理想的陈述？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所博士后颜永铭通过梳理1980年代以来的人权政治实践得出结论：对于不同类型的人身自由权，

民主的保障效果不尽相同。也就是说,简单的“民主-人权”命题在东南亚遭到挑战。

经历了 60、70 年代的政治动荡,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态势在 80 年代后逐渐缓和。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91 年巴黎和平协定,为东南亚区域安全扫清了最大障碍;东南亚成功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2007 年东南亚各国签订东协宪章……伴随着东南亚的政治发展,东南亚地区的人权状况也有大幅提升:2009 年东南亚人权委员会成立、审判红色高棉国际刑事罪行的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开始正式运作、昂山素季恢复自由并且进入国会……诸多现象与 1990 年代人们对该区域的人权价值的负面态度大相径庭。

人权概念起源于二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屠杀的惨剧,使全世界体会到对于个人生命自由的保障应当超越国家主权的藩篱。在政治学理论中,国际关系与比较政治两大领域均对人权政治理论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国际关系领域中,现实主义学者不承认人权议题在国际关系当中的重要性,认为外交政策中若过度重视道德原则,对于国家安全以及国际稳定都会带来危害,他们认为人权规范的扩张是权利

政治的产物，是强权国家对弱势国家的威胁和利诱。而国际关系中新兴的建构主义理论则强调具有使命感的倡议分子在人权规范兴起阶段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倡议分子与非政府组织、国际机构串联形成的跨国倡议网络有助于人权规范的扩散与落实。

比较政治领域则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发展、民主状况和人权之间的关系。现代化理论者认为，经济发展有助于人权状态的改善，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在基本温饱的情况之下，人们会转而要求政治社会变革，重视个人权利。同样，比较政治领域的学者也大都认为民主社会比较能够尊重保障人权，因为两者共享的规范与价值目标相同、自由民主体制所具有的的选举与制衡的机制也有助于对人权迫害的政治人物进行课责，现有不少研究也都证实，民主程度越高的国家，人权保障记录越好。

针对上述理论的讨论，颜永铭选取了东南亚十个人口超过三十万以上的国家：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缅甸和东帝汶。通过对这十个国家 1981 至 2008 年近二十年的经济、人权发展变化指标的统计进行研究，最终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在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脉络中，无法得到经济发展与人权

保障之间正相关的依据。在本区域内,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如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在人权价值的态度上迄今依然保守;而在本区域中人权理念较为开放的菲律宾和泰国,在经济发展上则处于相对落后的趋势。

其次,统计结果显示,“民主-人权”的关系在东南亚并非全面一致,综合性人权指标所反映出的“民主促进人权”的观点,只是部分人身自由权要素与制度民主之间关系的反应,是一种以偏概全。民主程度较高的东南亚国家固然不再大量拘禁政治犯,不再秘密绑票并处决异议人士,但这并不等于执政者会自动全面放弃各项压迫性质的统治手段,甚至有可能因为转型期间的政治动荡,而让执政者更加仰赖某些压制性策略来维持秩序。

第三,民主程度对具体的人权保障的影响力方面,研究结果认为,当制度民主分数每增加一分时,强迫失踪的现象改善的可能性将增加 11.2%、囚禁政治犯情况改善的可能性则增加 13.6%,酷刑虐待的可能性则下降 23%,民主制度对于人权保障的具体促进作用还是相当有力的。

综上所述,颜永铭认为:有相当证据确信,民主发展至一定程度之际,人身自由权可以达到充分的保障,但是如何达到这种理想

状态,人们的理解仍然不足,尤其是在世界中的政体大部分出于“半民主”的状态之下,“民主-人权”关系需要更复杂的研究。此外,现代化逻辑在东南亚地区无法成立,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并非本地区人身自由权保障的预测指标。

参考文献

- 颜永铭(2013)。〈民主必然促进人权? 东南亚人权保障的实证分析〉。《政治科学论丛》, 56, 91—118。

台湾特色民主与合法性

台湾民主转型中基层警察、地方精英扮演了什么角色

民主化瓦解了权力垄断，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得警方在多重权力的竞技场中履行职责。地方精英在民主化的启动与巩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他们多半通过街头运动甚至帮会起家，又将民粹气息与暴力带入了台湾民主进程。

◎ 陈仲伟

民主化瓦解了权力垄断，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得警方在多重权力的竞技场中履行职责。地方精英在民主化的启动与巩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他们多半通过街头运动甚至帮会起家，又将民粹气息与暴力带入了台湾民主进程。

民主在重人情、轻法治的中华文化圈会以何种方式运转？在台湾民主转型中，基层警察与地方精英在冲突解决中的角色，经历

了何种演变？其合法性源头在何处？这对西方既有理论带来何种冲击？

学者杰弗里·马丁有着托克维尔般的雄心，先后在台湾蹲点七年，采取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以台湾基层警察及地方精英在社会纠纷的角色为视角，对转型时期台湾的合法性问题进行研究。其中部分成果发表在美国法律社会学季刊《法律与社会研究》(*Law & Social Inquiry*)上。

马丁试图以他在台湾的经验，挑战拘泥于西方经验与视野中对“合法性”的定义。他认为：对合法性的定义应该置于国族建构与集体权利意识觉醒的历史进程中。

马丁回顾了台湾警政体制的建立过程——它由日本殖民者引入，为台湾构建了现代社会治理结构；它纵跨殖民时期、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到民主转型时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丁认为，台湾民主转型并未改变台湾地方治理的生态，只是政治空间和参与机会由国民党党内扩大到体制外。而这种政治生态之所以能延续不绝，在于它根植于儒家宗法传统。以费孝通的观点，与法治相对应的是社会契约型社会，而中国社会呈现的差序格局与以礼俗治国相适应。尽管以西方标准言之，台湾警政制度及其与地方精英的

互动,并不符合凭藉正当法律程序建立的法理型权威,但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自身传统与民主化抗争进程中的。

在西方传统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中,警方代表国家,扮演的是制度化的角色,地方精英则代表社会,这一界限在台湾却并不分明。地方精英由民意代表、里长、桩脚、甚至非职业的地方事务积极分子构成,他们以人格与民望为资源。这种资源是凭借着地方民事调解与反抗威权政府等过程塑造出来。地方人士的权力是通过人脉而非授权或司法程序获得的。这是一种基于个人魅力与传统权威的混合型权威。他们以人情、义气、面子等传统价值为行为准则,却在制度化的国家机构中发挥作用。

他们的角色在警方的工作中被正式承认,很多时候,地方精英而非警方第一时间介入冲突,警方则成为冲突平息后的记录者。基层警察一般凭借权威倾向于现场解决问题,但一旦双方各不相让,出现聚众围观,争讼纷纭,警方无法迅速控制局面,他们便会将当事人及相关方从现场带到派出所,此时各方通常通过地方精英向警方求情,地方精英们则缓和气氛,协助警方理解事件背景与性质以便公正裁量。在警察培训教材中,情理法被给予了同等的关照——地方精英们的面子,警方还是要照顾的,甚至少数民意代表在说情

未奏效的情况下，在立法机构对警方提出质询，对事件解决施加影响。事实上，警局充当了各路地方精英施展政治影响力的舞台，而非移送法院之前的过渡。没有人脉的外地人一般会被客观处理。

马丁认为，这种基于人际关系和冲突背景的裁量，并非个人专断，而是权衡民意与司法正义的政治艺术。

台湾的民主化正是通过对民意机构与执行机构关系的调整实现的。通过对动员起来的基层民意机构的赋权，使其超越了威权时代唯我独尊的执行机构在权力架构中的地位，并化解了旧有意识形态话语“革命尚未成功”、“光复大陆”中，通过牺牲与担当为国民党预留的特权。警察部门的权力基础则由中央行政部门转变为各级民意机构。民主化瓦解了权力垄断，扩大了政治参与，使得警方在多重权力的竞技场中履行职责。

与此同时，负面问题使大量“法外立法者”涌现。他们通过选举获得的地位与资源，巩固与扩张个人权力，这种权力时常是非正式、法外甚至非法的。他们甚至与帮派结合或成为帮派“洗白”的途径。在民主化初期出现的黑道立法委员与暴力事件，多与此关联。直至2000年后，“法外立法者”在地方警务运行中依然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法外立法者”并非一概非法，甚至连“法外立法者”

中的帮会分子，都强调他们恪守传统规则与秩序（如要面子、讲义气）。“法外立法者”作为立法者，在民主化的启动与巩固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他们多半通过街头运动甚至帮会起家，又将民粹气息与暴力带入了台湾民主进程。

马丁认为，台湾民主化恰是在西方视角中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实现的。这些西方视角看来似是而非的状况，部分是由于概念转译时无法完全对应或失去其原本的语言环境造成。譬如在英文中的合法、正当、符合传统，在中文语境下，很可能出现合法却不正当，符合传统而不合法，或不合传统而正当的情况。台湾的民主转型已经完成，在基层其合法性并非以程序的规范化与法治实现，而是以警政制度的民主化实现的。该制度并非以法治形态运行，却完全具备合法性。

此外，他认为随着冲突的升级和影响的扩大，事件的处置权将被逐层提升，从而更有希望摆脱地方关系网的影响而被理性化处理。

不过，马丁的这一结论过于理想化，在台湾的两党格局下，如果发生的冲突能够被一定数量的人群所感同身受，它就具有了超越个案被政治化的可能，具有社会动员能力的在野党通过媒体炒

热话题,发动街头抗议。在这一过程中,为平息民怨,执政党可能一味纵容民粹,在野党为博取群众支持不惜鼓吹阴谋论,从而很可能使冲突溢出理性化的轨道。

参考文献

- Legitimate, J. M. (2013, Summer). Force in a Particularistic Democracy: Street Police and Outlaw Legislato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Law & Social Inquiry*, 38(3), 615-642.

政见外交

政见外交

战略与方向

习近平首访与中国外交新方向

从3月22日至30日，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次外出访问吸引了海内外各界的目光。引人注意的既有第一夫人为中国外交注入的新鲜活力，又有诸如中俄能源及军事交易等极易引起西方不安的话题。旅美学者孙云则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联系入手，为分析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策略增加了新的纬度。

◎ 刘岩川

从3月22日至30日，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次外出访问吸引了海内外各界的目光。引人注意的既有第一夫人为中国外交注入的新鲜活力，又有诸如中俄能源及军事交易等极易引起西方不安的话题。旅美学者孙云则从中国与金砖国家的联系入手，为分析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策略增加了新的纬度。

所谓的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根据

财新网的报道，金砖五国拥有全球近 30% 的国土面积及 43% 的人口，其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 16%。作为有别于传统先进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五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来创造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

按照孙云的判断，习总书记选择俄罗斯和南非作为首访的两个目的地完全符合中国领导人的习惯：第一，首访的国家一定都对对中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受访国必须对中国保持友好和欢迎的态度，确保领导人的初征告捷。在接受习总书记访问的国家中，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邻居和前盟友，也是习的前任胡锦涛的首访目的地。在南非，习总书记参加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并联合其他领导人发布了同意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宣言。

在关注习近平出访俄罗斯和南非的同时，孙云认为：美国的影响力不可忽略。即使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冗长的反恐战争，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强的军事力量。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对中国内政外交品头论足的习惯，无形中促使中国领导人积极寻求外部盟友以对抗美国的“遏制与包围”。

当然，仅仅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对金砖国家的热情也许过分简单了。孙云认为，中国加速打造金砖五国联盟的意图也是国

际大形势所趋。在传统经济强国遭受经济危机肆虐的今天,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经济增速显得光彩夺目。矛盾随之而来:欧美经济体虽然在沉重的打击下黯然失色,却依然不愿放弃制定世界经济规则的权力,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及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的提议置若罔闻。在无法推动世界传统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中国自然想到联合其它金砖国家改善国际经济的布局,并尽早树立自身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威信。

纵观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孙云判定:加紧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必定是中国外交的新重点。只是金砖国家机制能走多远,金砖国家之间的分歧是否能顺利弥合,还要看五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

【参考文献】

- Sun, Y. (2013, March 25). BRICS and China's Aspiration for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3/25-xi-jinping-china-brics-sun>

中国军费之争：合理担忧还是过分解读？

西方对中国军费逐年提高的关注究竟有几分是合理担忧，又有几分是过分解读呢？最近，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黎雅澹（Adam Liff）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艾立信（Andrew Erickson）在《中国季刊》中点评了中国防务开支引发的种种争论与猜疑。

◎ 刘岩川

在 2005 年举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中，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曾提出一个西方世界普遍关注的议题：既然没有任何国家在威胁中国，我们就不得不关心中国提高国防开支的动机。

诚然，中华民族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在曾因落后而被动挨打的中国，大幅提高军队战斗力似乎无可厚非。那么，西方对中国军费逐年提高的关注究竟有几分是合理担忧，又有几分

是过分解读呢？最近，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黎雅澹（Adam Liff）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艾立信（Andrew Erickson）在《中国季刊》中点评了中国防务开支引发的种种争论与猜疑。

“不透明”并非中国特色

西方军事观察家在分析中国军事发展时往往发出雾里看花之叹。虽然中国每年都会公布其国防开支的数字，但在许多外人眼中，这些数字远不能概括中国的所有军事投入。艾立信与黎雅澹列举了一些海外尤其关注却始终缺席公共视野的开支：首先，有关60多万武警官兵的开销并没有体现在中国的军费中；其次，中国没能开诚布公地展示其在太空军事项目、武器装备研发以及海外军购等方面的账目。

信息的不完善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美国国防部、北约以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各自为中国算了一笔账。其结论都远远超过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且彼此大相径庭。面对外界参差不齐的估算，艾立信与黎雅澹认可了某位中国国防官员的观点：世界上没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军事透明度，因为统一的军费计算方式本不存在。

此外，虽然外界认为中国所公开的军费漏洞不少，但在二位研究者眼中，中国所公布的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中国公开的国防讯息确实缺少西方关心的军购等内容，但另一方面，它却包含了解放军救灾、参与基建和支持大型活动（如奥运会）等方面的费用。因此，与其说中方的防务开支不透明，不如说外界对中国公布的内容并不感冒，而对某些没公布的内容抱有特殊的好奇心。

军事不透明是否只在中国存在？在对比了中美军费的计算方式之后，艾立信与黎雅澹发现所谓的“军事不透明”并非中国特色。首先，正如中国不把武警部队的开支计入军费，美国国防部的账目上同样没有国土安全团队以及国民警卫队的开支。其次，中国在火箭发射及核武器上的花费没有体现在公开的军费中，而美国的军用原子能项目也计在能源部而非国防部名下。最后，中国没有将发放给退伍军人的补贴纳入军费范畴中，而美国照顾老兵的任务同样由退伍军人事务部、财政部和劳工部而非国防部承担。

中国军费开支的庐山真面目

在证明外界对中国国防开支上涨的担忧存在种种不合理之后，艾立信与黎雅澹试图解析中国军费上涨背后的真正推手。

首先,通货膨胀对中国军费的“蒸蒸日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水电费、燃料费以及军队工资的上升,中国军费自然水涨船高。

其次,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并没有着力发展军事,现在的军费涨势有明显的“恶补”性质。与前几十年相比,新引进和研发的武器装备需要更昂贵的弹药、更精心的养护以及更精良的操作手。和中国经济一样,中国军事也在为淘汰落后产能、锻造高科技和高效率付出不菲的代价。

托起中国军费的最大推手,莫过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内外形势。艾立信与黎雅澹指出,幅员辽阔的中国不但要平衡国内不同群体的利益,也要经营和14个邻国的关系。而在这14个邻国当中,还有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和朝鲜等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相应的,中国近年来的军事投入并不集中于远程投射能力,而集中在关乎领土维护的近海作战能力。两位作者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军费上涨是形势所迫。

需要强调的是,艾立信与黎雅澹并非企图彻底否定外界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关注,而是指出:那些没有公开列出的开支不值得引起恐慌。二位作者的研究证明,世界上确实不存在统一的军费计

算方式,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充分构成了其大力发展军事的动机。虽然中国军费节节攀高,但西方应该看到中国的军事发展始终重在维护自身领土。未来的中国也许会发展远程扬兵的能力,但如艾立信与黎雅澹所言,那将消耗掉数目不可估量的资源。目前,北京既无心又无力考虑那遥远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 Liff, A. P., & Erickson, A. S. (2013, March 25). Demystifying China's Defence Spending: Less Mysterious in the Aggregate. *The China Quarterly*.

中国北极战略：参与者？改革者？

从安全和经济角度看，中国“北望”自然而然。中国北极战略的基本逻辑是与北极地区国家展开合作，尽力保持北极地区国际政治博弈现状，避免对抗。同时，反对北极地区国家形成排他性“小集团”。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中国的“软实力”，参与北极事务，并影响现行北极治理模式。

◎ 宿亮

2013年8月8日，中国远洋航运旗下“永盛”号商船从上海启程，穿越白令海峡，经北极航道前往荷兰港口鹿特丹，预计到达日期为9月11日，比穿越苏伊士运河的传统路线缩减12至15天航程。这是中国航船首次选择“极地线路”。

在此之前不久，中国已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并在上海成立首个以北极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为主的机构“中国-北欧北极合

作研究中心”。

中国“北望”似乎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美国研究机构估计，在尚未勘探的资源中，北冰洋深海中拥有 13% 石油、30% 的气态天然气、20% 的液态天然气。另外，北极地区拥有占全球储量 9% 的煤和众多钻石、黄金及铀资源。更不用说，北极航道能够有效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解决中国的“马六甲困局”。

以“永盛”号所走航线为例，比传统航线减少 22% 的距离。同时，船只还可以不受苏伊士运河船只吨位的限制。据估计，中国通过北极航道每年大约能够节省 600 亿到 1200 亿美元。

不过，北极这样的“肥肉”吃起来并不容易。不少国际政治学者认为，北极可能引发各国“新冷战”。俄罗斯政府曾公开警告，北极地区在 10 年内可能爆发战争。除中国外，欧盟、印度等国都看重北极的地缘和经济价值，积极参与北极事务。而北极圈国家组成的北极理事会对于全球开发北极并不“感冒”。

最新一期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论》(*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发表学者夏伊洛·伦沃特 (Shiloh Rainwater) 的文章，分析了中国正在形成的“北极战略”。

伦沃特认为，中国北极战略的基本逻辑是与北极地区国家展开

合作,尽力保持北极地区国际政治博弈现状,避免对抗。同时,反对北极地区国家形成排他性“小集团”。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中国的“软实力”,参与北极事务,并影响现行北极治理模式。

首先,中国在北极地区积极开展“科学外交”。除派出“雪龙号”和新型北极科考船进行独立科研外,中国研究人员积极参加北极科学峰会周、国际极地年项目等北极地区科研活动。

其次,中国尝试通过更多参与北极治理来获取更多影响力。在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之前,中国曾多次申请,“屡败屡战”,努力跻身“北极俱乐部”。

最后,中国以北极地区国家为对象,开展资源外交。中国在加拿大、俄罗斯、丹麦和冰岛都积极进行资源勘探项目合作,并拿出大量资金注入这些项目,以拉近与北极地区国家的关系,换取在北极事务上的更大发言权。

从大背景观察,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积极介入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实力增强的现状。在国际政治领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崛起之后的中国,究竟是一个“维持现状国”还是“变革主义国家”?换句话说,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目标是希望成为极地国际社会机制的参与者还是改革者?

所谓“维持现状国家”，即遵守现行游戏规则，并从中获益的国家；而“变革主义国家”指对自身在现有体系内的地位不满，希望重新设计各国关系体系形态。简单来说，前者希望维持均势状态，后者要求改变现状。

美国著名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2003年指出，“维持现状”和“变革主义”不是非黑即白的概念，存在程度差异。根据国家参与国际社会活动和对国际组织的态度，江忆恩在“维持现状”与“变革主义”两个极端状态中间列出5个“档位”。伦沃特认为，中国在北极地区的状态居于中间位置，既给北极圈国家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

中国“北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保证能源安全基础上的。不少学者认为，由于在能源领域不断增强的对外依赖程度，中国不会尝试改变国际社会现行规则，危及能源稳定供应。

不过，伦沃特分析，也正是因为这种对外依赖，中国政府几年来推动海军现代化进程，主张“远洋防卫”或“蓝海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并不排除中国在通过外交途径不断增强其在北极地区的发言权之后并以较强姿态保护出入并使用北极地区商路的权利。中国多次明确表态，难以想象非北极国家在不参与北极地区治理

的前提下还能够开发北极地区资源和利用北极航道。

伦沃特认为,中国选择加入现有北极治理体制,遵守其共同制定的原则规定,但在时机成熟时,中国会选择提出新的模式以推动北极地区国家向全球开放北极资源和航道,调整现有治理体制。

在“和平发展”大战略下,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维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领土完整是核心利益。在北极问题上,同样的利益选择依旧适用。中国的北极战略必将建立在维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和能源稳定供应的基础之上,并积极参与北极地区国际政治机制演进和改革。

参考文献

- Rainwater, S. (2013, Spring). Race to the North: China's Arctic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66(2).

中国不愿遵循国际法？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学者认为，中国政府不是一个国际法的破坏者，而是参与者和制定者。事实上，在一个小范围的法律环境下，遵守法律要求、合理利用规则能够为个体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而在国际法环境下，作为崛起的国际行为体，中国的加入一方面确保原有法律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能够推动这一体系在最大限度实现“共赢”。

◎ 宿亮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不少西方国家中流行“中国威胁论”，其重要论据就在于中国政府国际化程度不高，过于强调主权原则，在集体安全、气候变化议题上并不愿意遵循国际法。用国际法院中国籍女法官薛汉琴的说法：“中国坚持主权原则被西方错误地理解为无视国际法的发展，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摆脱国际责任的借口。”

国际法指的是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

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它包括成文法和习惯法,前者指的是各类国际条约,后者则指普遍或区域性的国际实践。在国际社会,国际法的适用范围、法律权限等议题往往成为争议焦点。

那么,中国政府实践中体现出对国际法的态度是什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法学院教授本·萨尔(Ben Saul)在《亚洲研究评论》(*Asia Studies Review*)上撰文指出,中国没有完全摒弃国际法,而是在外交实践中积极介入国际法;同时,中国在当代国际立法中也发挥一定的作用,并寻求用国际法保护自己。

历史上,中国与基于西方国际关系的国际法多次“邂逅”,都没有留下什么愉快的记忆。一些法学学者认为,早期西方国家把商业、殖民和军事强权为基础的不合理法律体系强加给中国,导致长期民族屈辱历史。自从1971年加入联合国以来,中国认识到“游戏规则”的重要性,开始尝试参与国际法律活动,如1972年斯德哥尔摩环境问题会议和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方面加强了国际法教育,另一方面采取介入国际法律体系的外交政策。迄今为止,中国已经是300多个多边条约缔约国、130个国际组织成员,并签订100多个双边合作协定。同时,中国一些国内法也受到国际法影响,刑法、民事

司法合作、贸易法等越来越受到国际标准影响，一些涉及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消除贫困的国际“软法”也开始影响中国的行为。

另外，“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开始意识到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促使中国与国际法的关系更加紧密。

萨尔在文章中分析中国在三种国家资源活动上参与国际法互动的案例，即领土资源、自然资源和贸易资源。

就领土资源而言，一些西方国家批评中国在领土议题上强硬的主权态度，但萨尔认为，维护领土完整是国际法框架下国家特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态度无可指摘，何况中国也正努力通过国际法框架谈判解决这些问题。

以台湾问题为例，中国提出的领土声明有充分国际法证据支撑。在面对科索沃等国际领土纠纷时，中国也坚持一贯主张，符合国际法时间要求。边界争议上，中国政府采用谈判方式与俄罗斯、越南、中亚国家以及曾经剑拔弩张的印度解决边界分歧。中国在国际法律框架下的整体态度较为克制。

在领土资源上，中国对国际法的贡献体现在对香港和澳门的处理上，“一国两制”可以看做是国际法的一种创新模式，也体现了中国并非西方国家所认定的过分纠结主权原则，而是具备政策弹

性并坚持以国际法律框架解决问题。

在海洋纠纷上,中国的每一项主张都有国际法律依据。多次海域或岛屿归属问题上引发的军事对峙往往不是中国单方面挑起的。中国在这一议题上也没有仅仅依靠军事力量解决,而是在多种法律框架下,如东盟,尝试与争议国家接触、谈判,并就渔业等实际领域率先达成协议。

萨尔认为,这些实践活动证明中国遵从国际法原则,没有推行扩张政策,也不会推行扩张政策。中国在领土资源上强调主权原则是一种防御概念,而不是进攻概念。换句话说,中国强调保卫主权领土、资源,而不是向外扩张、侵占别国资源。在现代经济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依赖于土地的第一产业相对更为要,中国不会冒着损失经济利益的风险扩张领土。即便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中,确保多边经济合作带来的利益对中国远远比领土扩张大得多。

就自然资源而言,中国支持多数发展中国家强调的自然资源国有主张,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解决争端。

当代国际法谈及自然资源时坚持的是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各国制定相关国内法以推动解决使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带来的环境问题。就中国国内情况而言,存在资源分配不公、污染严重的问题,

但并非不是没有相应的国内法，而是在执行环节上出现问题。在国与国层面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也就环境问题成立过联合执法机构，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后与俄罗斯方面紧急联合处理机构。在环境问题上，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应为防止气候边诺提出的策略体现了中国参与并影响国际法。

另外，中国对外投资缺乏国际法监督一直是国际社会批评的焦点。中国企业早期的能源投资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非洲等地涉嫌破坏当地环境、拒不使用当地工人以及滋生腐败等。不过，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制定相关法规已经开始使情况有所改善。

就贸易资源而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本身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法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一方面，加入WTO保证了中国拥有稳定的贸易关系和可依据的贸易仲裁机构；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一系列承诺确保了中国的贸易行为遵循国际惯例，这都体现了中国贸易活动遵从国际法体系要求。

同时，中国在WTO框架下与很多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获得推动中国所主张新贸易秩序的平台和机会。这体现了中国正参与国际法改革和新法制定过程。

综上所述，萨尔认定，中国政府不是一个国际法的破坏者，而

是参与者和制定者。事实上,在一个小范围的法律环境下,遵守法律要求、合理利用规则能够为个体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而在国际法环境下,作为崛起的国际行为体,中国的加入一方面确保原有法律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能够推动这一体系在最大限度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 Saul, B. (2013). China, Natural Resources,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Asian Studies Review*, 37(2), 196–214.

政见外交

中美关系

黑非洲：中美经济逐鹿的竞技场？

除了通信技术产业，中国和美国的公司通常进入完全不同的经济领域进行经营活动，直接竞争非常有限。这也部分归因于美国公司常常对部分高风险且市场规模较小的非洲国家避而远之。

◎ 周航

随着习近平主席选择将非洲国家作为首次出访的目的地之一，各界再次将聚光灯对准中非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在过去的几年中，外国媒体不时用“新殖民主义”或“掠夺资源论”来形容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投资活动。然而，这种指责是否意味着其他经济大国与非洲维持着更为平等、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合作模式？美国政府责任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最

近出版的研究报告尝试比较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合作和投资活动的异同。

贸易：中国已超越美国

在 2001 至 2011 年期间，中美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的发展总体均呈向上趋势。中国与该地区的经贸关系发展尤为迅速，并在 2009 年首次取代美国成为黑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 年，中国对黑非洲出口贸易额已经接近美国的三倍。

中国和美国从该地区的进口都以自然资源为主。自然资源（主要是石油和各类矿产）的出口占据黑非洲对美国出口的 90% 和对中国出口的 91%。中国对该地区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如棉织品和鞋。机械和交通设备器材也是中美出口的重要部分，但是美国主要出口机动车和土木建设设备，而中国则主要出口船舶以及电信设备。

援助、贷款和投资：各有千秋

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援助大幅领先于中国：从 2001 年的 14 亿美元，逐年增长到 2010 年的 92 亿美元。大部分援助用

于卫生健康领域和人道主义救援。

中国政府并未定期公布其对外援助的详细情况。但是根据专家估计，2001年至2009年间，中国累计对整个非洲大陆提供了约为60亿美元的援助。

中国对非洲的政府贷款数量较美国更为可观。美国对外政府贷款的发放主要由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负责，这两个机构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贷款在2001到2011年期间总体保持增长，累计贷款总额达到116亿美元。中国对非洲的贷款主要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但是中国政府未公布任何相关的正式详细数据。进出口银行主席于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其机构在过去的7至8年间向整个非洲大陆提供了大约380亿美元的贷款；而美国进出口银行在此期间只提供了98亿美元。

投资方面，根据中美的官方数据，在2007至2011年期间，两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海外投资波动较大。美国的投资累计达到166亿美元，比中国高约40亿美元。两国最主要的投资领域均为采矿业。然而，中国的官方数据被普遍认为比实际情况偏低：一方面，许多国内的中小型企业并未向中国政府汇报其海外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常常借助其在海外子公司对非洲进行投资，而这

些交易并未直接被计算为中国对非洲的投资。

中美几乎不存在直接竞争

该报告还就中美在三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肯尼亚、安哥拉和加纳）的经济活动做了更为细致的案例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公司往往集中在基建行业，而美国公司则更多在高端技术行业占有一席之地，如油气开采等。除了通信技术产业，中国和美国的公司通常进入完全不同的经济领域进行经营活动，直接竞争非常有限。这也部分归因于美国公司常常对部分高风险且市场规模较小的非洲国家避而远之。

来自中国的假冒产品对美国公司的产品销量和声誉起到一定负面的作用，这种情况在肯尼亚尤为突出。为此，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专门资助当地公众教育计划，加强当地民众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警戒和认识教育；美国政府也为肯尼亚的反假冒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非洲政府的影响不能低估

非洲国家政府通过各种政策使当地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从海

外投资中获得实益,例如:要求海外投资者雇佣一定比例的当地员工,与当地公司合作经营项目或者使用当地材料等。

在这些政策之下,中国企业在加纳和肯尼亚雇佣了大量当地员工,促进就业。加纳和安哥拉作为非洲重要的产油国,也要求包括中美公司在内的海外投资者在进行石油开采投资的过程中,履行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开展各类社区建设项目。此外,加纳和肯尼亚政府通过公布中国政府对该国贷款和赠款的相关详细信息,也增加了中国在非洲经济投资的透明度。因此,非洲政府的相关政策对海外投资者的行为和投资模式所发挥的影响不应被低估。

参考文献

-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2013, February). Sub-Saharan Africa: Trends in U.S. and Chinese Economic Engagement.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Requesters*, 1–89.

中美竞争,韩国如何“两面下注”

中美“互不买账”的状态,对韩国这种“夹缝中”的国家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中美之间虽然对立,但矛盾是“可控的”,地区合作共赢的“大盘子”不会翻。韩国只要在中美之间找好位置,就不会发生“神仙打架,小鬼遭殃”之类的事情。

◎ 归宿

二战后,在美国的帮助和影响下,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纷纷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近十年来,国力迅猛增长的中国对于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也愈发凸显,“亚洲老大”的地位更加突出。

奥巴马上台后,着力调整美战略方向,大力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却使中美两个大国产生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的可能性。该

地区的一些国家产生了被“夹在中间”的感觉，“在中美两个大国间保持平衡”也成了一些国家外交的基本理念。

近期，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发表了韩国学者 Jae-Kyung Park 的研究报告《中美在东亚地区的竞争关系：韩国的选择》，即可看作此类观点的代表。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对亚太地区加大投入，但却“互不买账”，甚至多边论坛和机制上也是如此——中国看重东盟“10+3”（ASEAN+3）机制对东亚地区融合与合作的促进作用，而美国则认为东亚峰会（EAS）更重要。在经济领域，中国一直力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而美国则大张旗鼓地搞自己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作者认为，这种中美“互不买账”的状态，对于韩国这种“夹缝中”的国家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中美之间虽然对立，但是矛盾是“可控的”，两国只会在“全面合作”和“全面对抗”之间摇摆，地区合作共赢的“大盘子”不会翻。对于韩国来说，只要在中美之间找好位置，就不会发生诸如“神仙打架，小鬼遭殃”之类的事情。

不过，韩国必须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尽管从历史上看，中间派往往两头不讨好，但对于韩国来说，这却是必由之路：美国是韩

国的盟友，为韩国提供安全保障；而中国则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中韩贸易量已占韩国整体贸易量的 20%，是美国的两倍多。

作者提出，单从对华政策来说，面对一个崛起已成“既定事实”的中国，韩国必须要“两面下注”。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在与能和中国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另一方面也能在与各日、美、东盟国家等相关方的互动中构建一种更为稳定、全面的伙伴关系，使韩国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作者认为，在当前中美地区竞争的背景下，韩国在外交上必须统筹解决好三个问题。

其一，是要避免被多边论坛和机制边缘化。目前，在地区最为活跃的机制都是东盟牵头的，韩国应该成为东盟的一个“聪明的伙伴”。这意味着韩国要更为积极的参与东盟事务。

其二，韩国要与中美两个大国应对好朝核问题。朝鲜要发展核武器，第一个遭殃的肯定是韩国。但目前，保持朝鲜的稳定依然是中国的优先战略选择，这就意味着在未来一个时期，朝鲜还将继续发展核武器，仍对韩国构成极大威胁。而美国对于朝鲜的强硬姿态也没有软化的迹象，如何调动好美国和中国应对朝鲜问题，也是韩国需要仔细考量的课题。作者提出，必要时，韩国可以引入东

盟等多边机制参与解决朝鲜问题。

其三,在南海问题上,韩国最终“原则上尊重现状,实际上灵活处理”。南海问题现在不仅仅是矿产和渔业的问题,更涉及历史和有关国家“民族尊严”,韩国在这个问题上不便表态。但是如果韩国能在具体问题上表现出一些灵活性,可能会占到不少便宜。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Park, J.-K. (2013, April 4). China-U.S. Relations in East Asia: Strategic Rivalry And Korea's Choic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兰德公司： 中美可建立“东亚海洋安全伙伴关系”

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高级官员龚培德认为，中美任何一方不能承担在东亚海域发生冲突的后果，可以建立一种“东亚海洋安全伙伴关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将中国纳入这样的合作模式，能够增加地区互信，减少误判可能。

◎ 宿亮

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以及“亚洲再平衡”策略的实施，西太平洋地区在二战后再次成为多方争夺之地。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中国近些年发展海军实力的初衷是把美国视作威胁；考虑到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美国要做出选择。

美国兰德公司2013年初发表研究报告《海洋力量与西太平洋地区美国利益》（*Sea Power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est-*

ern Pacific), 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高级官员龚培德 (David C. Gompert) 认为: 美国应选择与中国合作的海洋策略。

就海洋战略而言, 阿尔弗莱德·塞耶·马汉提出的“海权理论”是经典理论。马汉认为, 海权是强国的重要元素。称霸海洋的国家要培养“复合能力”, 一方面要保证自己进入海域的权力, 也就是控制海洋的主动权; 另一方面, 又要阻止他国驰骋海洋, 也就是捍卫权益的防卫能力。

龚培德在研究报告中梳理了海洋争夺史上的三次争夺。

第一次争夺的主角是传统海洋强权英国和崛起中的美国。在 19 世纪末, 英国没有阻止美国海洋力量走向强大。一方面, 当时的英国正面临更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 英美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和包括海洋安全在内的共同利益。

第二次争夺双方是英国和崛起中的德国, 也就是在美国崛起的同时英国所面临的“更大挑战”。德意志帝国把英国的海洋霸权视作海外扩张的最大威胁; 而英国认定德国崛起隐藏着霸权的潜力, 是对英国的战略威胁。最终英德及其集团的军备竞赛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

海洋史上的第三次争夺缘于 20 世纪 20 年代。那时, 日本海军

实力强大起来，试图控制东亚周边海域，而当时的海洋强国美国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龚培德认为，正是这种矛盾导致了日本最终撕破脸皮，在珍珠港开打。

在这三个案例中，英美之间的互动是最佳结局。这一段互动最终形成了英美在海洋安全的共存、合作以及达成同盟。

从中国方面看，海军能力已经从海岸防御发展到具备了保护争议水域贸易航线的能力。针对这种情形，不少分析师认为，美国有几种应对方法。例如，在可能的冲突状况下，构建“空海战体系”，多兵种配合作战，但这一方式在面对网络攻击时会体现一定的弱势。另外，美国可以建立多元化的海军体系，发展小型化、远程攻击以及隐蔽性强的军事方式，不过，这种方式受到美国军事预算的限制，难以实现军事单位的迅速移动。

龚培德认为，海洋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海洋贸易占中国总贸易量的95%，占经济总量的一半，所以海洋代表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如果美国一定要与中国在海洋对抗，前景并不看好；但如果选择与中国合作，追求当年英国和美国的模式，也许会推动两国的双赢。

他提出，中美之间可以建立一种“东亚海洋安全伙伴关系”，以

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这种伙伴关系不能以解决所有海洋归属争议的法律问题为前提,但伙伴关系的各方应承诺不以武力解决问题。将中国纳入这样的合作模式,能够增加地区互信,减少误判可能。

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中美在海洋问题上发生冲突,将会如何?当代社会,中美任何一方不能承担在东亚海域发生冲突的后果。由于技术的发展,各方单独控制海洋的能力被削弱,追求海洋优势的努力往往处于技术能力无法达成。为了避免冲突发生,合作是重要的解决办法。

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认为,在没有合作的博弈过程中,每一方均做出理性选择,却可能导致对双方最差的结果。国际合作在很多方面能够推动“双赢”、“多赢”,在不少情况下能够避免两败俱伤的结局。事实上,不只在海洋战略领域,中美在多领域都可以尝试更深入的合作,以避免重蹈某些历史覆辙。

参考文献

- Gompert, D. C. (2013). Sea Power and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AND Corporation. 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51.html
- Gompert, D. C. (2013). The Future of Sea Power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AND Corporation. 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briefs/RB9709.html

中美关系迎来关键节点

当前中美关系又迎来新的关键节点，中美两国政府应该下定决心，把握当前机会，进一步寻求共识，为中美关系未来健康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 归宿

6月7日至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中美元首会晤。这是中美领导层换届后双方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见面，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观察人士普遍注意到，此次会晤系非正式会晤，地点也并没有选在华盛顿。这种“不打领带”的会面形式，也是中美建交34年来的第一次。而习近平16个月内第二次赴美，也显示出中美双方对

于最高领导人直接见面沟通的急迫心情和务实态度。

与此交相呼应的，是美国学界关于建立更为稳定的中美关系的呼声渐起。近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会长大卫·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亚洲政策》（*Asia Policy*）上发表文章《新型大国关系：为中美关系寻求更为稳定持久的基础》，呼吁两国政府下定决心，把握当前机会，进一步寻求共识，为中美关系未来健康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山容二虎”

作者指出，中美两国曾经在 1970 年代建立过良好协同合作关系，但随后由于种种问题出现了波折。而前几年，中美两国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都受到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影响，认为美中作为霸权国家和崛起的新兴国家，最终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但事实上，中美两国两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新路，努力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两国在一系列双边和国际问题上开展了合作；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仅 2011—12 年度，就有 194000 名中国

学者和留学生赴美访学。

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也提出,中美应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努力把两国合作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美方官员的积极认同。双方用事实证明“一山”同样可以“容二虎”。

把握时机

作者认为,当前中美关系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关键节点。

中美两国新一届政府都刚刚开始执政,双方在外交、安全领域都发生了人事调整,一些经验丰富、温和务实的政治家将在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前期中美双方也都进行了密集的人员互访:时任副总理的王岐山在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就访问了美国;今年以来,美国国务卿克里、财长雅各布·卢、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等也密集访华。

目前,中美两国来均迎来了难得的时间窗口。特别是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在当前叙利亚、巴以和谈、伊朗以及国内监管争议等内外问题焦头烂额之际,稳定住中美关系,也是腾出手来解决其他棘手问题的前提条件。

相向而行

作者认为，建立“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还需要双方协调，更多的相向而行。

一是要努力使得两国的社会联系更紧密。紧密的社会联系是国与国之间良好关系的基础，更何况中美两国的政治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民意的影响。美国人最关注的就是就业问题，而日本也是到 1980 年代后向美国大量投资，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后，与美国的关系才真正好起来。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虽然增长很快，但总量还是很小。对于中国来说，应进一步加大向美汽车等产业投资；对美来说，也应该协调议员和地方政府，允许更多的中国资本进入。

二是中美应在国家层面上“管理”（manage）双边关系。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双方都应该再提升中美关系的层级，派出专门的国家领导人来“管理”好中美关系。现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这个对话机制毕竟牵扯面太广，间隔时间太长，讨论议题太多，影响了效率。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一种更为常态化、更有效的对话机制，双方的官员也应该加强沟通，以更好的

管理、维护双边关系，在危机时刻能及时管控矛盾。

三是中美双方都要“管好自己的人”。多年来，双方都有扶持或者利用第三方势力对对方不利的想法或冲动，有一些还付诸实施。但是，在当前国际博弈加剧，国际环境加速变化的大背景下，第三方势力往往给维护中美关系带来变数。因此，双方都要“管好自己的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2008年美国敲打陈水扁，使其不敢搞“台独”，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台海局势。作者提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也应该“投桃报李”，适当敲打敲打平壤。

四是进一步完善区域安全、经贸机制。亚洲人习惯在机制中协调一致解决问题。但在亚洲为数众多的区域安全机制排他性很强——有的排斥中国，有的排斥美国。这样的结果，是导致亚洲权力碎片化，任何一个机制都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作者建议，中美应合作使亚洲的各个安全、经贸机制更加具有包容性，增进互利共赢，使亚洲的合作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 Lampton, D. M. (2013, July).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S.-China Ties. *Asia Policy*.

中美军事合作：别错过“政策窗口”

中美两军关系复杂敏感，增进互信，提升两军合作水平不可能“一蹴而就”，双方特别是美方对此要有“现实的认识和预期”。但同时，双方也应把握住“政策窗口”，推动中美两军交流合作机制化建设，以更好地服务中美关系大局。

◎ 归宿

7月10日至11日，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双方再次确认将深化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双方在此轮对话中也表示将致力于加强两军关系，并在防务安全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具体成果：重申两国国防部长在今明两年互访，决定积极探讨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通报机制，继续研究有关中美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问题等。

相较于中美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程度，中美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无疑是短板。中美两军的低互信程度，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何有效地增强两军沟通和交流，改善并提升两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互信和合作，近年来也成为中美关系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兰德公司研究员、亚太安全政策专家 Scott W. Harold 在《亚洲政策》(Asian Policy)上发表文章《加强接触：提升中美两军关系之道》，提出了自己对此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现状不容乐观

作者认为，尽管中美两国、两军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加强中美两军合作的重视，但当前中美两军关系现状不容乐观，并突出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双方对于“加强两军关系”意义的理解尚未达成共识。在美方看来，加强两军关系的目的在于理解中国军方的“思维方式”，以更好地传递美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考量，特别是政策底线，这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而在中方看来，加强两军关系是促进自身现代化建设，向外界展现良好形象，改善周边环境的一种方式，战术

的味道更浓。这一认知上的偏差，影响了中美两军关系在两国关系整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造成中美两军关系多年来反复波折的重要原因。

其二，中美两军仍对对方疑心重重。美方担心中国军力快速发展，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美国内部也有人认为在防务安全领域对中方“让步过多”，呼吁应制定“更为实际和具体”的对华安全政策目标。而中方则认定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不怀好意”，美国近年来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更是直接针对、遏制中国。中美双方在对台军售、南海自由航行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也直接加剧了彼此间的战略猜忌，阻碍了两军关系的深入发展。

改善关系正当其时

作者指出，中美两军关系在中美关系大局中的地位重要而独特，而正是因为当前两军关系并不乐观，中美双方才更需要加强沟通和接触，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对美方来说，由于加强两军关系更具有战略意义，所以更应“先行一步”，“要更积极主动一些”。同时，中美两军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对维护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格局都有重要意义。

作者也提出,加强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合作必然存在一定风险,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军力不平衡的背景下,加强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合作肯定会让中国“占便宜”:即便是“美国愿意加强与中国军事交流合作”这件事本身就会让中国感到“有面子”。但是作者相信,随着两国军事关系日益密切,共同利益的不断增加,所谓的风险都会被逐渐化解。

既要“顶层设计”,更要“基层推动”

作者认为,就中美两军关系的现状而言,两军交流合作既要完善“顶层设计”,但更要通过“基层推动”来具体实现。

所谓“顶层设计”,就是中美双方领导人要在军事合作领域达成共识,为双方军事交流搭建框架,构筑愿景;所谓“基层推动”,就是要使中美军事交流常规化、务实化,增加互利互信,提升相互依存度,减轻中美军事交流合作的政治色彩。目前,中美两军可以开展合作交流的领域和渠道很多,双方也已经在反海盗、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下一步,中美双方应共同努力,更好的规划和拓展这些合作,以促进双方整体军事交流。

作者最后指出,中美两军关系复杂敏感,增进互信,提升两军

合作水平不可能“一蹴而就”，双方特别是美方对此要有“现实的认识和预期”。中美两军增进合作交流不会是一帆风顺，出现挫折也实属正常。但从长远看，双方当下增进交流的努力对于巩固两军以及两国的关系是有益的。同时，中美双方也应把握住“政策窗口”：未来的两到三年，中美关系将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双方应抓住时机，推动中美两军交流合作机制化建设，以更好地服务中美关系大局。

参考文献

- Harold, S. W. (2013, July). Expanding Contacts to Enhance Durability: A Strategy for Improving U.S.-China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Asia Policy*, 16.

政见外交

睦邻关系

日本职业外交官：中日关系三大障碍

日本职业外交官、曾担任驻华公使的片山和之回顾中日关系历史，指出双边关系障碍，认定双方存在历史问题、东海和台湾三大障碍。片山认为，中日双方应由共同利益驱动，而非情感驱动，尝试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在处理双边关系问题中有地区层面的思考，并有必要开展针对年轻一代的公共外交。

◎ 宿亮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大重要力量，两国之间的关系影响深远。日本职业外交官、曾担任驻华公使的片山和之（Kazuyuki Katayama）在学术刊物《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上撰文，指出中日关系障碍，从外交操作者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两国关系的几点原则。

对日本人而言，1971年的标签是“尼克松冲击”。这种冲击，

一方面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另一方面就是中美关系复苏的启动。美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让日本社会产生了一种被盟友背叛的心理，但这同时给中日关系正常化提供了国际环境。

事实上，中日关系正常化比中美建交早了6年。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有共同的敌人——苏联。其次，尼克松访华向日本传递了美国不反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信息。当时，日本社会有一种浓厚的为战争“赎罪”的情感，媒体、知识分子、政界人士和商人都支持中日关系正常化。田中角荣政府的上台推动了这一进程，而且，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多停留在经济上，日本亲台政治人士没有像美国亲台势力一样游说反对发展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的友好从正常化开始，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世代友好”、“一衣带水”都是那个时代的常用辞令。

冷战的结束则对中日关系影响巨大。

1989年，昭和天皇去世，在某种象征意义上带走了中日的战争时代。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访问取得成功，很多人因此期待一个中日关系新时代来临。

事实并非如此。中日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改变，先前共同敌

对的苏联不复存在。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衬出日本的经济停滞，中国民族自信心相对增强，不断强化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把日本放在了敌对一面。

1998年，原本计划夏天访问日本的中国高层领导人，由于救灾推迟行程。同年10月，金大中访日，小渊惠三首相向韩国领导人就侵略历史表达了后悔和道歉。11月，中国领导人访日成行，但日本没有像金大中此前访问一样，在外交文本中提及“道歉”。从此之后，中日双边关系逐步趋紧。

此时，日本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也陷入争论漩涡。首先，日本经济停滞，中国经济爆发，导致不少日本人认为没有必要援助；第二，在日本ODA条款中，有不少涉及军费、政治制度的附加条件，一些日本人认为，中国没有遵守这些附加条件；第三，中国作为日本ODA最大接收国，本身还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第四，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经逐步转变，不再关注与日本ODA主要资助的基础设施方向。日本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结束对华ODA。

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他多次“拜鬼”导致中日高层关系冻结，开始了所谓“政冷经热”。这种关系模式导致日本人对中国人

的看法转变，1980年，76.8%的日本人对中国有好感，14.7%没好感；2005年，32.4%有好感，63.4%没好感。

2006年，安倍晋三上台之后，推行“自信外交”。他善于使用模糊的辞令和做出出乎意料的举动，例如不会预先发布参拜靖国神社的消息，事后也不确认是否参拜了靖国神社；又如2006年突然宣布访问中国，被中国称为“破冰之旅”。这次访问中，双方提到了战略利益、战略对话等概念，这意味着在中国眼中，已经开始把日本和美国分开，将日本视为有自己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进行交往，而非以往认定的美国的傀儡。中日高层随即展开一定程度的互访，但2010年开始，双方在东海，特别是钓鱼岛地区的冲突再次困住两国关系。

在片山看来，中日关系存在三大障碍。

首先是历史问题。就一些日本内阁成员、甚至是首相的不当言论和行为经常引发中方不满，片山提出，极右势力实际上在日本社会受孤立。具体来说，中日双方在历史问题上存在理解差异。日本政府习惯把对历史的判断看成包袱，抛给历史学家，视为学术问题；而在中国人眼中，历史是今日的教训，必须正确面对。

片山说，在日本有一种看法，不应把日本与德国作对比。德国

的暴行在于对犹太人大屠杀，而不是战争本身；一小撮日本人认为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是由于军队缺乏纪律造成的。而且，日本战后签订多个和平条约，德国则是战后分裂，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

片山分析，中国民众普遍认定，二战是部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起的，多数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是受害者。而在日本，对二战没有统一的看法。中国批评日本不正视历史，日本埋怨中国没有公正评判日本战后 60 年和平历史。

中日关系第二大障碍是台湾问题，但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不同，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殖民 50 年。这段历史导致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关系极为敏感，对于台湾地区领导人与日本接触的举动，中国民众极为关注。

第三大障碍是东海，特别是钓鱼岛问题。片山认为，双方都要避免过度激化民族主义，不要不考虑其他战略利益。双方在东海的行动应该更加透明，避免互相猜忌，爆发不必要的争端。

在文章的最后，片山就中日关系发展途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双边关系应由共同利益驱动，而非情感驱动。

第二，敏感问题会撼动双边关系基础，应该试图提出创新性的解决办法。

第三,有必要在双方政府、商界、学术界之间建立联系网络。

第四,中日关系不仅关乎双边利益,更影响亚洲,乃至世界格局,双方在发展双边关系中要有地区思考。

第五,双边政府都有必要开展针对对方年轻一代的公共外交。

最后,中美关系以前、现在都对中日关系有重要影响,日本政府不应该依赖美国遏制中国,而要尝试与中美发展良好的三边关系。日本有必要,也必须与中国开展双边合作、地区合作、全球合作。

参考文献

- Katayama, K. (2011, December). Development of Japan-China Relations since 197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2(3), 647–679.

中朝关系六十年： 从难以捉摸的盟友到尴尬的邻居

中朝两国的同盟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不确定性，传统的“大国-小国”分析模式并不适用：作为大国的中国始终处于两难局面中，面对朝鲜的过激行为却难以态度强硬，教条化的回应往往并不构成压力；“非典型小国”朝鲜非常清楚如何利用其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巧妙地以十分危险的举动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受惩罚。

◎ 刘冉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中朝关系始终吸引着国际社会的目光，也被认为对东亚政治的风云变幻构成举足轻重的影响。如今朝鲜屡屡下出险棋，中国的反应至关重要；而要理解和预测两国关系的发展，对历史的长期分析必不可少。

近日，两名韩国学者 Jae Ho Chung 与 Myung-hae Choi 在《The Pacific Review》学刊上发表研究，对 1949—2010 年的中朝关

系进行分析,试图回答其中的多个谜团:两国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两国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沟通?中朝是否构成互相信任的同盟?这些年来,中国究竟是否成功地影响了朝鲜的行动,使其符合中国自身利益?

两位研究者认为,从地缘政治来看,中国很难将朝鲜置于敌对位置;与此同时,1956年朝鲜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清洗以及朝鲜对中国长久以来的疑心至今仍影响着两国关系。中朝两国的同盟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不确定性,传统的“大国-小国”分析模式并不适用——事实上,作为大国的中国始终处于两难局面中,面对朝鲜的过激行为却难以态度强硬,教条化的回应往往并不构成压力;与此同时,朝鲜却成为一个“非典型小国”,不受强大的中国邻居摆布。

中朝是否有良好的沟通渠道?

从历史来看,尽管朝鲜半岛长期将中国视为宗主国和保护国,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庇护关系,而是“唇齿相依”和“唇亡齿寒”的对等关系——这意味着“牙齿”也有咬到“嘴唇”的可能。

1940—50年代,大批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及军队的朝鲜族人在金日成的要求下被派遣回朝鲜支援建设,形成朝鲜共产党内部重

要的“延安派”，并与中共保持密切互动。在中共的支持下，延安派迅速崛起，这很快引发了金日成的疑虑。1956年，金日成对包括延安派在内的党内派系进行清洗，随即宣布朝鲜不接受任何国外势力的干涉，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这无疑毁掉了中朝之间最有效的沟通渠道，也为其后中朝关系的发展造成挥之不去的阴影。

金日成在1949—1977年间委任的七任朝鲜驻中国大使和四任外交部部长全部与延安派毫无干系，说明他对中国及延安派始终怀有严重的疑心。正因如此，中国不得不试图采用其他途径与朝鲜高层沟通。

1958年，周恩来访朝期间，双方达成高层互访共识，这意味着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保持密切往来，并就重要事件保持直接联系。因此，其后每当金日成和金正日访问中国，几乎都能够得到与全体政治局常委直接会晤的机会。

这种非常规的高层沟通渠道使外交部等正式部门在中朝关系上沦为附庸，就连被认为在对朝关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事实上也受到很大限制。与此同时，中国驻朝领事机构在情报收集工作方面也不尽人意。

在这种情况下，高层互访几乎成为中国判断朝鲜意图的关键

手段,这导致中国屡屡受朝鲜误导,作出错误分析,因而对朝鲜的多次意外举措未能及时获悉,有时消息甚至不如西方国家灵通。

中朝是否是相互信任的盟友?

作者认为,中朝两国从来都不是互相信信的盟友。

中国与朝鲜最初达成同盟主要是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但当时,朝鲜却需要同时依赖苏联去对抗美国。60年代朝鲜对美国的几次挑衅都得到了中国台面上的支持,但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已在秘密计划恢复外交关系。70年代后,中朝两国的政策更是背道而驰,同盟关系进一步削弱。80—90年代,中国通过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在亚洲交到了不少朋友,使朝鲜愈发失去了原先重要的战略地位。1992年的中韩关系正常化更是给朝鲜当头一棒。

长久以来的猜疑使朝鲜无法将中国视为可靠的保护者,因此在这段时间内致力于发展核武器和远距离武器,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潜在盟友发展关系,甚至开始对西欧和日本有限度开放。1994年,朝鲜未与中国商议便自行宣布退出板门店停战协定,随即要求中国也退出。朝鲜半岛第一次核危机后,朝鲜与美国发布联合宣言,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大受限制。

不过,即使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中朝也并未废止或修改过被视为两国同盟关系根基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中国而言,这一方面是因为美韩同盟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条约中“就重要事件互相协商”的条款而对朝鲜保留一定的影响力。

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有多大?

关于中国是否能够影响朝鲜政策,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派认为中国的影响力本身有限,虽然在经济方面受到朝鲜依赖,却难以将影响转化到其他领域;另一派则认为,由于朝鲜对外来干涉极其敏感,加之中国希望保持稳定的地区环境,因此应主动选择对朝鲜采取相对“温柔”的态度,以保证长久的影响力。

两位韩国研究者则指出,要想全面分析中朝关系,应当着重看待朝鲜如何回应中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提议。

197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尝试敦促朝鲜与美韩改善关系并展开谈判,但朝鲜坚持拒绝将韩国视为有权参与谈判的一方。1980年代,中国希望朝鲜参与在北京举行的三边谈判,但朝鲜阳奉阴违,在仰光对金斗焕实行爆炸刺杀,使朝鲜半岛局势降至冰点,中国失去了从中斡旋的机会。1996年,中国以大量军事、粮食与经济援

助诱使朝鲜参与四边会谈，但朝鲜坚持所有会议在日内瓦而非北京举行，并明确宣布“朝鲜民族内部事务绝不应由四边会谈决定”。1998年，朝鲜试射大浦洞飞弹，导致四边会谈破裂，最终也未能达成实质性进展。2003年以来的六边会谈中，中国十分认真且积极地希望扮演重要的协调角色，无奈朝鲜不领情，屡次以核试验来加强筹码，意图与美国直接叫板，排斥和淡化中国的作用。

作者统计了2003—2011年中朝两国领导人会面记录，指出：在23次会面中，只有8次对敦促朝鲜参与三边或六边谈判产生了实质影响。2007年之后，该“影响率”更是由2003—06年间的58%迅速降低至不足10%。这有可能意味着：朝鲜对其核能力的自信获得增长，也因此愈来愈不买中国的面子。

非典型“大国-小国”关系

作者总结道，作为一个“非典型小国”，朝鲜非常清楚如何利用其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并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走钢丝，巧妙地以十分危险的举动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受惩罚。

与此同时，中国屡次希望朝鲜参与多边谈判的尝试均宣告失败，其与朝鲜的关系却没有发生过实质改变，而是陷入教条式的循

环往复。

作者最后指出,正在发生的又一次朝鲜半岛危机恐怕也很难打破中朝关系的怪圈,这无疑会令国际社会深感失望;但可以肯定的是,朝鲜将愈来愈不再是中国可以信任的战略盟友,而是成为令中国如坐针毡的恼人邻居。

参考文献

- Chung, J. H., & Choi, M.-H. (2013). Uncertain allies or uncomfortable neighbors? Making sense of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1949–2010. *The Pacific Review*. doi:10.1080/09512748.2012.759262

中缅关系的前世今生

日本学者认为，从外部看，出于历史、经济和战略考虑，缅甸在双边关系中更依赖于中国。但他同时认为：缅甸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采取更加独立的政策。对中国而言，一方面，缅甸完全倒向西方对中方不利；另一方面，缅甸一直奉行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急于发展经济、吸引投资的缅甸也不会失去中国带来的商机。

◎ 宿亮

中国和缅甸一衣带水，双边关系受到世界瞩目。不少西方分析师认为，中国对缅甸外交政策有较强影响，但从外交实践看，中缅在密切合作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

日本广岛和平研究所教授 N·加内桑 (N. Ganesan) 在《日本政治科学杂志》撰文，着眼中缅关系的“前世今生”。加内桑赞同这样的看法：从外部看，出于历史、经济和战略考虑，缅甸在双边

关系中更依赖于中国。但他同时认为：缅甸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采取更加独立的政策。

谈及缅甸政策，不能绕开这一地区遭遇殖民的历史。

英国人 19 世纪开始殖民缅甸，期间与缅甸人爆发三次战争冲突，与缅甸政治精英结下仇恨。殖民时代，外来统治者的控制集中在平原地区，而对缅甸高原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能力不强，这导致后来的缅甸地区割据严重。1948 年殖民时代结束后，缅甸没有像其他亚非国家一样与宗主国保持密切联系，而是形成了对外国人深深的不信任感。

缅甸独立后，政局在 1962 年、1988 年发生重大军事政变和政治动荡。1990 年实现民选后，军政府成立“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后更名为“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缅甸政治精英认为，缅甸曾被英国和日本侵略，后来在国际政治中被中国和印度夹在中间，呈“三明治”态势。同时，泰国在边境地区支持少数民族武装。在缅甸人看来，本国在外交上能够拿出的筹码不多，倾向于“自我放逐”式的孤立。

加内森认为，作为相对落后的国家，缅甸外交是“应激”型的，也就是被动对外界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出击。这一点，从中缅关

系的发展就能够窥见。

缅甸独立时，北部禅邦地区留有大量获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中国国民党军队，对新中国政府西南安全构成威胁。也就是说，缅甸被动进入冷战。1966年开始，中国“文革”时期向缅甸输出革命思想，也导致缅甸出现反华暴动。

1988年，缅甸军政府镇压国内抗议活动，导致与美欧国家关系恶化。此时，缅甸开始迅速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对中国而言，缅甸拥有印度洋出海口，合作能够促进中国获得港口和设施使用权，符合军事安全利益。同时，邻国的安全稳定也便于中国解决边境的不安定问题。从缅甸方面看，中国在缅甸遭国际孤立的情况下提供没有附加条件的强大支持，在国际上为缅甸发声；另外，缅甸可以利用中国的力量稳定边疆，打击毒品贩卖。

1988年之后，双方经济关系发展较快，特别是与云南的边贸发达。如今，中国是缅甸继泰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中国给予缅甸220种产品优惠关税。中方为鼓励贸易，修建大量基础设施。发展与缅甸“与生俱来的关系”。同时，中国还在缅甸勘探购买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另外，一些西方国家指认，中国向缅甸出售不少武器。

这些行为强化了军政府与中国的关系。1996年，300名中国拖网捕鱼船获准进入缅甸水域作业，而同时期泰国的拖网捕鱼船则被赶出缅甸水域。

不过，加内森指出：这一时期中国对缅甸的影响依旧有限。缅甸将中国视作平衡与邻国关系，也就是抵制泰国和印度的一种方式，并非在外交上“一边倒”。事实上，缅甸人对华人猜忌很重，发生过多次排华事件。特别是很多与军政府签订过停火协议又龃龉不断的少数民族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2009年，军政府打击北部果敢人，致使3万人流亡至中国云南。虽然官方辩称这一行动是打击地方武装和毒品贸易，但不少分析人士认定这是避免果敢人在大选中威胁政府。

1997年缅甸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2005年释放昂山素季。缅甸外交政策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开始与印度、俄罗斯等国家都开始发展较好的关系，不再依赖任何一方。随着西方经济制裁和大量非政府组织援助的开展，军方在缅甸的控制力不断减弱，与更多西方国家重建外交联系已成趋势。

从外部来看，由于中缅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会打破地区平衡，印度、泰国和其他东盟国家也在尝试加强与缅甸的关系，相对削弱中

国在缅甸的影响。一些学者认定,推动缅甸加入东盟本身就是针对中国。

2013年3月,缅甸总统、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前秘书长吴登盛出访欧洲五国,是缅甸启动新一轮外交政策的重要风向标。对于在缅甸有重要利益的中国而言,一方面,缅甸完全倒向西方对中方不利;另一方面,从缅甸一直奉行的现实主义外交行为来看,急于发展经济、吸引投资的缅甸也不会失去中国带来的商机。

注:

缅甸国名在英文中有两个名称,即 Burma 和 Myanmar。官方称呼中,1989年之前,缅甸英文名称是 Burma; 1989年,缅甸军政府颁布《名称变更法》,更名为 Myanmar。同时,缅甸当时的首都仰光英文名称从 Rangoon 改称 Yangon。Burma 是英国殖民者依据缅甸民族主体人种 Burmese 而起名; Myanmar 则是参考缅甸语得出的音译名称。

在汉语中,“缅甸”意为“遥远的边陲”。

参考文献

- Ganesan, N. (2011). Myanmar–China Relations: Interlocking Interests but Independent Output.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1), 95–111.

中印边贸：挑战重重，前景光明

中印两国由于历史原因而存有悬而未决的边境问题，这是一个必须承认和正视的问题。然而，边境问题不应成为阻碍两国合作的障碍；相反，两国应在包括边贸在内的多个领域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不断开展合作，并且尝试在合作中逐渐加深了解和消除分歧，最终妥善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

◎ 陶郁

新任总理李克强首次出访选择哪个国家？2013年5月19日，答案揭晓：印度。考虑到中印两军数周之前还在双方存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扎营对峙，李克强总理的如期访问清楚表明了两国寻求改善关系与促进合作的诚意。

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大国，同属崛起之中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具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诉求。然而，两国作为

发展阶段相似的上升期国际力量，加之存在历史遗留的边界争议，自然难以避免在多个领域角力较劲。

中印关系虽然看似千头万绪、扑朔迷离，其核心却离不开“领土”和“经济”这两个问题。最近，印度学者柯渡洲（Joe Thomas Karackattu）发表论文，总结了中印边境贸易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两国在此领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于我们理解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柯渡洲指出，中印陆上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中期。自公元8世纪晚期起，随着西藏地区局势的动荡和造船技术的发展，海路交通在双边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至郑和下西洋间达到高潮。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印两国间通过边境口岸进行的贸易仍然相当活跃；至1962年两国爆发边境战争前，印度在拉萨就设有三家银行与一个领事馆。

1962年在中印边境爆发的战争虽然很快结束，但它对边贸的负面影响长期存在。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印领导人成功互访，两国相继签署了一系列重要协议，中印边贸也随之逐渐重新复兴起来。不过，虽然中印共享3500公里以上的边境线，如今两国主要的双边贸易，却依然通过上海、广州、加尔各答和孟买等主要

海港而展开。在毗邻印度的西藏自治区，九成以上的国际贸易是通过 4400 公里之外的天津港完成的。

柯渡洲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是因为中印边贸在数方面面临挑战：

首先，目前边贸时间过短。考虑到双方主要商业聚落与边境的距离都相当可观，每星期四个交易日、每交易日八个小时的贸易时间，越来越难以满足中印两国人民日益增长的边贸需要。

同时，两国边贸清单上所允许的商品种类，有时无法与边境两侧居民的实际需求有效匹配。例如，生姜、菠萝、苹果、杏仁与核桃等常见食物，并未被包括在边贸所允许的货物清单当中。在此情况下，一些非法贸易滋生出来，对正常边贸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

此外，交通条件也制约着中印边贸的增长；特别是在印度一侧，许多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而且与主要枢纽城市之间缺乏有效的交通联系。而由于种种制度缺陷和历史原因，目前中印边贸的收益其中在少数交易者手中，而这些人往往并非边境地区的居民。

不过，在柯渡洲看来，中印边贸虽然面临以上挑战，其不断强化的趋势却不可阻挡。中国如今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共

同的发展战略目标,更会不断密切边境线北侧的中国西南地区与边境线南侧的印度东北地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十二五”的实施,一系列自由贸易区在边境地区逐渐建立起来。考虑到中印边境地区的地理条件,两国在水力发电和旅游等方面更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中印两国由于历史原因而存有悬而未决的边境问题,这是一个必须承认和正视的问题。然而,边境问题不应成为阻碍两国合作的障碍;相反,两国应在包括边贸在内的多个领域中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不断开展合作,并且尝试在合作中逐渐加深了解和消除分歧,最终妥善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同时,如果中印两国在强化双边合作的同时,鼓励两国毗邻地区和省份之间发展更为积极和密切的贸易联系,或许对于促进双边合作也不无裨益。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Karackattu, J. T. (2013). India–China Trade at the Border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i:10.1080/10670564.2013.766387

中俄关系：正走向恶化？

学者认为，俄罗斯强调中俄关系的实际初衷是深化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双方紧密战略合作关系可能维持时间不会太长。中俄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反对西方国家的立场之上，不是真正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双方之间不存在真正有效的经济联系，传统的武器和能源贸易也正在削弱。综合来看，中俄关系的整体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 宿亮

中国与俄罗斯是亚欧大陆东端两个最大的国家。由于历史、地缘等原因，中俄关系是西方国家长久以来关注和分析的焦点，两国每一次合作或对抗都牵动西方国家的神经。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马塞尔·德哈斯（Marcel de Haas）认为，尽管中俄近年来合作“调门”不低，但隐藏着潜在的矛盾，双边关系有走向恶化的可能。

中国与俄罗斯从帝国时代、到社会主义阵营再到如今的战略

伙伴关系，一直呈现合作与对抗并存的态势，从未改变。

苏联解体后，中俄双边关系发展迅速。中俄之间的边界问题谈判从1991年开始到2008年最终划定4300公里边界线。中国一度是俄罗斯武器的最忠实“客户”。就石油和天然气而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俄罗斯。这种合作态势显示：中俄关系在最初是倾向于俄罗斯一方的，换句话说，俄方引领中俄合作。

不过，随着情况不断变化，特别是最近十年来中国综合实力在不少方面远远超过俄罗斯，双边合作的性质与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德哈斯认为，武器贸易与能源是中俄合作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

上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对中国武器出口增加。俄罗斯需要出口武器技术获取外汇，中国进口俄罗斯武器则能够在军事、民用技术领域获得较好发展。2001年至2006年是俄罗斯与中国武器贸易维持较好的时期。不过，从2006年开始，这一贸易开始持续走下坡路，原因在于：一方面，俄罗斯意识到，如果中俄关系恶化，这些武器可能反过来威胁俄罗斯；另一方面，中国在这些俄罗斯武器基础上很容易发展出自己的防务工业，最后就不再需要俄罗斯。

这种变化在数据上得到明显体现：俄罗斯武器出口在其总出

口额中所占比例从 18% 降到 10%。

在能源合作领域，虽然中俄之间有很好的合作历史，但中国方面事实上一直在寻找可以替代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方。2008 年开始，中俄之间频频就能源价格问题出现分歧，连年谈判，直接影响包括阿尔泰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多项能源项目的推进。

在武器贸易、能源等传统领域之外，中俄在其他不少方面也存在

问题。

外交领域，中俄在台湾问题、车臣问题和反弹道导弹系统上立场一致，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控制国际政治的尝试。不过，双方利益并不完全一致。2008 年，中国处于国内政治考量，没有支持格鲁吉亚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等地区的民族自决要求就是中俄在外交领域分歧的一个案例。

地缘政治领域，俄罗斯时常警告西方不要把“触手”伸向“莫斯科的后院”，即中亚地区，但如今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也开始引发俄罗斯方面紧张。一些俄罗斯政客认为，中国正尝试成为新的中亚地区“帝国”，疏远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的影响力逐步增强。中国在俄远东

一些省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是联邦政府投资的 3 倍之多。为此，俄罗斯已经持续多年加强在远东的投资，试图阻止俄罗斯人口在这一地区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避免中国在经济和人口比例上“接管”这一地区，担心远东地区“中国化”。

在国际合作领域，俄罗斯不断发展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让不少分析师担心这是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前兆。而在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中，两国的主张持续对立，俄罗斯希望加强这些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而中国则强调这些组织在经济领域的作用，这可能是中俄今后冲突的另一矛盾触发点。

德哈斯认为，中俄之间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外交政策文本和表态中，缺乏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尽管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但俄罗斯也只不过是中国的第 14 大买家。出于国家利益，双方也没有进一步紧密关系的意愿。中国的人口是俄罗斯的将近 10 倍，经济总量在 2010 年时是俄罗斯的 4 倍。在军事领域，俄罗斯也只有在核武器一项上超越中国。这些变化对两国关系的发展都产生着微妙的影响。

在这名荷兰学者看来，俄罗斯强调中俄关系的实际初衷是深化俄罗斯的全球影响力，双方紧密战略合作关系可能维持时间不

会太长。中俄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反对西方国家的立场之上，不是真正的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合作。双方之间不存在真正有效的经济联系，传统的武器和能源贸易也正在削弱。综合来看，中俄关系的整体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De Haas, M. (2013). Russian-Chinese Security Relations: Moscow's Threat from the East? *Reports No. 3*.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抱怨中国，解决不了印巴核问题

长期以来，印度将中国作为与巴基斯坦核武博弈中的关键因素，视北京为解决巴基斯坦核武器的“钥匙”，这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印度想要解决与巴基斯坦和核军备竞赛问题，最为简单的方式是直接与巴方接触，达成和解和妥协。印度的“解决巴基斯坦问题之路”通往伊斯兰堡，并非北京。

◎ 归宿

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近年来在核武器发展领域的“明争暗斗”，一直是国际军控和核裁军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又是印巴核博弈中无法回避的因素。印度的一些专家学者甚至官员更是宣称，正是中国的插手才导致印巴之间的核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卡内基基金会核政策项目副主任托比·多尔顿 (Toby Dalton) 对此有不同看法。他最近在该基金会网站“卡内基核政策观察” (Carnegie Nuclear Policy Program) 栏目发表文章指出, 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的确在南亚形成了“战略三角”关系, 但对于印度来说, 中国却不是解决巴基斯坦核武器问题的“钥匙”, 一味抱怨中国, 甚至向中国施压对于解决问题并无帮助。

独特的“战略三角”关系

作者指出, 有很多学者按照冷战时期美苏核对抗的范式理解印巴之间的核博弈, 但研究结果却与事实大相径庭。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 南亚地区的安全战略环境与美苏冷战格局有重大区别: “战略三角”的现实取代了两极对抗的格局。

多年来, 随着中国加大对南亚次大陆的力量存在,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安全竞赛也不断升级, 中印巴“战略三角”逐渐形成。在三国中, 中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占据优势, 处于三角的顶点, 印度和巴基斯坦则是三角的另两个端点。中印之间是竞争关系, 中巴之间是合作关系, 而印巴之间是对抗关系。这三组关系相互影

响,既塑造了南亚地区战略格局,也成为印巴两国核博弈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支持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能力?

作者称,印度一直认为中国支持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能力建设。包括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在内的多名高官近期也发表讲话,对“中国对巴基斯坦核能力的帮助”表示“担忧”。但事实上,这一说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相信,1992年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已经停止了对其他国家的非民用核援助。目前,中巴在核领域的合作仅限于核能发电: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民用核反应堆,用于解决巴基斯坦严重的电力短缺问题。

作者指出,认为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核武器更类似于一种“有罪推定”:巴基斯坦无法自行研制钚生产反应堆、小型核武器、核能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很好,那么一定是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此类援助。此类推断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并不能等同于现实。

北京并不是解决巴基斯坦核武器问题的“钥匙”

作者认为,尽管中巴政府都愿意宣扬中巴友谊“比山高、比水深”,但中巴关系更多的还是基于现实利益。中国企业活跃于巴基斯坦一系列大型商业和工业工程项目中;巴基斯坦是中国核能反应堆的唯一客户;巴基斯坦大量采购中国武器装备,上述情况似乎说明中国能对巴基斯坦的核政策产生影响,但也仅仅是猜测而已。

在作者看来,印度应该认识到,中国的领导人是现实主义者,中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南亚次大陆的和平、稳定以及印巴力量的大体平衡最符合中国利益。只有当中国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趋于正常,两国正解决历史争端,并能控制住各自的“挑衅”行为时,中国才会“鼓励”巴基斯坦实行“核克制”。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也将不需要加强对核武器的依赖。

作者指出,长期以来,印度将中国作为与巴基斯坦核武博弈中的关键因素,视北京为解决巴基斯坦核武器的“钥匙”,这实际上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导致印度的战略格局越来越小,限制了自己的战略视野,走入怪圈。印度想要解决与巴基斯坦和核军备竞赛问题,

最为简单的方式是直接与巴方接触,达成和解和妥协。这对印度来说尽管很“麻烦”,但是值得的。印度的“解决巴基斯坦问题之路”通往伊斯兰堡,并非北京。

参考文献

- Dalton, T. (2013, August 5). Strategic Triangle. Carnegie Nuclear Policy Program.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8/05/strategic-triangle/ghgt>

政见外交

议题聚焦

“水资源政治”中的中国

南亚地区有句谚语：“把东西扔进河里容易，再取出来就难了。”这句话不仅形象描述了水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水资源政治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国际社会呼吁成立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或机制；另一方面，各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尝试获得更多相对收益。在水资源国际政治版图中，中国引发越来越多关注，湄公河流域国家以及印度都在水的问题上与中国有交集。

◎ 宿亮

题记：2011年元旦前后，笔者在越南旅行，参观湄公河三角洲一处中心岛。岛民在雨季时居住在二层，任由河水漫过一层，并每年在一楼门廊柱子上标注水线。2008年前，水线一般接近二层地面，而2008年的水线则连一层的地面还没有超过。那一年，正是中国和湄公河下游国家关于水资源使用的纠纷最激烈的一年。

地球上可资利用的水资源稀缺,从不断变化的供求关系上看,这一资源的稀缺程度相比石油更甚。人口数量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均需求上涨,加之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极端天气凸显水资源的紧张。

不少国际政治专家认为,如果不能在水资源分配使用上形成良性国际机制,可能因此爆发“水战争”。

在水资源国际政治版图中,中国引发越来越多关注。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极度缺水国家,整体人均每年可消费水资源量已经低于联合国“压力线”,同时,资源分布地区差异极大。水资源匮乏直接影响17%粮食产量,甚至波及世界粮价。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快,对资源不断上涨的要求引发不少邻国紧张,其中水资源就是重要一例。

一些学者把目光放在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上,从水资源角度上说,这里是5条大河的源头,对整个东南亚、南亚地区都有直接影响。中国政府的“南水北调”、发电站建设等措施,无不关联整个地区。湄公河流域国家以及印度都在水的问题上与中国有着不平静的关系。

德国弗莱堡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副教授提莫·门尼肯(Timo

Menniken) 在《当代东南亚》(*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撰文关注湄公河下游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湄公河全长 4800 公里, 流经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个国家, , 注入南中国海。从长度比例上看, 中国只占 16%, 但这条河流上游 80% 的高度落差都集中在中国云南省。中国在湄公河上游, 也就是澜沧江修建水利设施, 引发下游国家关于水资源分配的紧张。

下游国家认为, 虽然中国境内湄公河长度比例不大, 但却是 60% 湄公河水量的来源。这条河流在下游 85% 可以使用的河水用作农业灌溉, 即便是总供给量高于使用量, 但季节分配差异大、需求增长较快, 上游的水利设施施工对下游民众生活和生态体系都有一定影响。

湄公河水力发电潜力巨大, 大多数都集中在上游, 目前开发得并不多。中国计划 2017 年完成澜沧江上 8 个大坝的建设, 将使得这些水电站装机容量达到三峡大坝的 80%。门尼肯在文章中援引一些技术分析, 中国的在建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使得下游雨季洪水频发的状况有很大缓解。不过, 下游越南农民和柬埔寨渔民多年来形成依赖雨季过渡水量耕种、捕鱼的方式, 大坝会波

及这些产业。

湄公河下游国家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 1957 年成立湄公河委员会。这一组织多次与中国水利部门交涉谈判，希望中国减少工程量。而中国方面仅是这一组织的观察员国，而且与泰国签有协议，一旦上游电站建好，将向泰国售电，据此认为下游国家已经接受工程现状。

门尼肯认为，在目前状况下，下游国家奉行的是“合作不发展”策略，而中国则遵循“发展不合作”。中方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念为指导，追求相对收益，只会在能够实现互惠的条件下合作。在博弈论里，这种状况称为“Rambo Situations”，也就是一方完全占有优势，倾向于维持现状。在湄公河案例中，中国在资源占有、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压倒式优势，所以很难要求中国做出让步。

不过，门尼肯指出，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中国完全可以与下游国家合作并从中获益。例如，亚洲发展银行正资助并呼吁各国加入大湄公河次区域项目，推动这一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这正与中国政府希望把云南省打造成“通往东南亚门户”的地区策略。另外，中国与东盟在贸易领域的合作完全可以推动湄公河整流域合作，也就是说，中国在水资源领域的强势完全可以转化成其他相关

领域的利益,这也符合中国希望加强国际社会化,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态度。

不仅是湄公河下游国家,印度也一直以来对源自中国的水资源紧绷神经。印度在水资源领域指责中国由来已久。印度学者一直渲染,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修建水利工程会破坏印度北部和孟加拉东部的环境。另外,上世纪60年代的中印边境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关联水资源。

比利时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学者乔纳森·霍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在《国际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撰文讨论一场中印“水战争”的可能性。

中印都是人口大国,水资源储量都处于紧张状态。印度饮用水中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境内发源的河流。一些人认定,中国大型水利工程一方面危及南亚次大陆脆弱的农业,另一方面影响孟加拉,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印度。另外,印度还指责境内多次洪水关联中国,认为中国上游环境破坏导致泥石流最终恶果输入印度。

印方把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的水利工程视作“亚洲水塔”。由于中国在建设雅鲁藏布江水利工程时没有事先知会印度,让印度人担忧中国没有意识到印度因此面临的问题。

事实上,中国正考虑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确主要基于国内考量。但一些中国学者也认识到,必须考虑国际水资源平衡,重视国际对话。中国尚没有国际层面的水资源战略,这限制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视野。学者们建议政府与印度在这一问题上加强信息沟通和共同应对。另外,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方使用境内水资源不仅天经地义,而且用量比下游少得多。印度方面是出于政治原因故意夸大中国的水威胁。印度先前就多次利用河流水资源问题威胁下游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霍斯拉格认为,中印本质问题在于互信不足。印度对中国的怀疑并不充分,因为中方最终确定如何利用青藏高原水资源,也鼓励专家与印度进行对话。

全世界有 270 条河流属两国或以上国家共同管理,类似湄公河、雅鲁藏布江的争议并不鲜见。2003 至 2010 年,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和乌拉圭针对乌拉圭河上修建纸浆厂产生争议就是最新一例。

乌拉圭河是拉普拉塔河谷的一部分,全长 1750 公里,是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的界河,历史上是这几个国家水资源争夺的焦点。2002 年至 2004 年,乌拉圭政府先后批准西班牙和芬兰企业在流域建设纸浆厂,引发环保恐慌。阿根廷最终将乌拉圭告上国际法院。

经过 8 年的争论，国际法院结论是乌拉圭没有事先把涉及共同流域的重要事项通知阿根廷非法，要求双方依赖共同管理委员会处理问题。

学者罗梅罗·贝尔纳多 (Ramiro Berardo) 和安德鲁·杰拉克 (Andrea K. Gerlak) 认为，阿根廷和乌拉圭有着长期的经济社会合作历史，但为了乌拉圭河这一问题经陷入 8 年纷争，凸显缺乏有效的水资源共同管理机构会怎样影响双方的共同发展。事实上，从 1975 年开始双方就建立了乌拉圭河委员会来处理河流事项，但乌拉圭方面仅仅把乌拉圭河委员会视作一个合作形式，而没有独立管理权，绕过这一机构独断专行。乌拉圭河委员会原本可以进行独立环境评估和研究，取得标准化的规范，帮助双方合理利用水资源。

这一案例显示，在面对共同资源的时候，只有当各方利益都获得诉说的机会之后，才能真正推进决策进程。

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世界银行分管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副行长 Ismail Serageldin 一直关注水资源，支持创立了“全球水伙伴组织”、“21 世纪水资源世界委员会”，把水称为世界上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商品。他同意，有效地国际法规和管理机构是解决水资源问题的关键。

Serageldin 认为,水资源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虽还不至于爆发战争,但很多地区之间已经有冲突,如达尔富尔冲突就包含水源分配。巴以冲突也涉及到定居犹太农民和巴勒斯坦农民直接水源分配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的地区,消费量增大也导致水源紧张。

国际法没有明确关于水资源分配的规定。现行体制下,一些全流域的国际援助项目必须得到所有流域内国家认可才能推行,这导致一些有实力的国家自行建设,而其他流域内下游国家无力采取相关配套的项目,因此利益受损。这还只是地面上的河流,一些地方涉及地下水流动的管理则更加棘手。

按 Serageldin 的说法,为了保证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更加均衡的分配资源,有必要实施国际水资源管理。水资源可能会逐步变得比石油还要有价值,如果有效合作,能够减少浪费、增加价值。例如,欧洲国家正集中力量清理莱茵河水质:水质提升,所有国家收益;但如果只关注水量的配比,就变成零和游戏。

国际管理可以把水资源流动纳入到贸易体系中。如果水资源贸易发达、有利可图,不少地方就会停止开矿,而是种植果树蔬菜保护水源,这样会促进良性发展。

南亚地区有句谚语：“把东西扔进河里容易，再取出来就难了。”这句话不仅形象描述了水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水资源政治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国际社会呼吁成立统一的水资源管理机构或机制；另一方面，各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尝试获得更多相对收益。

《国际水资源非航行用途法律公约》虽然获得 135 个国家的签字支持，但仍有 35 国拒绝批准这一公约。在人们对于水资源的稀缺、水资源治理的重要性普遍有了一定认识的时代，如何实现协调处理地区水资源政治，以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是有趣且关键的话题。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4 月 24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Menniken, T. (2007). China's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Resource Politics: Lessons from the Meko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9(1), 97-120.
- Holslag, J. (2011, Spring/Summer). Assessing the Sino-Indian Water Dispu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4(2).
- Berardo, R., & Gerlak, A. K. (2012, February).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long International Rivers: Crafting a Model of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2(1).
- Serageldin, I. (2009/2010). Water Wars? A Talk with Ismail Serageldin. *World Policy Journal*, 26(4), 25-31.
- Gleick, P. H. (2009/2010). Facing Down the Hydro-Crisis, *World Policy Journal*.

灾后跨国互助,为何屡遭拒绝?

自然灾害之后的社会秩序恢复工作中,“跨国互助”理应起到重要作用。然而,跨国互助背后不可避免地与各国自身的政治动机与利益相关,现实政治、社会环境常常为国际救援工作增加阻力,甚至导致救援被受灾国拒绝。

◎ 于灵歌

在自然灾害之后的社会秩序恢复工作中,“跨国互助”(cross-nation mutual aid)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友善好意,理应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现实政治环境常常为国际救援工作增加阻力,甚至导致救援被受灾国拒绝。为何跨国互助有时会产生反作用?如何在灾后救助中有效进行国际合作?台湾铭传大学的王价巨教授从灾害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进行了相关案例分析。

跨国互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援助，它关乎灾害发展的紧急性、变动性与不确定性，更需要克服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可能产生的阻力。这首先与复杂的现实政治背景有关——跨国互助工作的每一个参与国都有着与自身政治利益相关的某种目的，区别只在于各国外交政策不同而已。例如，在印度洋海啸的救助中，参与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新加坡彼此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都糅合了其自身的政治利益。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是被美国邀请加入冷战后重建单极世界政治秩序的“核心集团成员”；澳大利亚与美国一直在努力提升其与南亚、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新加坡希望能在东南亚建立“区域性领导者”的形象；德国、日本则希望多多参与联合国行动，获得支持以促进其军事力量动员合法化进程。此外，中国也常常将参与国际灾后援助作为“和平崛起”的重要体现，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威胁论”的恐惧。

在这种背景下，政治力量的博弈便成为跨国互助最大的阻力之一。在有主权争议的国家 and 地区中，这种政治干预更多见。2009年台风“莫拉克”重创台湾地区，美国收到台湾的灾后援助请求后，先告知中国大陆以确保“彼此理解”，才给予台湾援助。

此外，国家间脆弱而缺乏互信的关系，援助国之间所捐物资与

款额背后国家力量与国际形象的竞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破坏国家主权”的论断都有可能增加跨国互助“被拒绝”的风险。

从社会环境看，社会秩序意味着保持现有的权力结构，并确保政府权力能够正常运行。因而当自然灾害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时，政府能否成功应对灾害与社会秩序之稳定、公众安全感息息相关。一旦政府在灾后工作中表现不佳，怀疑、不满和谣言就有可能触发集体性恐慌，损伤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在跨国互助中，由于援助国与受灾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受灾国并不乐意接受可能改变其现有社会秩序的异国援助。反过来看，接受了外国援助国的救援，往往又被视作承认了国内政治系统的“失灵”。受灾国还有可能担心：外国势力进入国内，一旦与国内某些“人为势力”相结合（如反政府组织），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混乱，继而威胁原有政府的权威地位。

如何让跨国互助在国际灾后救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研究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一是战略层面，可以充分利用信息社会的传播效力，使得国际间充分的信息交流对受灾国政府接受互助救援形成压力；二是机制层面，明确国家间权利与义务，尊重文化差异，建立统一的救援标准；三是政治层面，努力避免主权问

题引发的争议,例如通过国际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凝聚争议方在互助救援工作上的共识;四是组织形式方面,要关注跨国互助的价值和意义,鼓励各个参与国各尽其力;最后,时间层面,救助不仅包括第一时间的紧急救援,还应延伸至灾后漫长的恢复工作,以及未来灾害预防、预警能力的建设。

国际政治社会中,尽管跨国互助背后不可避免地与各国自身的政治动机、利益相关,但其重要性在于确保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每一个受害国都有接受到国际援助的机会。在自然灾害面前,分享并学习如何将破坏降至最低,是每一个国家都应做出的努力。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5 月 8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Wang, J.-J. (2013). Post-disaster cross-nation mutual aid in natural hazards: case analysis from sociology of disaster and disaster politics perspectives. *Natural Hazards*, 66, 413-438. doi: 10.1007/s11069-012-0493-x

南中国海：时间或许是一剂良药

如果南海各方能够避免直接冲突，就能在事情不断恶化之前争取到更多时间，使彼此都能更加清晰地明确自身诉求、明白各自愿为实现诉求所支付的代价。同时，时间可以允许南海各方不断强化非官方渠道的沟通 and 理解，还可能因国际和地区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使得那些有助于消弭冲突的共同利益逐渐浮现出来。

◎ 陶郁

5月9日，一艘台湾渔船在屏东县鹅銮鼻东南方向160余海里处作业时，遭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枪击，造成一人死亡、船只损毁的严重事件。事发之后，海峡两岸纷纷表达了强烈愤怒和严正抗议，要求菲律宾政府对此事进行彻查。这次事件也将世人的目光再次聚集于波涛汹涌的南海。

这一突发事件如今尚未尘埃落定，判断其对南海局势的长期

影响或许还为时过早。然而，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叶胡达（Michael Yahuda）看来，南海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却是一系列张力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而这些张力的根源，主要在于一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感到不适和不安；但是，与这些东南亚国家政治领袖的传统认识不同，在南海问题上，时间或许不只对中国有利，也对东南亚国家有利。

叶胡达指出，中国崛起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正从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影响着南海的局势。

首先，中国政府和民众认为国际力量对比形势在朝着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从而更有动力和信心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自身利益。在此背景下，中国强化了对近海的控制，并将确保贸易通道安全提升为一项重要的战略目标。同时，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得以更加有效地保障自身海洋权益。最后，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不容忽视。

面对中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南海周边的许多东盟国家感到难以适应。过去几十年间，由于南海地区并非中国的战略重心所在，这些国家利用地缘政治优势，在周边海域攫取了大量既得利益，如今它们非常担心这些利益可能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加和

战略重心的转移而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许多东盟国家作为博弈中力量相对较弱的一方,迫切希望美国等外部力量介入,以确保南海地区的力量均衡。

美国最近两年关于“亚太再平衡”的一系列表态,似乎意味着东南亚国家的上述希望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然而,叶胡达指出,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美国必然首先基于自身诉求而非东南亚国家的希望而采取行动。这就意味着:美国的亚洲政策必然首先服务于其全球政策,而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具体政策目标,未必总会与东南亚国家自身的目标诉求完全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介入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动作,但未必能够从根本上缓和局势或解决问题。

通过回顾南海各方在过去一段时间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叶胡达发现,许多合作和谅解并非旨在彻底解决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和分歧;不过,这些合作和谅解,确实能够避免各方的直接冲突,而如果这样的合作和谅解越来越多,对于南海问题各方或许都不无裨益。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一贯在南海问题上秉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但许多东南亚国家对此并不完全认可。这些国家

的领导人普遍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时间只会对中国有利;因而,如果不能迅速对此采取包括引入其他国际力量在内的反制措施,那么最终受损的必然是他们自己。例如,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就曾明确表示:“中国能够一直等下去,他们有的是耐心,但我们却承担不起这种闲适,我们必须走在前面”。

阿基诺的言论不难解释菲律宾最近为何在南海问题上频繁制造冲突。然而,在叶胡达看来,上述想法却未必对东南亚国家有利。相反,如果各方能够避免直接冲突,就能在事情不断恶化之前争取到更多时间,使彼此都能更加清晰地明确自身诉求、明白各自愿为实现诉求所支付的代价。同时,时间可以允许南海各方不断强化非官方渠道的沟通和理解,还可能因国际和地区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使得那些有助于消弭冲突的共同利益逐渐浮现出来。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Yahuda, M. (2013).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1), 446-495.

印度想在南中国海干点啥？

南中国海是中印龙象棋盘上的重要棋子。出于在地缘政治上遏制中国，印度海军和石油勘探团队已经出现在南中国海。印度虽不是南中国海博弈的主要行为体，但已成为这一地区战略分析不得忽视的力量。印度想在南中国海扮演什么角色？打算怎么实现它的目的？印度的介入会给其他行为体带来什么影响？

◎ 宿亮

南中国海波涛汹涌，印度在其中的表现一贯活跃。尽管印度从地理意义上不是南中国海国家，但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印度正不断增加其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可以说，印度虽不是南中国海博弈的主要行为体，但已成为这一地区战略分析不得忽视的力量。

印度想在南中国海扮演什么角色？打算怎么实现它的目的？印度的介入会给其他行为体带来什么影响？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学者戴维·斯科特（David Scott）在《印度评论》（*Indian Review*）撰文，从战略层面分析了印度在南中国海的行为。

斯科特认为，中印关系极其复杂，两国都在崛起，却缺乏互信。双方在诸如反恐、多极化世界等全球议题上展开合作，但在地区层面仍存战略分歧。双方的关系与其说是“权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不如说是“威慑均衡”（Balance of Threat）。中国近年来出现在印度洋上已经让印度感到恐慌，而印度把触角伸入南中国海是两国关系大背景中最新的发展。

单就南中国海议题而言，印度为什么要介入？其驱动力量是什么？

印度在南中国海的利益是战略性的。这涉及到印度外交政策中的两个概念，其一是印度2004年提出的“大周边”（extended neighborhood），涵盖“从苏伊士运河到南中国海，包括西亚、海湾地区、中亚、东南亚，东亚、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以区别于“直接周边”（immediate neighborhood）；其二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地

缘战略概念。

“大周边”是印度的战略指导思想,印度军方在2007年的《海洋的自由使用——印度海洋军事战略》中明确提出在南中国海保卫印度利益。“印度-太平洋地区”就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南中国海,地缘战略意义重大。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印度追求在印度洋的绝对优势,同时也希望追求在南中国海的“准绝对优势”。中国控制南中国海意味着印度洋的出口被锁定,印度的“后院”摆在中国眼前。另外,印度海军目前与美国海军、日本自卫队频频在西太平洋活动,确保印度洋通往西太平洋海路通畅也是印度的重点政策。最后,这也是为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活动的一种“反制”。

从地缘经济角度看,印度上世纪90年代提出“东向”战略,加强东南亚的经济联系,如今这种经济利益进一步扩大。印度对外贸易55%经过马六甲海峡,所以海峡西面的孟加拉湾和东面的南中国海都是印度不愿意放松的战略要地。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印度官方屡屡提出南中国海是全世界财产一说。

从能源利益角度看,南中国海即是印度能源通道,也是今后可

能的能源产地。印度希望保障能源安全,尝试与越南合作开发南中国海能源。这可能导致中越纠纷激化时,印度不得不选择一边“站队”。

既然有切实利益存在,印度是否已经对南中国海“下手”了呢?

从军事上看,印度海军早已进入南中国海,这是这一地区进入印度战略实现的明证。印度海军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形式主要包括单边驶入、双边演习、港口访问和军舰通行。

印度海军第一次出现在南中国海是2000年,当时被印度人认定为挑战中国军事力量的尝试。2004年,一支5艘印度军舰组成的小型舰队开始在南中国海巡航。新加坡为这一舰队提供给养,越南则提供了芽庄港设施供印度海军使用。这支舰队访问东南亚各国港口、与新加坡组织演习,最远前往西太平洋地区参加美日演习。2011年,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中印军舰在南中国海海域发生摩擦,双方互相对峙、喊话。

从与南中国海沿岸国家关系上看,印度近些年与南中国海沿岸国家在防务上加紧合作。2012年,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参加了印度1995年开始举行的多国军演

“MILAN”，意味着这一局限在孟加拉湾的军演范围扩展到南中国海。同一年，印度在安达曼群岛最南端的坎贝尔湾建立深水海军基地，旨在建立于东南亚国家更紧密的军事关系，被外界视为针对中国的行为。

印度与新加坡保持紧密的军事联系，2003年签订防务协定，2007年签订联合军事演习协议。新加坡领导人已经将印度视为“平衡中国”的力量。另外，印度还与印尼、菲律宾、越南签订多项协议。为了自身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发言权，印度还主动美日韩讨论相关情况。

从能源勘探上看，印度石油和天然气公司2006年就与越南石油公司签订协议，共同开发中越争议水域的能源资源。尽管中国封锁海域，印度还是对127号礁周边区域勘探，直到2010年无果而终。但印方继续与越南保持联系，试图继续勘探其他地区，招致中国频频抗议。为了“反制”印度，中国多家国有石油公司也开始勘探相关地区。2012年12月，印度军方大放厥词，扬言保护印度公司在南中国海的勘探行动。

中印关系常常被称为龙象共舞。两个亚洲地区正在崛起的大

国,在地缘意义上过于接近,必然存在竞争关系,而南中国海就是龙象棋盘上的重要一颗棋子。这一地区的博弈已经成为中印关系中愈发重要的消极因素,需严肃对待。当然,无论具体利益之争如何进展,这一地区热点仍取决于中印关系发展的大背景。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Scott, D. (2013). India's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in Play. *India Review*, 12(2), 51-69.

改善东北亚局势需开拓新领域

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冲突，东北亚各国在短期内难以有效改善彼此之间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对峙局势；在这种情况下，强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或许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 陶郁

5月23日至24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崔龙海访问北京，与多位中国党政军领导人会晤，并向习近平主席转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引起世界关注。崔海龙访华期间表示，朝鲜愿接受中国的建议，与各方重启对话。这让人们看到了东北亚局势在持续紧张之后出现适度缓和的可能性。

东北亚地区虽然只有几个国家,但是由于受到战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所困扰,屡屡被推上剑拔弩张的风口浪尖。在东北亚国家中,朝鲜和韩国不仅冲突不断,而且目前在法理上处于战争状态。与此同时,中日、日韩、日俄各国之间均存有领土纠纷。这些历史积怨和现实冲突,又持续刺激着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发酵。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于不久前不顾各方劝阻,再次悍然进行核武器试验,无异于火上浇油。

受到上述问题的共同困扰,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无法不令人担忧。

然而,虽然东北亚地区各国在传统安全领域内存在显著的分歧与冲突,但在环境保护和灾难救援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却有着积极而广泛的合作。最近,浙江大学国际关系专家崔顺姬博士发表论文,就东北亚各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现状和前景进行了深入讨论。

崔顺姬指出,东北亚地区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仅本身卓有成效,还可能反过来改善这些国家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关系,从而推动东北亚地区局势走向稳定。根据崔顺姬的介绍,由于

面临着历史记忆、民族主义情绪、领土纠纷和政治张力等一系列问题的困扰,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合作常被认为是非常脆弱的;然而,在环境保护和灾难救援这两个方面,东北亚主要国家已经逐步从“各自为战”走向了“共同合作”。

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东北亚国家之间关于环境问题的部长级会谈,始于1999年,目前已持续举行15轮。通过这些会谈,各国在环保领域已经建立起联系密切与功能完备的官方合作机制,并且确定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努力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在环保领域,以民间组织为代表的非官方环保力量也不断趋于正规和整合。东北亚各国的民间环保机构,不仅对官方合作机制形成了有效补充,彼此之间也建立了密切的长效联系。此外,各国地方政府在环保领域也展开了积极的交流与合作。

环境保护并非东北亚各国展开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唯一领域,中日韩三国之间在灾难救援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互动。自2003年起,中日韩三国政府不仅在灾难救援领域直接展开了对话,还为彼此之间其他形式的合作积极搭建了平台。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日韩两国迅速派遣专业救援和医疗队伍前往灾区,与中国政府

和民众携手救灾；而日本于 2011 年发生地震与海啸后，中国也向灾区迅速派遣了救援队，并提供了大量人道主义援助。

那么，为什么在东北亚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有关国家却能在环境保护与灾难救援等方面展开积极合作呢？崔顺姬的研究表明，这是由非传统安全领域独具的许多特性所决定的。与以应对军事威胁为目标的传统安全不同，有关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东北亚国家虽然在许多方面存在现实的利益冲突，但共同面临着环境恶化和灾害频发等问题的威胁，因而都有动力在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积极合作。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一旦建立起来，往往能够产生超越合作初衷的积极效果。这些合作不仅有利于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也能增进各国民众对对方的了解与好感。而一旦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之间能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与积极的认同，那些原本可能会导致局势严重恶化的事故与冲突，或许就能够以比较温和而理性的方式得以解决。

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冲突，东北亚各国在短期内难以有效改善彼此之间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对峙局势；在这种情况下，诚如崔

顺姬所言,强化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或许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如果各国政府都能从那些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开始,基于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或许如今无风三尺浪的东北亚局势,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趋于平静。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6 月 5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Cui, S. (2013). Beyond Histor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or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i:10.1080/10670564.2013.782131

贸易如何影响外交

尽管贸易的初衷可能在于获得利润，但随着互惠关系的巩固与深入，贸易伙伴之间不仅能够培养起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也往往会在持续互动中不断加深了解和互信，最终在国际舞台上形成步调一致的默契关系。

◎ 陶郁

7月10日至11日，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分别派出高级官员作为国家元首的代表领衔主持这次对话。其中，中美经济对话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美国财政部长雅布·卢联合主持，围绕扩大和深化贸易投资合作等议题展开，最终达成了包括“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等一系列积极成果。

本轮中美经济对话为何没有像许多观察者此前预测的那样聚

焦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而是将关注重点放在了贸易与投资问题上?美国康奈尔大学两位学者最近在《政治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s*)上联合发表的论文,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

通过对1992年到2006年之间中国与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及外交政策指标进行分析,这篇论文指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还可能对双方的外交政策产生显著影响——具体来说,那些与中国经贸关系更为密切的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外交政策上也更经常与中国保持一致。

经贸关系与外交政策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一个被长期讨论的重要课题。早在战后初期,一些学者通过对欧洲国家经贸和外交数据的观察,就曾指出:存在贸易互赖关系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一致行动。赞同此观点的部分学者进一步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一国往往难以与其严重依赖的贸易伙伴唱反调。

然而,上述观点也面临不少批评意见。例如,那些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往往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传统上也关系密切,因而很难认定这些国家采取高度一致的外交政策到底出于何种原因。更重

要的是，贸易往往只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因而，某国在贸易上依赖他国，往往并不足以确保该国在外交政策上也会为他国马首是瞻。

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并且将战略中心从“引进来”转向了“走出去”。这些政策措施无疑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关于经贸关系与外交政策的学术讨论，则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政策更广义的作用效果。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外贸规模在过去二十年间持续扩大，却罕有学术著作对这一经济现象的政治意涵做出分析。

康奈尔大学学者新近发表的这篇论文，有效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发现，即便控制住政体类型、人权状况、国家能力、与美国经贸关系和对美国态度等一系列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华态度的因素，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这个关键指标，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非洲和拉美国家与中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契合程度。

这篇论文指出，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对于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是否采取与中国相一致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两个机制：首先，当一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量更大时，这个国家就更倾向于采取与中国相一致的外交政策；

同时，当一个国家在贸易上更依赖中国时，这个国家也更倾向于在外交政策上与中国步调一致。

但是，上述结论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即：某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与中国在外交政策上步调一致，可能与其对华贸易情况无关——或许是中国更倾向于和那些外交政策与自己比较相似的国家发展经贸关系。

针对这个问题，两位学者指出，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贸易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能源生产规模有关，而这些国家的能源生产规模却与其外交政策并无直接关系。于是，借助对非洲和拉美国家能源生产规模的分析，两位学者采用巧妙的统计手段排除了上述替代性解释。

不为发展经贸关系附设政治条件，这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而中国在与非洲与拉美国家深化贸易合作的同时，也始终自觉坚持不介入贸易对象的内政问题。然而，尽管贸易的初衷可能在于获得利润，但随着互惠关系的巩固与深入，贸易伙伴之间不仅能够培养起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也往往会在持续互动中不断加深了解和互信，最终在国际舞台上形成步调一致的默契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刚刚结束的中美经济对话将贸易问题作为

核心议题, 不仅与两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密切相关, 或许也包含着两国对深化双边合作关系的希望, 说明两国都愿意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采取实际行动。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7 月 24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Flores-Macias, G. A., & Kreps, S. E. (2013). The Foreign Policy Consequences of Trade: China's Commercial Relations with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1992—2006.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5(2), 357–371.

中国公民在海外曾遇到哪些风险

虽然近年来海外中国公民在越来越多的地方遭遇到了风险，但大规模、高烈度事件却并不常见。海外中国公民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显著相关。

◎ 陶郁

8月初，5名中国公民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遭遇袭击，3人死亡，1人失踪。事件发生后，海外中国公民安全再次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

随着中国公民近年来前往海外的规模和次数不断增加，相关风险已经成为亟需重视的现实问题。而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也逐渐成为保护中国海外利益的关键领域。

针对上述情况,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汪段泳博士最近在《当前中国事务期刊》(*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上发表论文,通过对外交部于2008年到2010年间发布的“出国特别提醒”进行定量分析,系统勾勒了中国公民在海外所面临风险的基本类别、分布情况、核心特点及主要成因。

基于公开统计数据,汪段泳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出于旅游、经商、留学和公务等原因,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走出了国门。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公民出国人次从1000万迅速飙升至5739万,需要外交部门提供领事保护的案件数量,也随之大幅增长。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海外公民的预警保护能力,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通过分析外交部网站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所发布的486条“出国特别提醒”,汪段泳发现,中国公民在海外最常遭遇的风险为财物损失。就比例而言,“出国特别提醒”所披露出的海外中国公民财物损失案件,分别约为死亡与受伤案件的两倍,分别为关押与拒绝入境或遣返案件的四倍。

从地理分布来看,在所有针对海外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的特别提醒中,有近三成指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超过两成指向西太平洋

和大洋洲地区，其余依次指向西欧北美和东欧中亚地区，而指向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北非地区和南亚地区的特别提醒则相对较少。

从经济水平来看，对海外中国公民的特别提醒，较多地指向低收入与中下等收入国家和地区，较少地指向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的非经合组织国家与地区。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有近四分之一的特别提醒针对前往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的中国公民，但其中关于人身伤害风险的提醒所占比例较小，关于法律文化冲突、意外死亡事故和自然灾害等风险的提醒则相对较多。

不过，根据汪段泳的总结，虽然近年来海外中国公民在越来越多的地方遭遇到了风险，但大规模、高烈度事件却并不常见，外交部门领事保护的响应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具体来说，海外中国公民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显著相关。其中，意外伤害和旅行中被盗抢，成为人身风险的主要来源，经济风险的重要表现则是劳务人员权益受损，而“中国公民自身需承担相当部分责任的边境和入境后风险问题”也相当突出。

在汪段泳看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和作用发生变化，海外中国公民的风险问题迅速增长，不仅是必然的结

果,甚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的事实。中国公民在海外所遇到的风险,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和议论之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随着国家经济水平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走向了海外;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等问题的出现,海外中国公民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难免会受到影响。

如同喀布尔事件所反映的那样,中国公民海外风险的增加,需要并且已经引起了政府和民间的重视。这一情况是大国发展必然会面对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有效规避和降低风险,从国家到个人都需要做出努力。事实上,如汪段泳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外交部所披露的所有领事保护案件中,“约有一半是由于公民自身的不当行为引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降低中国公民在海外的风险,或许首先应当从海外中国公民开始做起。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Wang, D. (2013). The Safety of Chinese Citizens Abroad: A Quanti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pecial Notices for Chinese Citizens Abroad” (2008–2010).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2(1), 167–198.

中国因素影响国际油价

随着中国成为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原油的需求正显著影响着国际油价，而且这种影响力还在不断增强。而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从客观上要求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 陶郁

9月13日，“发改委”发布通知，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90元和85元。本次价格调整是中国自2013年3月实行成品油定价新机制以来的首次“三连涨”，也是年内油价第6次上调。统计显示，自7月20日以来，国内成品油每吨的累积涨幅已经超过650元，引发人们普遍关注。

据报道，“发改委”之所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三次调

高油价，与国际油价变化直接相关。由于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并一度出现恶化可能，9月以来多个品种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都飙升到了数月乃至数年以来的新高位。而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紧密联动，则深刻地反映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市场要素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

其实，中国油价一方面受国际油价影响，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国际油价。随着中国原油供需缺口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在相当程度上需要进口原油助燃；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因素对国际原油市场发挥着重要影响。最近，欧洲中央银行经济学家白尔尼（John Beirne）和他的合作者在《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论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白尔尼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成为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方式，不仅与中国人民的生活直接相关，更产生了许多全球性的深远影响。以原油市场为例，研究表明，最近十余年来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的原因主要在于需求扩张而非供给缩紧，而中国原油需求增长的速度则位居全球第一、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

中国目前的原油需求主要来自于工业生产、生活服务和交通

运输等三个方面。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30年,超过八分之一的世界原油总需求 and 三成以上的新增原油需求将来自中国;其中,近一半原油将被用于工业生产,另有约三成将被用于生活服务、近两成将被用于交通运输。

通过使用1965年至2011年全球油价和63国经济数据构建统计模型,白尔尼等学者发现,中国对原油的需求确实显著影响着国际油价,而且这种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在排除干扰因素和交互作用的影响后,2011年中国因素对国际原油价格影响的比率为1%,而这个指标到2030年将上升至3%到4%。

白尔尼等学者认为,从短期来看,中国因素对于国际原油价格的影响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有关各方亦可采取行动平衡损益、争取共赢。然而,从长期来看,如果原油价格居高不下,而中国如果不能改变目前低下的原油使用效率,那么随着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发展成本亦将持续攀升。

由于国际油价水平与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因素对于国际原油价格的影响不断增加,中国所承担的连带压力和期望也必然会越来越重。随着中国将在年内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中国必然会被认为需在节能

减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而一些国家也难免将原油价格上涨归咎于中国。

为了更好地应对上述挑战,中国应及早主动采取措施、未雨绸缪。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允许中国采用单纯依靠扩大规模来提升收益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来发展经济。只有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扩展能源供给渠道、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才能逐步降低中国经济发展对于进口原油的依赖,避免陷入“生产越多、能耗越大、成本越高、利润越少”的恶性循环。

参考文献

- Beirne, J., Beulen C., Liu, G., & Mirzaei A. (2013, December). Global oil prices and the impact of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7, 37–51.

政见经济

农村土地再分配：谁提议？谁决策？

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一些农村土地抛荒，一些农村家庭土地不够耕种。尽管中央层面上不鼓励甚至禁止农村土地再分配，但是中国大多数的农村都进行过再分配。通过对于安徽省超过 600 个村民小组的两组问卷调查研究，文章试图揭示农村土地再分配的机制，参与再分配村庄的种类，以及农村情况变化对再分配状况的影响。

◎ 袁幼林

近些年，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不少农村户口家庭进城务工，加上老人过世后多出土地的家庭，不少地方出现土地抛荒现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还有一些仍在农村务农的家庭，由于娶媳妇、生小孩等因素，出现了土地不够耕种的现象。

面对二者的不平衡，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进行农村土

地的再分配。但是根据 1993 年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施》)规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十五年)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文件中同时对“不变”作出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解释。也就是说,中央层面并不鼓励农村土地再分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Jonathan Unger 和研究员 Sherry Kong 博士在《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 中联合撰文指出:尽管中央层面上不鼓励甚至禁止农村土地再分配,但是中国大多数的农村都进行过再分配。通过对于安徽省超过 600 个村民小组的两组问卷调查研究,文章试图揭示农村土地再分配的机制,参与再分配村庄的种类,以及农村情况变化对再分配状况的影响。

在第一组的研究中,476 个村民小组中有超过 452 个(超过 95%)自 1984 年以来至少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而另一组研究中,则有 98.7%进行过土地重新分配,平均每个村民小组进行过 3.8 次重新分配。从时间上来看,1995 年的再分配达到了 137 次,远远高于次高的 1993 年 64 次再分配。并且,总体来看,1995 年之前的若干年再分配次数也远远超过了 1995 年后的几年。

看来,1995 年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研究者解释说:1981

年中段,约有69%的安徽生产队开展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因此,安徽大多数的耕地承包期将在1995年和1996年到期,然后根据《措施》,耕地承包期将继续30年不变。因此,1995年,安徽官员提出了一系列的土地再分配提议,以在新承包期开始之前达成公平的土地分配计划。1998年8月,新的《土地管理法》禁止了大多数形式的农村土地再分配,但再分配还是继续进行着,不过提议再分配的主体渐渐从官员变成了农民自己。

再分配的决定权也基本掌握在农民自己的手中:68%的受访村民小组表示,决定是否进行再分配需要经过村民大会的讨论通过,平均需要获得74.87%的赞成票,许多村民小组甚至设定了一致通过的要求。那么,为何再分配中土地减少的村民仍然愿意投赞成票呢?作者通过调查发现,64%的村民小组会定期举行再分配,这样便可以说服土地减少的村民,告诉他们:土地再分配在不同的时间点会照顾不同的家庭,现在失去土地的家庭可能以后会在需要时重新得到土地。正如一位受访农民所表达的:随着人口的变化,每过几年重新分配土地保证每个人都有土地是非常合理的。

作者通过对于村民小组经济状况参数和土地再分配情况的回归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重新分配土地越方便,村民小组越可

能进行再分配；农业收入对于家庭生活越重要，村民小组越可能进行分配。从这点上来看，1995年后农村土地再分配的减少一方面受到了政策层面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进城务工者的增加，农业收入对于家庭生活重要性的减少。

参考文献

- Kong, S. T., & Unger, J. (2013, January). Egalitarian Redistributions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China through Community Consensus: Findings from Two Surveys. *The China Journal*, 69.

中国劳工问题困境：保障利益不如赋予权力

从基层抗争角度看，劳工维权应努力拜托碎片化、突发性强的特征，转而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建立常态维权机制。从政策制定角度看，仅仅在纸面上保障劳工利益是徒劳的，还必须强化工人的制度性政治权力、改革工会体制。

◎ 张跃然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劳工问题依然是中国社会矛盾最为集中和尖锐的领域之一。与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中下岗工人发起的维权运动潮不同，新世纪劳工抗争运动的主体是在私有部门就业的农民工。许多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的劳工维权行动，无论从数量、覆盖面还是强度来看，均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

吊诡的是，近些年来中央政府无论从舆论表态还是立法行动

上,均愈发明显地呈现出倾向劳工的立场,但劳资矛盾的激化趋势丝毫未被抑制。不断强化的劳工保护政策无法缓解劳工抗争运动的高发态势,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怪象。

中外学者借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框架,对这一怪象做出了许多解释:劳工待遇的提高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分别为维权运动的动员提供了更多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中央政府倾向劳工的立场、日益增多的法律武器、廉价劳动力日益短缺的趋势为维权运动创造了更多政治机会;比起他们的父辈,新一代农民工对工作待遇和环境有更高的期望与更强烈的维权意识。除此之外,在“政见”团队曾经介绍过的一篇研究中,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者 Jeffrey Becker 指出,农民工人际关系结构的改变,也是劳工维权行动持续高发的原因之一。

这些解释虽然各有长处,但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大部分的劳工维权运动并不是劳资双方平等博弈的过程,而是劳工在经济上、政治上弱势地位的体现。不断强化的劳工保护性立法,未能改变劳工根本上的弱势处境。康奈尔大学助理教授 Eli Friedman 近期发表研究,试图通过对卡尔·波兰尼“市场社会”理论的重构来解释这一问题。

在上世纪 40 年代，波兰尼围绕“市场社会”这一核心概念，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刻解读。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机制之一是将原本不属于商品范畴的物品（如劳动力、土地、货币）进行了商品化，使人们的基本生计依赖于市场交易。相应的，市场逻辑、价格机制逐渐取代了原有的社会关系、道德规范，成为了支配社会运转的主要力量，这便是“市场社会”的形成。

随着市场逻辑的不断扩展，势必招致“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弹。在社会不断的抗争之下，政府为民众提供基本的保障，使人的基本生计不再依赖于市场，“福利国家”就此出现（社会自我保护的诉求有时也会不幸地招致民粹主义，如纳粹德国）。当代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然体现着市场扩张和社会防御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波兰尼的理论判断。市场化改革使得劳动力被商品化，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被市场逻辑所取代。而九十年代后期劳工维权运动的兴起，可视作社会对市场的反击。在“社会自我保护”的诉求之下，中央政府逐渐呈现倾向劳工的立场，陆续制定了多项保护劳工利益的法律法规。

但波兰尼的理论无法解释的是：中央政府的态度转变既没有真正降低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劳工实际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也没有缓和劳工问题的紧张局面。换句话说，社会对市场的反击，仅取得了纸面上的胜利。

研究者通过重构波兰尼的理论，为中国的劳工问题现状提供了理论解释模型。他指出，社会对市场的反击，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形态：“冲突性反击”和“制度化反击”。

在冲突性反击形态下，劳工的抗争多是自发的、无组织的、碎片化的，不存在跨企业、跨行业的动员、整合机制，工人缺乏制度化的政治力量，无法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保证自身权益不受侵犯。在此情形下，保护劳工的法律法规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工人只能诉诸非常规的、极端性的维权渠道。

在制度化反击形态下，工人拥有制度化的政治权力与政府、雇主讨价还价，维权成为常态化的政治机制，通过有组织的动员、整合，工人的声音可以直接影响政策制定。在制度化的政治权力支撑下，工人可以获得有效的保护，避免自身的基本生计被市场逻辑侵犯。

近些年来，中国一直处在“冲突性反击”阶段徘徊不前，难以完

成向“制度化反击”的转变。

阻止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研究者认为，答案是徒有其表的官方工会系统垄断了对劳工民意的代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受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的地方工会和企业工会是工人利益的合法代表。然而，无论是相对于地方政府还是相对于资方，法定工会都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地方工会受同级党委领导，工会干部一般由党委指定而非内部选举产生，在政府面前难获自主权力。企业工会的资金来源为企业所缴纳的税收，而非工人缴纳的会费，工会领导往往就是企业的管理人员，经济和人事上的不独立使工会甚至成为资方利益的代表。虽然中央政府反复表现出倾向劳工的立场，但在“发展之上”的逻辑之下，地方政府依然普遍与资方结盟，使得工会的作用进一步弱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者并未通过系统地经验研究来支持这一结论，故而稍显武断。关于“政治制度安排如何限制劳工运动制度化”这一问题，尚需更严谨详实的经验研究来探索。

通过这一理论重构，研究者说明了被波兰尼所忽视的政治因素的重要性。“社会自我保护”对“市场机制扩张”的反击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一反击的具体政治形态。从基层抗争角度看，劳工维

权应努力拜托碎片化、突发性强的特征,转而寻求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建立常态维权机制。从政策制定角度看,仅仅在纸面上保障劳工利益是徒劳的,还必须强化工人的制度性政治权力、改革工会体制。

参考文献

- Friedman, E. (2013). Insurgenc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the Polanyian countermovement and Chinese labor politics. *Theory and Society*, 42, 295–327.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责任：政府还是市场？

中国的城市基建项目融资可看做是“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的复杂混合：政府主要借助自身的行政特权（如征税能力、土地垄断）通过市场化手段（信贷、证券、土地交易）向私有资本市场融资。然而，这一局面可能不具有长期稳定性。

◎ 张跃然

近年来，“城镇化”议题一直保有相当高的关注度。无论是官方舆论还是学界思潮，均将城镇化视作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的重要引擎。然而，迅猛的城镇化必然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这一基建大潮的资金支持从何而来？

来自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四位研究者在《城市研

究》上发表论文,通过梳理历史上的政策变迁,并分析在六省十五市实地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数据,对城市基建背后的融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由此进一步探索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由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用税收提供资金支持。但80年代以降,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至上”意识形态对各级政府官员的渗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与日俱增,逐渐超出原有政府财政结构的承受范围。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出现势必会挑战政府在城市基建中的垄断地位。当市场化的浪潮席卷整个社会,政府也开始借助市场的力量,弥补自身财力的不足。

研究者梳理了1978年以后有关城市基建融资方面的制度变迁,指出了其中所蕴含的的两条重要线索。

一是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商品化为政府提供新的收入来源。1987年,深圳、广州、天津、上海开始对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进行试点,所获财政收入可观。土地财政制度在此之后不断发展,最终在2002年的《招标投标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中被正

式确立。

二是引入私有资本对城市基建进行投资。私有资本在 1992 年首次被允许进入基建领域。这一制度在 1995、2002、2004 年出台的政府行政法规中被不断深化, 门槛降低、范围扩大。无论是土地商品化还是私有资本的介入, 均体现出市场力量和政府行为之间不断加深的互嵌、互补关系。

在这一制度框架之下, 我国的城市基建融资主要有三种模式。

其一是传统的政府主导型融资。在这一融资模式中, 政府通过财政收入(包括税收、行政收费和卖地收入等)直接为基建项目融资, 它主要适用于那些建设成本无法被转嫁给使用者的基建项目(如城市绿化)。

其二是国有企业主导型融资。此处的“国有企业”指各个地方政府成立的国有独资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此类公司专门负责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投资, 并通过对公共基础设施建成后的经营收回投资。城投公司的融资来源主要是: 1) 政府的卖地收入和预算内财政收入; 2) 以政府未来的财政收入和卖地收入作为担保的银行信贷; 3) 以公司名义发行的债券、股票(毋庸置疑, 这些证券在

金融市场中的信用根本上还是来自于人们对政府财政收入能力的信任)。与政府直接投资不同,城投公司主要投资那些建设成本可以被转嫁给使用者、通过使用者缴费可以收回投资的基建项目。

其三是私有部门主导型融资。这一模式一般包括建设、经营、移交三个环节。私有资本为基建项目提供资金,政府授予该私有企业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项目建成后,企业可以在特许专营期限内经营该项目,回收投资、赚取利润。到期后,该基建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这一模式主要适用于具有明确的盈利前景的项目。

通过对田野调查所获数据的分析,研究者发现,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主要依赖的融资模式不同。由于财政能力有限,县级市主要依赖于政府主导型融资。一方面,县级市缺乏财政自决权,难以成立城投公司。另一方面,由县级市承担融资责任的基建项目往往规模小,不具有盈利前景,难以吸引私有资本。政府在投资基建项目时,由于可支配的预算内收入十分有限,因此对卖地收入自然产生严重的依赖性。

相比之下,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一般拥有较强的财政兜底能力,卖地收入也十分可观,因此有条件成立城投公司以作为城

市基建项目的主要融资平台。

虽然行政级别不同的城市在融资方式的组合上存在明显差异，但也存在共同点。第一，私有资本主导的融资模式在各级城市的融资结构中所占比重较小；第二，各级城市的基建融资均严重依赖于卖地收入——换句话说，土地财政收益最终以公共服务的形式被全体城市居民共享，这一制度在过去十余年中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柱。

城市基建项目的融资问题，为我们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谁来提供公共服务？各国政府为此提供的答案，构成了一个从“绝对的政府”到“绝对的市场”的连续光谱。在“绝对的政府”一级，基础设施完全由政府的财政收入投资建设，并垄断经营权；在“绝对的市场”一级，基础设施像其他的商品一样，完全由私有部门经营，在市场竞争机制下被生产和消费。而中国的情况，可看做“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的复杂混合：政府主要借助自身的行政特权（如征税能力、土地垄断）通过市场化手段（信贷、证券、土地交易）向私有资本市场融资。

然而，这一局面很可能不具有长期稳定性。如前文所述，城市

基建项目融资严重依赖政府卖地收入,而土地在“农村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过程中的巨大增值收益乃是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平面扩张”阶段的特定结果。但城市平面扩张不可能是无限的,当中国城镇化发展告别圈地阶段后,地方政府很难继续通过卖地获得巨额收入。考虑到目前许多城投公司已经背负相当数额的债务,这一局面最终很可能无法持续。

参考文献

- Wang, D., Zhang, L., Zhang, Z., & Zhao, S.X. (2011). Urban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in Reform-Era China. *Urban Studies*, 48(14), 2975–2998.

学者建言：将土地开发权适当下放给农民

2013年7月以来，中央频频表示“要让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上限是防通货膨胀，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但在持续的下行压力下，中国怎样完成稳增长的任务？中国人民大学陶然和瓦萨学院苏福兵建言，让地方政府释放出一些土地开发权给农民，或能刺激城镇化为中国经济做出长足贡献。

◎ 刘岩川

2013年7月以来，中央决策层频频表示“要让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李克强总理为“合理区间”设定了范围：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但在持续不断的下行压力面前，中国怎样完成稳增长的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陶然教授和瓦萨学院苏福兵教授最近在布鲁金斯学院建言，让地方政府释放出一些土地开发权给近郊的村民，或

可为城镇化注入强心剂,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长足贡献。

目前的学界流传着不少经济改革的建议,但在陶然和苏福兵眼中,都是“远水不解近渴”——

首先是金融改革。长期来讲,利率市场化会把资本分配给最能有效利用它的企业或行业。但在短期内,利率随市场因素上扬会直接把地方政府和国企肩上的负债变为坏账,让银行业直面风险。此刻如果爆发大规模的债务问题,不但带动不了增长,还会影响改革进程。

减税也是广受议论的选择之一。虽然轻徭薄税有益于长远发展,但在土地市场遭遇寒流的情况下,本就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怎能在此刻自降身价?

“打破国企在某些领域的垄断地位”也是谏言者极力倡导的,不过在庞大而强悍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前,破除垄断还需要时间和努力。

在陶然和苏福兵看来,土地和城镇化才是改革的前沿阵地。在把城镇化定位为中国经济发展引擎的前提下,二位学者建议将开发土地的权力下放给近郊或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使其利用脚下的土地上为流动人口提供租屋。新开发的房屋将帮助2亿农民工转

化为永久市民，而原住的农民则可赚取数额可观的租金。按照两位的设想，这些新开发的租房只能在10—15年之后才能在市场上买卖。

当然，地方政府不会甘愿放弃开发近郊土地的权力。土地长期是地方政府的命根。1994年分税制出台之后，各地政府不但要向中央上缴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还肩负着越来越多的支出责任。招商引资、开发房地产，成了地方政府充实财力的利器。地方政府往往以低廉的价格将土地出让给工业投资者，而这方面的开销，则靠高价出让房地产用地“找补”。此外，为了进行价格不菲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土地管理者地位的政府，往往将土地用作担保换取银行贷款。

不让地方政府从土地获得收入，在现阶段无异于压迫其神经中枢。而让其继续，则又会持续已经存在的老问题：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已经造成某些领域的产能过剩；高价土地出让金使房价扶摇直上；为了吸引投资、增加出口，人为压低工资，既打击了消费又压制了劳动者的权益；工业的大规模扩张也加剧了环境压力。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以虚高的土地价值为担保，用银行贷款大兴土木搞建设，无形中把银行也带向悬崖边。

针对这种两难的困境，陶然和苏福兵认为：适度下放地方政府开发土地的权力有利无弊。他们举例说明，如果近郊有一块适合接纳流动人口的土地，可以让当地的村民和政府各开发50%。政府拥有的50%中，两成可以出让，剩下的三成为将要扎根的流动人口提供学校、医院等设施。村民在拥有土地开发权之后，可以在他们的50%土地上开发适合流动人口租用的房屋，其价值也会因为政府在周边提供的基础设施而提高。如此一来，流动人口将受益于廉价的租金和完善的公用服务，原住居民则拿到可观的租金，而地方政府在不掏自己腰包的情况下促进了城镇化，还能长久享受新城区带来的税收。

此类做法也有更大范围的好处：将城乡结合部或近郊的土地控制在租赁市场，不会让房地产泡沫瞬间崩溃。此外，在10—15年内允许新开发的出租房屋流入买卖市场，也可以明确告诉炒房者：未来的房价因为供应的增加而不至于暴涨。最后，那些受到产能过剩困扰的建筑型工业，也可以借机消化一部分产能，甚至享受一次土地开发的小高峰。

目前国家关于城镇化的细则还没有出台。陶然和苏福兵的建议在理论上充分考虑了外来人口、地方政府和近郊原住居民的利

益。但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必然无法行使一刀切的城镇化政策。二位学者的建议也许能在产业发达、就业机会充分且外来人口众多的地区起到效果,但不少城镇还需要考虑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来带动就业和人口迁移。如何让地方政府、流动人口与常住农民自愿、有序地成为“利益共同体”,也需要在实际中探索。

参考文献

- Tao, R., & Su, F. (2013, July 24). Reviving China's Growth: A Roadmap for Reform. Brookings Institution. <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7/24-china-growth-roadmap-reform-tao-su>

由发展经济转向社会保障？

转变中的中国住房政策

近年来，住房政策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转变。中山大学的朱亚鹏教授认为研究中国的政策范式转变和主流政策理论既有重合也有分别总括而言，住房政策的范式转变说明中国的政策过程不再是一个绝对“自上而下”过程，纵使国家仍然掌把政策决策的主导权，它仍要留意和响应社会的需求以维持管治的效率和合法性。

◎ 杨鸣宇

住房可能是中国民众和政府最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自从中国政府在 1998 年停止福利分房政策后，住房的供应进入市场化阶段。繁荣的房地产市场虽然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造成了包括住房困难、房价过高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近年来，住房政策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转变。中山大学的朱亚鹏教授撰文对这种“政策范式转变”（policy paradigm shift）进

行了分析。他主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住房政策是否真的发生了政策范式的转变？第二，如果政策范式真的发生了转变，为何住房问题未见得到有效的改善？

根据学者 Peter Hall 的定义，所谓“政策范式”是指定义政策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政策工具和政策问题的一系列想法和标准。在这个定义下，政策范式可以有三种层次的转变。第一层次，只改变对政策工具的安排（setting）；第二层次，改变使用的政策工具，但政策目标维持不变；当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类型和安排均发生变化时，第三层次的转变就会出现。第一、第二层次的转变一般被视为正常的政策过程，而第三层次转变则为政策的彻底改变。

按照这种定义，自 1998 年起中国的住房政策显然已经发生了第三层次的转变——住房不再被介定为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产品，而是商品；房地产市场同时负有拉动经济发展的任务，并主要依赖市场机制来提供。

伴随这种转变的则是上述提及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又促使政策范式发生另一次转变，由作者所谓的“房地产范式”（real estate market paradigm）转向“住房社会保障优先范式”（housing policy as social policy paradigm）。这种转变包括：政府重新把住

房问题定义为市民的基本权利和政府的职责，并使用市场机制辅以政府补助的形式来实现政策目标等。

这就带来了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何政策范式转变后的效果并不明显？

朱亚鹏提供的解释是：得益于“房地产范式”的政策参与者，比如地方政府、商业银行、房地产企业等组成了一个非常紧密而且封闭的政策网络，它们抗拒认真执行可能损害它们利益的新范式，并且不断尝试阻止新的政策参与者进入到政策过程之中。

因此，虽然在中央高层领导的支持、社会各界的期望，以及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发展（比如和住房保障相关的 NGO 的不断活动）下，“住房社会保障优先范式”得以出现。但是在具体执行上却达不到政策的目标。另外，朱也认为 2008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潜在风险使中央在推行“住房社会保障优先范式”上变得更为谨慎。

总括而言，朱认为研究中国的政策范式转变和主流政策理论既有重合也有分别。首先，一般认为政策范式转变是由新的政策知识（policy learning）和外生性因素（exogenous shocks）所推动。中国的住房政策这个例子证明前者确实发挥了作用，但后者亦使政

策范式倾向维持不变。这有别于西方国家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如金融危机）往往会促使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经验。

其次，要理解政策知识和外生性因素在特定政策领域的作用，就需要分析这个领域内的政策网络情况，从而解释政策范式的变化。

最后，住房政策的范式转变也说明中国的政策过程不再是一个绝对“自上而下”过程，纵使国家仍然掌把政策决策的主导权，它仍然要留意和响应社会的需求以维持管治的效率和合法性。

参考文献

- Zhu, Y.-P. (2013). Policy Networks and Policy Paradigm Shifts: Urban Housing Policy Develop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2), 554–572.

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已有两个失去动力

近十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大引擎已有两只：劳动力优势和投资拉动逐渐失去了动力。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其实就是生产力重新解放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生产力仍然有进一步解放的空间，未来十年内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有可能保持在7%—8%的水平。

◎ 归宿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大致召开时间已于日前确定，这次全会广受关注，会上将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当其时。一方面，中共新领导层换届已有一年，各项磨合已经完成，人事布局也以调整到位，正是“施展拳脚”的时候；另一方面，今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和一系列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在体制机制上存在着一系列结构性问题，严重制约着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在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关键时刻。

关于中国改革特别是经济改革的下一步方向,国内外各界人士有诸多分析和评论。近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网站刊登了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项目部主任、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空(Huang Yukon)的文章《中国的生产力挑战》(*China's Productivity Challenge*),提出:提高生产力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源泉。

文章认为,尽管习近平主席已明确提出,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要保持在7.5%以上,但实际仍有下行到6%的风险。主要原因在于,近十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大引擎已有两只逐渐失去了动力。

一是中国正在逐渐丧失劳动力优势。扩大就业,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每年可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1到2个百分点。但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接近饱和,并开始萎缩,未来扩大就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将越来越小。

二是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已不明显。政府投资拉动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政府投资每年贡献了超过4%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但在2009年4万亿天量经济刺激计划的

影响下，投资带来的边界递减效应更趋明显，投资已经无法使中国经济保持原来的增长速度。事实上，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已经比近些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低了3到4个百分点。

所以，中国经济发动机的最后一只引擎：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长，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其实就是生产力重新解放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生产力仍然有进一步解放的空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有可能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继续在未来十年内保持在7%—8%的水平。

如何让这最后一只引擎保持动力？文章提出，中国政府应努力做好两方面改革。首先是提升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效率。城镇化近几年来是热点，但中国城镇化进程效率太低，在某些地方城镇化简单演变成了“造城运动”，新兴的城市并没有形成“聚集效应”。因此，当经济泡沫破灭时，这些大兴土木建设起来的“新城”也都成了“鬼城”。

文章认为，推进改革户籍制度有助于提升城镇化效率。目前很多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人，由于没有户口，享受不了一系列社会福利保障，最终还是离开城市。而只有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使他们都聚集到城市的时候，商品、资本、信息的流通才会加速，市场的作用也才能更得到体现，生产力也才能进一步得以提升。同时，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也是提升城镇化效率的重要途径。中国尽管城镇化推进迅速，但当前城镇化率刚刚达到 52%，仍然大有可为。

其次，中国应该鼓励私人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尽管过去三十多年间，私人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当前需要私人经济发挥作用的迫切性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私营企业的平均收益率一直高于国有企业，经过 2008 年金融海啸冲击后，这一差距又被拉大，私营企业的盈利能力凸显。

除了收益率之外，私营企业在负债产权比率（debt-to-profit ratio）上也占有明显优势。据统计，目前中国私营企业的平均负债产权比率比 2008 年时低了 5%，而国有企业则平均上升了 33%。

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应采取一些大胆的政策，进一步释放私营经济的活力，诸如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一些之前禁止进入的领域，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商业活动等。只有私营经济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了，中国的生产力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继续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政府目前已推出了了放宽审批程序、放宽资本流动限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这将有助于生产力的提升,刺激经济发展。但是也要看到,如果前面提到的结构性障碍得不到解决,中国经济很难实现稳定的快速增长。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复杂。

本文已刊发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Huang, Y. (2013, August 19). China's Productivity Challeng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8/19/china-s-productivity-challenge/gjev>

政见学术

中国研究为何被边缘化？

随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增强，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理应成为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中国问题研究的踪影在西方比较政治学中难以寻觅。一方面，与中国问题学者的研究方式有关，造成中国问题研究难以形成大量具备延展性解释力的理论；另一方面，中国研究面临“政策黑箱”，使主流学界对这种非西方式民主制度研究存在偏见。

◎ 宿亮

比较政治学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主流分支，通过对不同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对政治现象的发展有较强的解释力。不过，在美国比较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中，大多数时候却难见中国问题的踪影。

事实上，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 1986 年就曾撰文指出，中国研究并没有在政治科学的发展进程中产生显著影响。比较政

治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讨论世界历史中宏观、实质性问题。在当代比较政治学中,拉丁美洲、非洲和一些亚洲国家发展进程都成为重要的研究案例,这种现象与中国在国际社会不断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形成鲜明的对比。

多伦多大学学者玛丽-伊芙·瑞内(Marie-Eve Reny)的研究为这一现象提供了佐证。她搜集了美国排名前50的大学和学院比较政治学学科的42份课程大纲,分析了课程的参考文献——这些参考文献集中了比较政治学授课者认定的该学科重要研究成果,其课程章节设置也体现了授课者对这一学科的理解。分析这些参考文献中涉及中国问题的条目,能够反映中国问题在主流比较政治学教学和研究中的地位。

在全部42份大纲中,19份有与中国有关的参考文献,总计35篇。多数资料仅出现在一份大纲里,而不是重复出现在多份大纲中,这说明这些文献对学科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相比之下,32份大纲中有136篇关于拉美的研究资料;28份大纲中有110篇关于非洲的研究资料;29份大纲中使用了98篇关于原苏联的研究资料;18份大纲中有关于中东的50篇资料;28份大纲中有21篇关于中国以外亚洲国家的研究资料。

就 35 篇涉及中国的文献而言,它们多数取自比较政治学教科书,而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著作或学术文章。

就课程章节来说,在全部 42 份大纲中,只有 5 个有专门涉及中国的部分。

一些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学过于“欧洲中心主义”或关注美国霸权,但拉美、非洲、原苏联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频频出现否定了这样的说法。

瑞内认为,中国过去 30 年的改革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内政外交,中国研究在比较政治学的低“曝光率”并不正常。

至于原因。瑞内分析,这种现象首先与中国问题学者的研究方式有关。一方面,中国问题学者主要在政治学科下专注中国研究的“次领域”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这些文章集中在几本中国研究期刊上,如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Journal*, 以及 *Modern China*。瑞内分析的 8 名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多数刊登在次区域研究刊物上。这与拉美和非洲问题专家把很多重要的结论刊发在政治学综合学术刊物上的状况完全相反。

另一方面,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在中国政治理论框

架下讨论,而不是在比较政治学基础理论框架,无法对学科下更宏观的问题进行研究。

最后,由中国问题研究所形成具备延展性解释力的理论分析屈指可数。比较著名的例子包括——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蔡欣怡 2006 年的研究强调:政治因果机制和中国政府机构在变革中展现弹性,认定中国政府机构在改革中具备一种非正式的适应机制。该项研究证明非正式机制能够保证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存在,从而确保政权稳定。

美国学者季礼 2011 年针对中国的研究结论挑战亨廷顿的看法,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多年后,国家仍是最具理解力的研究单位,质疑亨廷顿提出的国家权力在新形势下弱化的结论。一些量化研究学者也以中国问题为出发点为比较政治学做出贡献。如梅拉尼·马尼恩 2006 年通过对草根选举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拉美政治案例研究的结论。

不过,除了这几项能够运用在比较政治学理论扩展的研究之外,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分析并不多,这也是比较政治学中难以纳入更多中国案例的原因。

另外,主流比较政治学过于强调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很难

把中国崛起和发展的经验性研究纳入学科框架内。

瑞内认为,比较政治学对非西方式民主制度的研究存在偏见。主流政治学学者相信,中国研究在政治学中被边缘化是因为非民主机制难以用科学研究标准来分析,因为它们的决策机制并不透明。不过,对于不少中国问题专家来说,这种研究中面临“政策黑箱”的问题尽管存在,但与针对其他地区的研究区别不大。

作为西方主流政治学研究,中国问题在比较政治学中的“缺席”属不正常现象。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理应成为政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内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学科发展特点的梳理,还为专注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学者提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参考文献

- Reny, M.-E. (2011). Review Essay: What Happened to the Study of China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1, 105–135.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现状

尽管美国学界有不少研究中国边疆的学者，然而大部分学者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美国智库利用学者帮助美国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

◎ 励轩

最近有一位国内学者发表文章，提出美国智库利用学者帮助美国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这样的观点似乎缺乏足够的证据。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要澄清几个问题：美国到底有哪些人在研究中国的边疆？他们如何与智库开展合作？这些学者如何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们与流亡藏人、维人、中国的关系分别如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澄清，将有助于解答美国智库是否利用学者帮

助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

谁在研究中国的边疆

中国的边疆研究在美国并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显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授主要集中在几所知名大学。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 (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简称 CEUS), CEUS 的前身是 1943 年成立的旨在为美国军方培训中央欧亚语言人才的项目, 后来逐渐转向学术, 1965 年转型为乌拉尔和阿尔泰语系。此后该系在著名的中亚研究专家 Denis Sinor (丹尼斯·塞诺) 教授带领下成为世界最杰出的中央欧亚研究机构之一。1993 年, 该系改名为中央欧亚研究系。CEUS 是美国高校中唯一一所致力于中央欧亚地区研究的系, 云集了世界上该领域最优秀学者, 提供中央欧亚领域几乎所有语言课程。涉及到中国边疆研究, 这个系主要按照地区划分为三块, 蒙古、藏区和新疆。Gyorgy Kara 和 Christopher Atwood 是该系蒙古学教授。Kara 教授学识渊博, 能运用数十种语言, 在该系享有“教授的教授”的美誉, 据称他能阅读蒙古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文字。Atwood 教授博士论文做的是 1930 年代内蒙古民族主义动员, 虽

然他专长在蒙古现代史,但是近来对古代史也表现出浓厚兴趣, Atwood 教授懂蒙、满、汉文。Elliot Sperling 是该系藏学家,他的专长在明代西藏历史,他对现代西藏也有很大兴趣,经常在媒体或网络上发表自己就西藏事务的看法, Elliot Sperling (史伯林) 藏、汉、法文均很流利。Gardner Bovingdon (包文德) 是 CEUS 新疆学教授, 2002 年从康奈尔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导师是 Benedict Anderson。他是美国目前唯一一位专注于新疆研究的政治学家, 精通汉、维、哈语, 同时兼任政治学系和东亚系教授。他最新一本著作《维吾尔人: 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The Uyghurs: 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出版于 2010 年。此外, 该系著名的中央欧亚研究专家 Christopher Beckwith 教授也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涉及到中国的边疆特别是西藏。CEUS 拥有一个研究所和一个资料中心: 塞诺内亚研究所 (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SRIFIAS) 和国立内亚和乌拉尔资源中心 (Inner Asian and Uralic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IAUNRC)。CEUS 目前的藏语讲师为 Gedun Rabsal 先生, 维语讲师为 * * * 女士 (应这位女士的要求, 名字省略), 蒙古语讲师为 Tserenchunt Legden。CEUS 因其在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历史悠久、师资完备、资源丰富, 当之无愧是美国

学术界的翘楚。

哈佛大学内亚和阿尔泰学委员会 (Committee on Inner Asia and Altaic Studies, 简称 IAAS) 是由哈佛大学各系相关领域教授组成的项目, 现有三位涉及到中国边疆地区的教授, 分别是藏学家 Leonard W. van der Kuijp (范德康)、Janet Gyatso 以及清史学家 Mark C. Elliott (欧立德)。范德康教授的兴趣主要在 13—15 世纪西藏历史和藏传佛教。Janet Gyatso 是一位藏传佛教专家。Mark C. Elliot 教授以其推动满学研究而著名, 是新清史的重要人物之一, 代表作品有《满洲之道: 晚清的八旗和族裔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弗吉尼亚大学西藏中心 (The UVA Tibet Center) 是由该校藏学学者组建的研究中心。Leslie J. Blackhall 博士从事印度和西藏医药研究, Tsetan Chonjore 是东亚系藏语讲师, David Germano 教授、Jeffrey Hopkins 教授、Karen Lang 教授、Kurtis Schaeffer 教授兴趣均在藏传佛教, Kabir Heimsath 博士的兴趣在当代西藏城市空间、艺术、旅游和宗教修行, Nicolas Tournadre 教授是一位专注于藏语的语言学家, Brantly Womack 是对西藏议题感兴趣的政治学系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项目 (Modern Tibetan Studies Program) 有两位藏学教授 Robert Barnett 和 Gray Tuttle 以及一位藏语讲师 Tenzin Norbu Nangsal 先生。Barnett 教授是伦敦西藏信息网 (Tibet Information Network) 创始人, 在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 他是一位活跃的记者, 至今还为 BBC、CNN、NPR、CBS、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撰稿, 其兴趣在中国民族问题。Gray Tuttle 教授 2002 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内亚史博士学位, 他的兴趣在 20 世纪的汉藏关系, 他最新的著作《现代中国诞生中的藏传佛教》(*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在 2005 年出版。

除去以上学者相对集中的学术单位, 其他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学者则是零散分布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 Nicola Di Cosmo, 1991 年从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和阿尔泰语系 (现 CEUS) 取得博士学位, 从事中国和内亚关系史研究, 他对蒙古史和满洲史尤感兴趣。乔治敦大学 (Georgetown University) 的 James Millward (米华健) 教授专注于新疆史, 他的代表作是《嘉峪关外: 1759—1864 年清朝中亚地区的经济、民族和国家》(*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Xinjiang, 1759–1864*)。达特茅斯学院历史学系的 Pamela Kyle Crossley (柯娇燕) 教授是

新清史重要人物,她的兴趣在内亚史,代表作有《透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和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达特茅斯学院东亚中东语言和文学系还有一位从事新疆学的学者,Justin Rudelson 博士,他的专业为社会人类学,其代表作为《绿洲认同:中国丝绸之路上的维吾尔民族主义》(*Oasis Identities: 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的 Evelyn Rawski 教授是新清史又一位重要成员,她的兴趣在东北亚。Rawski 教授和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就满洲汉化问题的辩论是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事件。

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 Melvyn C. Goldstein 教授虽然出身人类学,却是美国最有名的西藏现代史专家,他的《西藏现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在业内拥有很高声誉。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 Dru Gladney (杜磊)教授是研究中国穆斯林世界的人类学家,除了回族穆斯林,他也研究维吾尔穆斯林,他的代表作有《中国穆斯林:族裔民族主义在人民共和国》(*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堪萨斯大学人类学系 Arienne M. Dwyer 是一位语言人类学家,她的兴趣是包括维语在内的突厥语。耶鲁大学历史学系

Peter Perdue 教授对中国边疆史感兴趣,他在 2005 年出版了专著《中国进军西部:清对中央欧亚的征服》(*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 Thomas S. Mullaney 教授曾经专注于云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工作,并且为此写了专著《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不过现在他的兴趣发生了很大改变,目前专注于研究中国的打字机。

智库和中国的中国边疆研究

美国主要智库目前并无享誉学界的中国边疆研究专家。不过,也会有智库委托在大学供职的教授完成相应项目,以此介入中国边疆研究。通过这种方式来扩大影响力的智库,最有名的便是美国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简称 EWC)。东西方中心是美国国会在 1960 年成立的旨在增进亚太地区和美国相互联系与理解的教育研究机构,总部位于夏威夷的 Manoa,与夏威夷大学紧邻。该中心由美国政府资助,但也接受其他私有机构、个人、基金会和外国政府的资助。

从 2003 年起,东西方中心开始一个政策研究丛书出版项目,

该项目旨在呈现学界对国内外重要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的思考。中心网罗到全世界在相关领域最优秀的学者实施这个项目，同时还找到了纽约卡耐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的支持。迄今，这个项目有三个出版物涉及到了中国的边疆研究。印第安纳大学 CEUS 的两位学者 Gardner Bovingdon 和 Elliot Sperling 分别完成关于新疆和西藏的课题研究。2004 年 Bovingdon 教授的成果《自治在新疆：汉人的民族主义需要和维吾尔人的不满》（*Autonomy in Xinjiang: Han Nationalist Imperatives and Uyghur Discontent*）在得到纽约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后出版。这篇论文主要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新疆维吾尔人不满和民族冲突的来源。Bovingdon 认为新疆的动荡既不是长期暴力文化的表现，也不是外国阴谋的产物。他认为新疆地区的冲突有多种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正在新疆实施的“区域自治”制度。同年，Sperling 教授的成果《西藏-中国冲突：历史和问题》（*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roblematics*）也在得到纽约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后出版。Sperling 在这篇论文中利用汉、藏英文献试图澄清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与他的“西藏流亡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相互对立的观点。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教授 Yitzhak Shichor

的《族裔外交：中国-土耳其关系中的维吾尔障碍》(*Ethno-Diplomacy: The Uyghur Hitch in Sino-Turkish Relations*)则在2009年出版。Shichor教授认为从1949年后，中国把维吾尔人的分裂主义和追求新疆独立视作是国内问题，然而自从1990年代之后，北京开始承认这个问题有国际因素，并着手处理这个外部因素。新政策影响了中国跟土耳其的关系，后者一直在意识形态上鼓励维吾尔民族主义，为维吾尔难免提供庇护，为东突厥斯坦运动、组织和活动提供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

美国学者和美国政府中国边疆政策的形成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者应该是美国最了解中国边疆的人。他们确实也为美国政府了解中国边疆问题提供咨询。提供咨询的重要方式是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简称CECC)的邀请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CECC是美国政府的独立机构，成立于2000年10月，旨在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和法治发展状况。

2002年6月10日，印第安大学CEUS藏学教授Elliot Sperling应邀在国会发表关于西藏问题的演讲。2009年3月13日，Elliot

Sperling 教授再次接受 CECC 的邀请,发表了题为《2008 年 3 月抗议一年之后:中国正在西藏促进稳定吗?》的演讲。2004 年 5 月 17 日,CEUS 新疆学教授 Gardner Bovingdon 教授接受 CECC 的邀请发表题为《当今中国的伊斯兰信仰:维族和回族不同的现实》的演讲。2005 年 4 月 11 日,Bovingdon 教授再次受邀发表题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的讲演。2009 年 10 月 7 日,Bovingdon 教授在国会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演讲,探讨了 2009 年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七·五事件以及新疆的人权。2005 年 4 月 11 日,印第安纳大学 CEUS 蒙古学教授 Christopher Atwood 受邀发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吗?》的讲演。乔治敦大学 James Millward 教授在 2005 年 11 月 16 日在国会发表《变化中的中国战略关注:对新疆人权的影响》的演讲。凯斯西储大学的 Melvyn Goldstein 教授在 2004 年 3 月 19 日受 CECC 邀请发表了题为《中国藏区的发展项目》的演讲。

学者和流亡藏人、维人的关系

美国的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同情流亡藏人、维人遭遇应该是一种

普遍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判断,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支持每一个具体的流亡藏人、维人。印第安纳大学 CEUS 的 Elliot Sperling 教授虽然同情流亡藏人,但他却公开批评过“藏人行政中央”(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即“西藏流亡政府”),他也曾与“藏人行政中央”的现任首脑 Lobsang Sangay 在 2009 年发生过争论。CEUS 新疆学教授 Gardner Bovingdon 对我表示,虽然他并不完全相信北京所说的,但他也并不完全相信世维会所说的。

由于美国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选择如何与流亡藏人、维人相处,更多是一种个人的选择。不可否认,会有与流亡藏人甚至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保持极为密切私人关系的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的 Robert Thurman 教授。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并没有与中国眼中的敏感人物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多么密切。

与流亡藏人、维人的接触是否会影响这些学者学术上的客观性很难得知。因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有哪位学者是否接受了来自具体某一位流亡藏人、维人及其组织在物质上的好处,从而发表使后者获得好处的观点。甚至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好友 Robert Thurman 教授在其作品《为什么达赖喇嘛重要》(*Why The Dalai*

Lama Matters) 声称他提出解决西藏问题方案的出发点是既想使中国获益, 也想使藏人获益。

他们和中国的关系

没有任何一个研究中国边疆的美国学者在公开场合说自己讨厌中国和中国人。相反, 他们非常渴望能够来中国, 因为这样才能更近距离接触他们的研究对象。许多学者确实也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机构和学者保持了密切交往, 比如哈佛大学藏学教授范德康。范德康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获聘兼职教授, 每年都会来中国人民大学给学生上课。印第安纳大学 CEUS 的教授 Christopher Atwood、Elliot Sperling 最近几年也来过中国, 与中国的相关专家和学生进行交流。

然而也有一些美国学者遭遇了不快。2004 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Frederick Starr 教授组织了十来位学者出版了一本著作《新疆: 中国的穆斯林边疆》(*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该书由中国大陆学者翻译后内部发行, 中文名为《新疆工程》。根据部分中国学者的理解, 这本书“为新疆分裂提供理论依据”。参与这本书写作的学者在申请进入中国的签证时纷纷遇到

了困难,他们称自己为“新疆十三人”(Xinjiang 13)。部分学者事后公开表示自己并“不支持维吾尔恐怖主义,也不支持新疆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随着时间推移,部分遇到入境困难的学者逐渐能够进入中国。

总结

尽管美国学界有不少研究中国边疆的学者,然而大部分学者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即使部分学者声称西藏或新疆在某一历史时间段并不属于他所认为的中国,那也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美国主要智库并没有享誉学界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者,他们需要委托这些学者完成项目。不过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智库的立场会影响这些学者的判断。尽管美国政府会听取学者的报告,然而他们的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决策,目前还难以评估。学者们和流亡藏人、维人、中国的关系也取决于个人,难以一概而论,目前找不到足够证据证明哪位学者收到了哪一方物质上的好处就替谁说话。因此,美国智库利用学者帮助美国政府寻找分裂中国的依据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

政见图书

历史与现状：三本中日关系著作推介

《强社会、智国家：中国对日政策中舆论的崛起》、《痛苦之海：中日战争中的难民》、《为中国而战：中日战争（1937年至1945年）论文集》三本书分别关注中日关系现状和历史，试图从不同侧面解读中日关系，分析两国互动的过去和将来。

◎ 宿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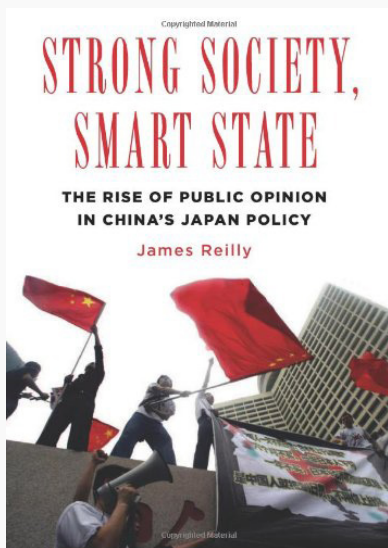
《强社会、智国家：中国对日政策中舆论的崛起》

这本出版于2012年的著作以中国社会舆论与政府对日政策决策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观察中国政府在社会反日情绪高涨的状况下如何管理舆论潮流，并推动政府既定政策。

詹姆斯·莱利指出，中国反日舆论大多非政府主导，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外交决策。不过,学者在分析这种影响时往往忽略系统性分析,仅仅就事论事。基于此,莱利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互动周期模式”(cyclical model of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s),在这种模式下,国家采用一种“应激式的威权主义”来适应并回应“斯巴达式的公众情感”。在舆论情绪高涨时,顺应潮流,推出部分政策响应民众呼声,随后在采取措施,推行理性外交政策,呈现一种“弹性战略”。

这本书梳理了1949年到2010年之间的中日关系,并对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做了详尽描述,同时着重分析21世纪头十年的中日关系。莱利指出,最近十年中日关系特点是中国反日情绪达到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高点,代表事件包括钓鱼岛争端、齐齐哈尔毒气弹事件以及日本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席位。在对这些事件的案例分析中,



James Reilly, *Strong Society, Smart State: The Rise of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 Japan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莱利着重观察公众情感与政府决策的互动,特别是在反日情绪高涨期间,政府的宣传机构如何与媒体互动,以服务于国内和外交政策需要。

莱利还将中日关系与1999年至2001年之间的中美关系进行比较。在炸毁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南海撞机等事件的影响下,反美公众情绪也达到特别的高度。中国对美政策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莱利提出的“国家-社会互动周期模型”的分析可行性。

从方法论上看,莱利在书中采用了访谈、舆论调查,同时搜集了书刊和媒体的汉语文章。同时,他还分析了网络在公共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作者2001年到2008年在中国居住,获得大量一手资料。然而这本书的遗憾在于,分析到2010年戛然而止,没有涉及从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本扣押一事及以后的中日关系事件,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现阶段中日关系所处阶段性特征的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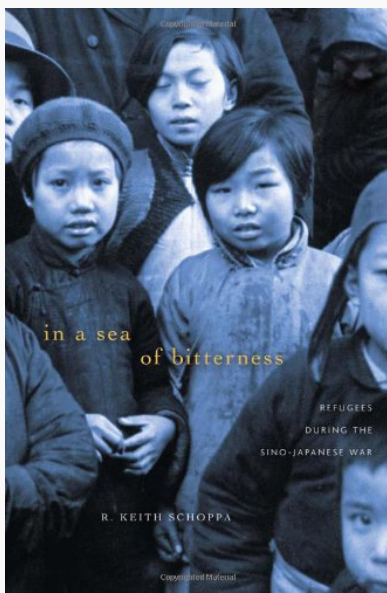
《痛苦之海：中日战争中的难民》

1937年到1945年,中日战争给中国带来了痛苦的回忆。电影《1942》也关注那段时间中国百姓的苦楚。美国马里兰州罗耀拉学院历史系教授萧邦齐(Keith Shoppa)的新著《痛苦之海》也把目

光锁定浙江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中国难民身上。

萧邦齐在著作中讲述了浙江难民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的生存之术。作者引用包括丰子恺回忆录在内的大量回忆和访谈材料,分析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对难民的政策和态度,“焦土政策”下难民何以自处,以及大量地方官员如何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履行职能。萧邦齐分析了流离失所状态下的教育、工商,以及在战争状态下,上海和浙江如何经由商人、地方势力、军阀、官员维持贸易往来。同时,萧邦齐提到: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给浙江不少地区带来的严重后果。

萧邦齐强调,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国民政府在应对危机和帮助民众方面体现了自己的无能。政府组织不力,物资匮乏,在短时间内无法安置难民。国民政府的一些策略反而加剧和恶化了



R. Keith Schoppa, *In a Sea of Bitterness: Refugee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难民承受的痛苦。例如，国民政府奉行的“焦土政策”摧毁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没有阻止日军推进，却让民众生不如死。

许多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改革和革命中起到很大作用，包括在中日战争中展现的御敌精神。不过，萧邦齐提出，民族主义在这些难民的故事中难以寻觅，人们充满故土难离的忧思，但对于国家的节节败退难以顾暇。政府的宣传对于基层民众效果不大。萧邦齐的解释是“在任何战争中，首要目标是自保……在极端紧张和害怕的情绪中，国家可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总体而言，这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萧邦齐对于难民情况的关注弥补了学术界在研究中日战争时很少顾及的一个领域。不过，在那场战争中，数百万中国人在从日本侵略区转移到四川等西南省份。这种长距离、长时间的移动是如何实现的，萧邦齐在书中并没有讨论，仅仅是关注与浙江一省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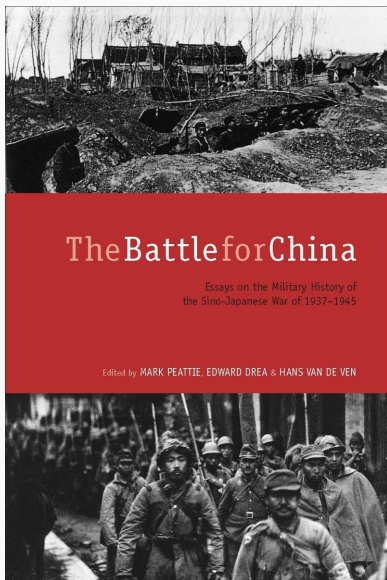
《为中国而战：中日战争（1937年至1945年）论文集》

这本论文集出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主题是中日战争历史。论文集的初衷在于：西方学术界远远低

估了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性,应该有学者对中国军队与日军的作战情况进行详细分析。

论文集文章分为战争开始阶段(1937年至1938年)、战争中期以及1944年至1945年日军的进攻态势,主要分析双方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训练情况、情报工作、军队组织结构、内部政治环境等方面。

美国学者 Stephen MacKinnon 的文章讲述了 1938 年中国军队在徐州和武汉的胜仗,分析这支队伍与保定武备学堂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把胜利的原因与指挥官陈诚联系起来。日本学者 Hagiwara Mitsuru 和 Edna Tow 把日军轰炸多个中国城市和战时首都重庆称为战争史上第一次空军发挥重要作用的战例。日本学者 Hara Takeshi 和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奇生合作的论文认为,国民政府与日军作战影响了中国内战中的力量对



Mark Peattie ed.,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比状况。

这本论文集没有直接提及日本的战争罪行。不过，不少文章分析，中日战争最大的特点是军队和民众之间的界限模糊。中国一方动员大量农民参与游击战；而日本一方采取“三光政策”，残酷对待中国民众。但是，论文集几乎多数文章关注与日本空袭的威胁和对城市的打击，忽略中国北方农民战争。

论文集的重要关注点是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开头就引用日本当时的驻华记者 1928 到 1932 年常驻上海的《朝日新闻》特派员尾崎秀实的评论，认定“中国将是二战的重要舞台”，但这一观点没有在书中系统性展开论述。

只有日本国防学院 Tohmatsu Haruo 的一篇文章对中国战场地位有所涉及。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太平洋战争影响了中国战场，但中国战场没有影响太平洋战场。换言之，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性高于中国战场。Tohmatsu 的数据认定，1941 年，三分之二的日本兵力部署在中国战场，1943 年，三分之一的兵力在中国。日本空军在中国的消耗导致他们无力在太平洋战场部署更多空军。1942 年，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占领的领土是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倍。被中国牵制的日军无力回防本土，这部分军队的开销是日军

在东南亚地区支出的 8 倍。

事实上, Tohmatsu 的数据反而证明: 他自己关于中国战场重要性不如太平洋战场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

在结论部分, Hans van de Ven 在文章中认为, 要从正确的角度看待战争, 正确对待中国战场的重要性。Ronald Spector 也在自己的部分强调,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是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贡献。不过, 论文集在这方面没有更详细的文章, 特别是没有讨论国共双方在战争中的力量对比以及这种对比对随后的内战造成的影响。

中国年轻人：多面而复杂

考克凯恩在《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人》一书中认为，中国年轻人是复杂的，不是传统观念里简单非黑即白的概念。年轻人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所处的环境、主流观念的影响，形成复杂的多面体。“青年中国”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命题，值得更多年青一代学者分析、解读。

◎ 宿亮

《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人》(*Young Chinese in Urban China*)是一本有趣的书。作者阿历克斯·考克凯恩(Alex Cockain)关注中国城市年轻人的现代生活和心理构建，试图描画出与西方媒体、主流学术界那种“标签化”的中国青年不同的一种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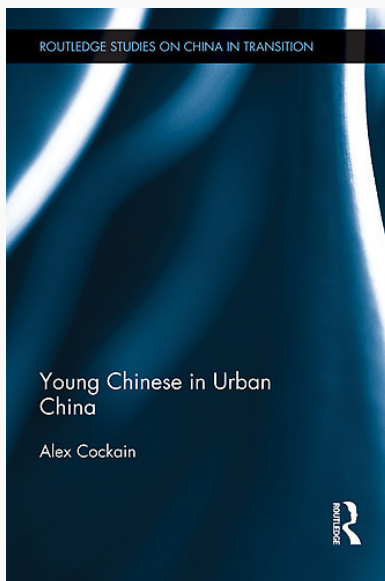
如作者所言，中西方对于青年的理解存在差别。

西方世界，“青年”意味着没有经验、冲动、叛逆；在中国，青年

带有希望、勇气和活力的意味。青年是包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在内的中国 20 世纪大多数政治运动的主角。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青年代表了理性、现代和科学。新中国成立之后，多种概念也在试图强调青年人的力量，例如“知识青年”、“红卫兵”。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社会舆论中第一次开始讨论青年问题，当时的青年文化被称为“意识形态危机”、“自我的一代”、“个人主义”等等。进入 90 年代，“抱大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文化孤儿”、“令人失望的一代”频频见诸报端。90 年代末、21 世纪初期，人们开始关注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一代，“小皇帝”、“小太阳”、“富二代”、“啃老族”这些词汇开始流行。

这些词汇足以描述中国的年轻人一代吗？考克凯恩认为，这些说法太简单、太天真。



Alex Cockain, *Young Chinese in Urban China*, Routledge, November 21, 2011.

中国青年的形象取决于他们所处的背景。一个年轻人，可能在家里是“小皇帝”，但在学校中他们变成了思想上受到压制、仅仅关注于考试的学生。他们或许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关注西方世界的“明星产品”；但面对诸如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受到阻挠等情形时，这些年轻人又变成了挥舞着国旗的愤怒民族主义者。在现实中年轻人可能是一个样子，但在网络里，他们又换了一种妆容。

考克凯恩在书中引用了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框架，强调社会话语和机制对人类行为模式塑造的作用。他提出，有一些主流观点对年轻人产生影响的过程是复杂的。例如，“好学生”、“好儿子”、“好女儿”这些观念的作用。

一方面，年轻人对父母的要求和时不时提出的“杞人忧天式”的担忧感到无奈、气恼；另一方面，这些要求让他们有了目的感和安全感。一方面，他们在应试教育的框架中苦苦挣扎；另一方面，他们对有明确的要求感到舒服。一方面，他们在网络上拿政府“开涮”、挑衅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很容易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站到维护国家的立场上。

这些都表明，中国年轻人是复杂的，不是传统观念里简单非黑即白的概念。

考克凯恩提出,在他的受访者当中,普遍存在一种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中国年轻人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面对与长辈的代际冲突、学校带来的压力以及年龄的增长。例如,一些年轻人在网络上交朋友,原因是在现实中人们“过于复杂”,总不是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而是存在利益诉求。

又如,年轻人往往故意对家长隐瞒一些信息,平衡父母对自己的期待和自我独立的关系。通过这些年轻人的生存之道,考克凯恩认定,在中国当代社会中,青年人的“次生文化”有特定的文化逻辑。

《中国城市里的年轻人》一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改编成书的。从读者的角度看,作者为了满足博士论文理论框架的需要,使用大量后结构主义术语和概念,增加了阅读的困难,但其关注的话题无疑使有趣味和价值的。“青年中国”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命题,新的年轻一代值得学者分析、解读。

中国女性的记忆中珍藏的历史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贺萧所著《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与中国集体主义历史》则以农村妇女的口述史为一手材料，通过妇女的回忆透视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情景。书中记录这些女性对战争的回忆、在新旧婚俗之间的挣扎、在土改中的希望与失望、饥荒时代的生活。通过这些故事，作者似乎在探究中国女性内心深处的东西，如儒家思想中尊卑次序的观念等等。

◎ 宿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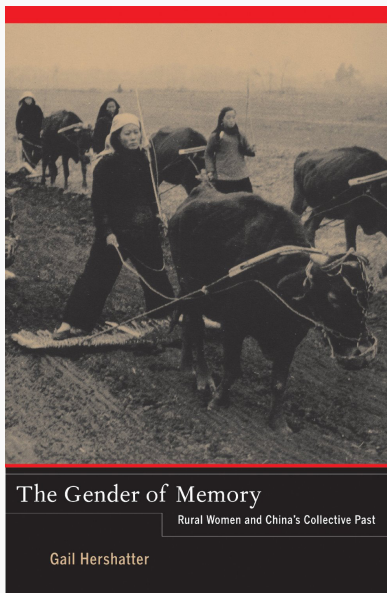
“1938 年，张朝凤 5 岁，她妈妈回家了。一个月之前，妈妈去别人家里做保姆，这次带回了一个月的工资：几张蓝色的民国纸币。张朝凤把那些纸币举起来，拿到房间里唯一一盏煤油灯跟前仔细查看。但她靠得太近了。随着‘轰’的一声，脆生生的纸币着火了。”

西方学者涉及中国女性的研究不少，大名鼎鼎者包括史景迁以一个失贞私奔的妇女为中国明清之际民生缩影的著作《王氏之

死》。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贺萧 (Gail Hershatter) 这本《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与中国集体主义历史》(*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则以农村妇女的口述史为一手材料，通过妇女的回忆透视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情景。

为了写这本书，贺萧准备了 15 年，在陕西省搜集大量农村老年妇女的口述资料，征集她们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变迁的记忆。她从女性视角出发，用学术化的语境记载了农村社会转变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

书中记录这些女性对战争的回忆、在新旧婚俗之间的挣扎、在土改中的希望与失望、饥荒时代的生活。通过这些故事，作者似乎在探究中国女性内心深处的东西，如儒家思想中尊卑次序的观念



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ugust 2011.

等等。

贺萧这本书的目录似乎是那个时代能够标记女性的种种角色排列：寡妇、活动家、农民、接生婆、母亲、模特、苦力、讲故事的人。每一章节所讲述的都是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承担特殊角色的女性回忆。这种内容编排丰富了人们对于时代的认知，也体现了这些独一无二个体回忆的重要性。

在所有故事中，贺萧强调一点，即女性总受到来自社会大环境的带有评判色彩美德束缚。希望受到家庭和周边人们特定积极评价的心理直接影响了女性在大历史背景下的所做的抉择。很少有女性不珍惜自己的好名声，因为在那个时代，这种好名声意味着他们有机会晋升乡村政府“管理层”或在家庭中处于有利地位。

那个时代，新的道德观念来到乡村，但这些观念与既有传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妥协。例如，在乡村中，很多寡妇即便受到基层妇联的压力也不愿意再嫁，因为她们认为，与新式婚姻观念习俗相比，“从一而终”能够提高社会地位、赢得尊重。而性别平等的观念得到妇女的认同，因为同样下地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的价值得到了彰显。

这些老年妇女们的回忆为人们揭开更多那时农村的社会细节。

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妇女开始倾向于支持避孕、计划生育等政策。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农业生产导致妇女更少从事织布、纺纱和刺绣等家务,更少留在家中;同时,卫生条件的改善反而使她们有了更多孩子,生活的压力更大。这种不断怀孕并体会带大孩子的艰难经历,对后来的农村社会影响不小。

不少书评注意到,贺萧在《记忆的性别》一书中的时间描写独有特点。她直接引用了大量农村妇女的时间表达方式,如“某个孩子出生那年”或“丈夫死去的那年”,这种人生中大事件带来的转变很多时候比“政治二分法”所用的词汇——如“解放前后”——更具表达力和说服力。另外,贺萧在书中提到,很多人的回忆可能会因为时代转变发生变化,不少人受到电视宣传的影响,可能在“修正”自己的回忆。换句话说,“现在”影响着关于过去的个体回忆。

贺萧常年关注中国女性历史研究,除《记忆的性别》外,她所著《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也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学术著作。在那本书中,她把妇女问题与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联系起来,其洞见值得关注。

政见读图

图解中国基础设施投资 30 年

当前中国整体上已不存在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2009 年推出的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四万亿”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且投资错配带来的 GDP 损失目前在增加。

◎ 周优游

城市化是推动未来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驱动力，而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的地方债务风险却日益令人忧心。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少卿副研究员主持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投资效率与地方财政风险》课题指出，当前中国整体上已不存在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2009 年推出的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四万亿”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且投资错配带来的 GDP 损

失目前在增加。

从地方财政风险来看,一方面,大多数地方政府并未因经济刺激计划而带来财政风险,另一方面,测算表明,青海、新疆、云南、贵州和内蒙古等5个西部省份在“四万亿”中投资力度过大,借债过多,还款能力堪忧。因此,地方政府在大规模投资基础设置时,必须要合理匹配生产设施投资,否则不利于财政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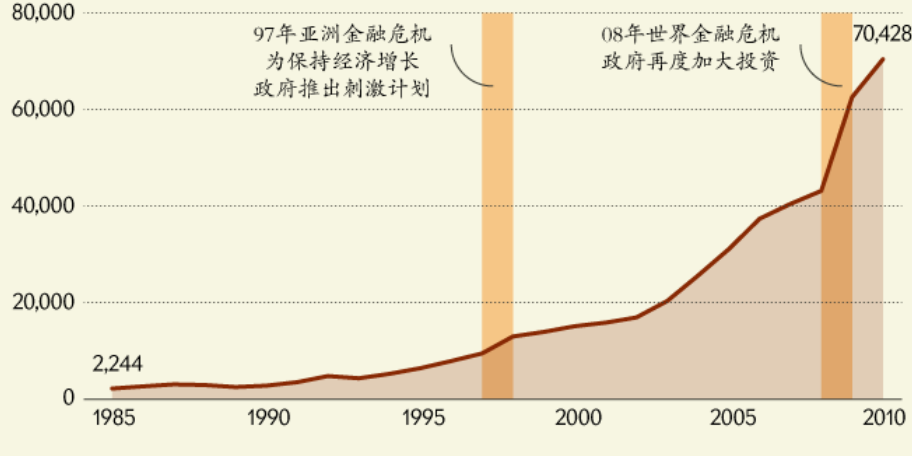
该课题建议,应及时调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工作重心,从基础设施先行调整到完善制度环境、鼓励私人创业与投资上来,从而纠正投资错配,降低西部地区省份的地方财政风险。

无论是对于基础设施已经存在过剩的不发达西部省份,还是对于基础设施仍有一定的投资空间的东中部省份,为了推动城市化而进行过快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都可能恶化中国两种资本的配置效率,加大地方财政风险,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设置障碍,因而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图解中国基础设施投资3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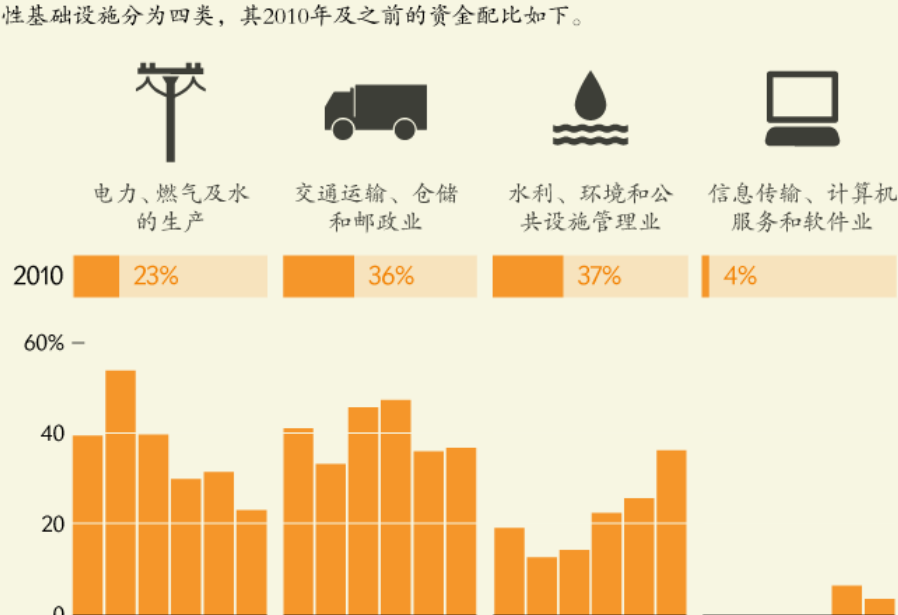
中国对基础设施投资始终保持充沛的热情；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铁公基再次起舞。然而，伴随着地方债务风险的膨胀，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如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少？是否存在财政风险？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策划的“城市化与地方债务风险”系列课题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少卿副研究员主持的分课题《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投资风险与地方财政分析》尝试回答了上述问题，下图对此进行部分呈现。

投了多少钱？（亿元，2011年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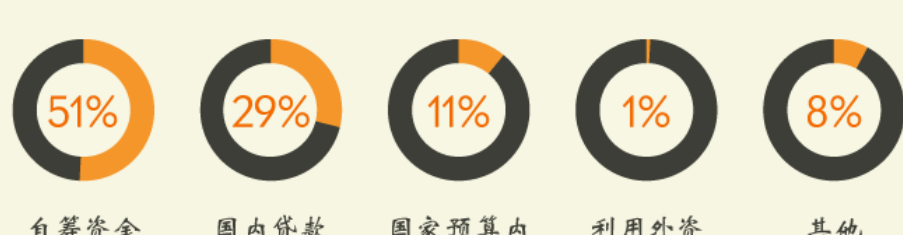
投资什么？（百分比）

生产性基础设施分为四类，其2010年及之前的资金配比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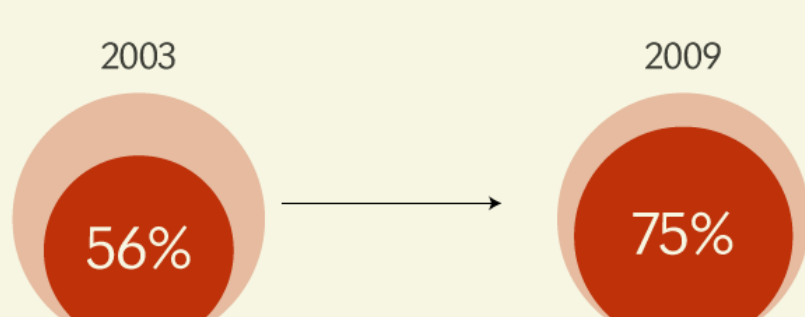


钱从哪里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来源日益多元化。自2003年来，自筹资金始终占据着总投资来源的半壁江山。



基础设施投资占地方政府支出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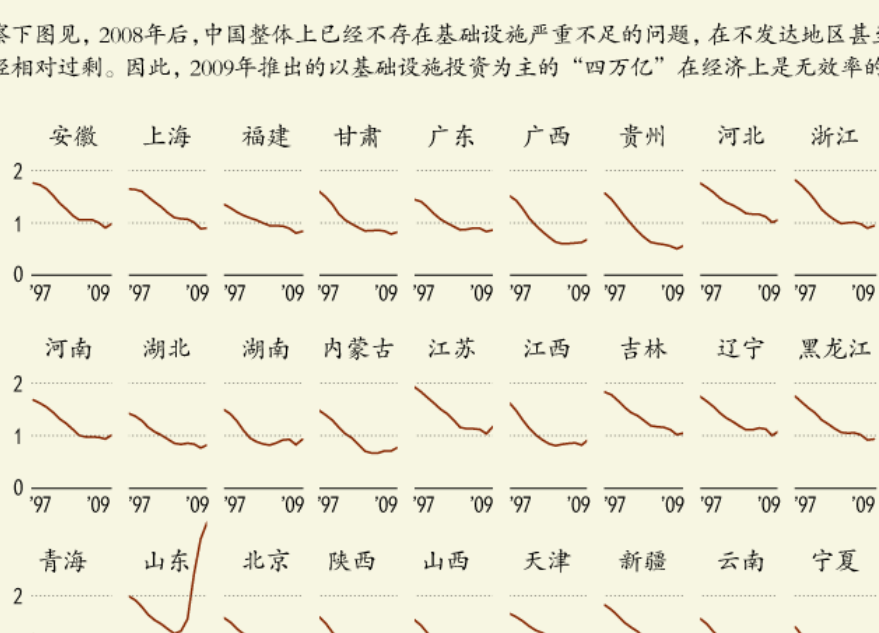


注：基础设施投资不完全包含于地方政府预算支出中。

投资是否有效？

基础设施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是一种替代的关系，因此用前者对后者的边际产出率比值来衡量基础设施投资是否有效率，如果该比值等于1，即有效率；大于1，表明基础设施短缺；小于1，表明再进行投资已无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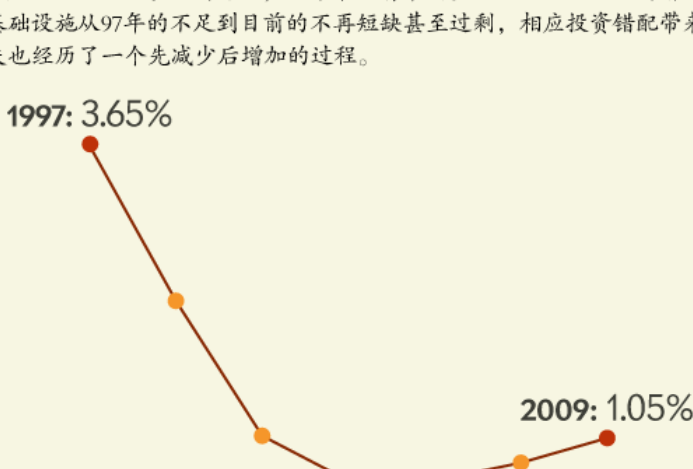
观察下图见，2008年后，中国整体上已经不存在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在不发达地区甚至已经相对过剩。因此，2009年推出的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四万亿”在经济上是无效率的。



注：四川、重庆、海南和西藏由于缺少数据而排除在样本之外。

投资错配带来的GDP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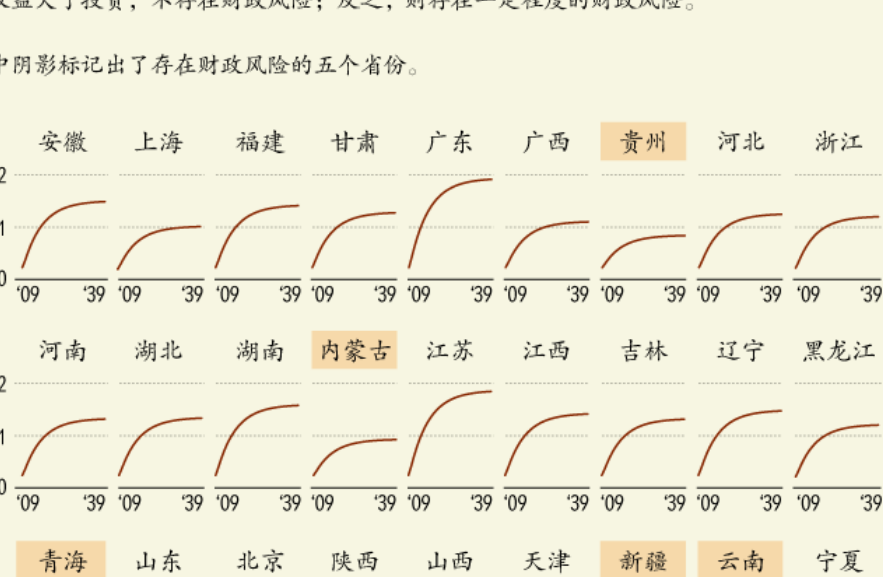
假设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之间的配置达到最优，GDP在其影响下将高出实际值；投资错配则会带来相应的GDP损失。如图可见，近年来随着中国基础设施投入的不断增长，相对于生产设施，基础设施从97年的不足到如今的不再短缺甚至过剩，相应投资错配带来的潜在GDP百分比损失也经历了一个先减少后增加的过程。



投资带给地方的财政风险

计算增加税收收入的累积现值与额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比值，可得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风险估算。各省2009-2039年财政风险随时间变化估算如下图：值大于1，表明额外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大于投资，不存在财政风险；反之，则存在一定程度的财政风险。

图中阴影标记出了存在财政风险的五个省份。



注：四川、重庆、海南和西藏由于缺少数据而排除在样本之外。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城市化与地方债务风险”课题
《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投资效率与地方财政风险》

课题负责人：黄少卿

制图：政见·周优游

加入我们

政见 CNPolitics 观察员队伍

邀请您加入

政见是一个独立网站,向您介绍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是怎样分析中国的。我们致力于发掘海内外学者和智库的智慧成果,引进思想资源。这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在这样一个开放平台中,与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工作,协力实现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快乐而又令人获益良多的事情。

另外,政见团队自身拥有多种新媒体平台,并和国内外多家媒体建立起了合作关系,可以让您的作品获得广泛的传播。

现阶段,政见团队希望进一步丰富网站内容,涉及更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因此需要在特定专业领域扩大我们的队伍。

如果您正在从事**经济学、法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或正进行**政治学量化研究**,政见诚邀您加盟。另外,如果您有能力 and 兴趣承担中英文以外**其他语种**的中国研究成果推介工作,也请联系我们,成

为新一批政见观察员。

作为政见观察员,我们希望您认同团队理念,并且能够完成以下两类工作——

- ※ 阅读学术期刊或智库报告中与中国政治相关的文章,并撰写千字左右的文章对作者观点予以介绍。
- ※ 联系研究中国政治的国内外学者,进行访谈。

加入我们的团队之后,您的义务将是定期提供稿件。因此我们希望您每周都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

我们是非营利团队,因此没有办法支付薪酬。如果您的作品被我们的合作媒体选用,您可以得到稿酬。

有意加入者,请发送简历和1—2篇作品至 Webmaster@CNPolitics.org。作品的类型必须从上述两类中选择。来邮必复。

政见 CNPolitics 新媒体运营队伍

邀请您加入

政见是一个独立网站，向读者介绍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是怎样分析中国的。我们致力于发掘海内外学者和智库的智慧成果，引进思想资源。这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政见是一个基于新媒体的团队，我们生产的内容依托多种新媒体平台传播。在今天这个媒体变革的年代，好的内容更需要依靠懂传播的人才能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作为政见新媒体运营团队成员，希望你认同团队理念，并且能够完成这些工作——

- ※ 与现有团队成员合作，制定、调整政见新媒体运营的整体策略（包括微博、人人、微信等），并分工执行。

※ 与其他网站、平台联系开展合作。

我们希望寻找的新成员,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

- ※ 思维活跃,熟悉新媒体运营,熟练掌握各种新媒体平台以及 Photoshop 等软件的使用。
- ※ 掌握基本的政治学、社会学知识,修读相关专业者更佳。
- ※ 做事靠谱,认真细致。
- ※ 新媒体运营对及时性的要求很强,因此希望您大部分时候每天都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

我们是非营利团队,因此没有办法支付薪酬。但我们相信,在这样一个开放平台中,与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工作,协力实现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快乐而又令人获益良多的事情。这里的工作,也能为你今后的学习和工作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有意加入者,请发送简历至 Webmaster@CNPolitics.org,并在邮件(cover letter)中阐述自己的相关经验,以及对政见新媒体运营的构想。来邮必复。

Cover image courtesy of [Rijksmuseum](#)
— *Still Life with Flowers*, Jan van Huysum, 1723.

欢迎投稿推荐或自荐研究成果!

联系邮箱: Webmaster@CNPolitics.org

新浪微博: [@政见 CNPolitics](#)

腾讯微博: [@政见](#)

网易微博: [@政见 CNPolitics](#)

人人小站: zhan.renren.com/CNPolitics

Google+: [+政见 CNPolitics.org](#)

政见 CNPolitics.org © 版权所有

